

炎黄春秋



部分老民先队员合影 前排右起：袁昆山（彭平）、钱伟长、李昌、徐锡璜；
后排右起：李鼎彝（李伴）、雷英琦（高燕）、薛公章（薛容）、魏其骥、孔祥麟（钱伟长夫人）

六十年后李昌首次详谈
“一二·九”和民先队

毛泽东为小青年“照写”的手书
长征途中的“孙胡子”

“求实部长”杨显东

“六十一人案”平反前后
“妈妈同志”

——任锐



任锐的晚年时代

12
95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46周年

座谈会

暨

简祖扬先生

捐赠仪式

剪影



- ① 9月28日，大会在钓鱼台举行
- ② 萧克同志与简祖扬先生及其夫人亲切交谈
- ③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简祖扬先生赠送著名画家王成喜的梅花图
- ④ 简祖扬先生在会上讲话
- ⑤ 大会一角

摄影：罗明扬

本期导读

60年后李昌首次详谈

“一二·九”和民先队

沧海桑田，60年的光明确实能抹去人们许多记忆，但对于81岁高龄的李昌来说，60年前参加并参与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一幕幕，却终生难忘……

“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前后

30年代奉党中央之命，在一种非常情况下，从北京草岚子监狱出来的61位同志，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却又定上了“叛徒”的罪名，酿成了轰动国内外的第一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多少正义之士进行了艰苦地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一波三折的过程，令人不忍掩卷。

孙中山伦敦蒙难始末

1896年，孙中山宣传革命由纽约到达伦敦，被清朝政府驻伦敦使馆逮捕，并将被秘密押解回国处死。在囚禁中，孙中山托清洁工躲过密探送信给康德黎老师。康德黎得信后立即设法营救，通过多方努力，终于迫使清使馆放人，孙中山得以脱险。

毛泽东为小青年“照写”的四幅手书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又是雄踞中国书坛的书法艺术大师，他的手迹自然是无价之宝。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毛泽东手迹，有几位幸运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伟大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和喜爱孩子的慈父般的心。

妈妈同志——任锐

任锐是一位女革命家，她从小生活在血雨腥风的动荡环境中，辛亥革命前即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五卅运动”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丈夫孙炳文就义于腥风血雨的“四·一二”，小儿子孙名世牺牲于战火纷飞的辽沈战场。为了迎接新中国的黎明，任锐一生颠沛流离，不屈不挠。

“求实部长”杨显东

在放“高产卫星”的年代，他敢于对搞浮夸的人泼冷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旗下，他敢于带头揭大寨的盖子。他就是原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他那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无私无畏的精神，令人敬佩，使人难忘。

长征途中的“孙胡子”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孙毅，向以艰苦朴素，严以律己著称。中央电视台刚刚播放过连续剧《胡子将军孙毅》本刊再把孙毅在长征路上的几个故事介绍给大家。

龙马精神海鹤姿

——评董寿平先生的书画艺术

董寿平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他在七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硕果累累。本文介绍了董老的书画艺术特点以及他取得成功的经验。

下期要目

- △1841—1997：香港156年的风雨历程
- △五六十年代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那场大讨论
-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
-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江上清
- △港岛救英：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纪实
- △陈布雷、陈璉父女分道扬镳
-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记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庄 李普 李学勤 吴象
 苏双碧 张锲 张国琦 凌云
 常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青 戴逸 魏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宋文茂 (常务)
 徐孔 洪炉
 丁洪章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事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 100802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176633-227
 6170955
 定 价: 3.20 元

专 稿	春 秋 笔	殒 星 篇
④ 六十年后 李昌首次详谈「一二·九」和民先队 徐庆全	①⑦ 港岛聚英 ——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在香港的抗日活动..... 马仲廉 ②③ 「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前后 戴煌 ③⑩ 长征途中的「孙胡子」 赵勇田 全玉林	③⑤ 孙中山伦敦蒙难始末 陈廷一 ④⑩ 毛泽东为小青年「照写」的四福手书 师宁 ④⑤ 「妈妈同志」——任锐..... 柯明

目 录

<p>文荟苑</p>	<p>人海浪</p>	<p>古今谈</p>	<p>轶闻录</p>	<p>九州景</p>	<p>编读窗</p>	<p>总目录</p>
<p>⑤5 龙马精神海鹤姿 ——评董寿平先生的书画艺术 刘恪山</p>	<p>⑥9 「高山神药」的女专家彭洪福 程迺欣</p> <p>⑥5 喻传鉴先生的感召力 李冰封</p> <p>③4 牛背诗词 欧初</p> <p>⑥2 战士诗人陈辉短暂的一生 何辛</p>	<p>⑦4 李自成何以兵败山海关 刘少校</p> <p>⑦2 浅谈清代的「吏治」 贺海</p>	<p>⑦7 忆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 牛克伦</p>	<p>⑦8 上海城隍庙的今昔 叶世涛 瞿慕钧</p>	<p>⑧3 读者来信摘录 李远金 伍焯煊等</p> <p>⑧3 关于姚克平反经过的事实补充 姚眉</p>	<p>⑧4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期目录</p>
<p>求实篇</p>	<p>⑤1 「求实部长」杨显东 吴德才</p>					

「一二·九」和民先队

六十年后李昌首次详谈

●徐庆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赴医院慰问抗日伤员

1935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和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起过巨大的作用。

在“一二·九”运动爆发60周年，笔者采访了当年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并曾担任民先队总队长的李昌同志。

现今已81岁高龄的李老，得知笔者的来意后说：“‘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空前的光辉发展。这场运动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示威，中经成立骨干组织民先队，到‘三·三一’反压迫的抬棺大游行，这是发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阶段；从刘少

奇同志领导下贯彻党的正确政策，到抗战爆发，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军政和社会各界共同抗日的第二阶段；从北平沦陷后平津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学生参加敌后抗战和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8年国民党政府镇压群众运动，运动改变发展策略，这是第三阶段。前一阶段中，我是一个骨干分子，后两个阶段中，我被选为民先队总队长，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的领导下，作了一些工作。”

接着，李老围绕这三个阶段谈起了他的亲身经历。

一、从“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到“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1. 在北平处于沦陷边缘

的情况下,李昌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中

1935年秋,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节。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它在占领东北三省后,侵略的魔爪很快就越过长城,伸到了华北。这年11月,国民党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也加快了搞“华北特殊化”的步骤,北平已处在沦亡的边缘。

在这一年,21岁的李昌,从北平的华北中学毕业考入了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已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学习的他,参加了上海学生三次赴南京请愿抗日的爱国行动,最后一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1933年,经同学张树滋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月,由于团支部和上级保持联络的交通叛变,团支书被捕,其他成员商定分散隐蔽,他逃亡和转学到北平。

李老说:“当时的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开办的,校内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倡导学生办学生会。在这时候,学生会的《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已为进步学生所掌握,《清华周刊》的主编是蒋南翔。我一入校时就读到一期抨击法西斯的专辑,勇敢宣传正确观点,文笔犀利,使我精神振奋。

“我因失掉了团组织关系,在清华没有熟悉朋友,好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好在同年级同学董凌云(清华的职工考入清华)很活跃,我就慢慢地和一些进步同学联系起来了,这样使我感到不再是漆黑一团。清华的进步力量在活动,特别是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团结抗日主张后,更觉得民族解放大有希望,增强了我参加革命活动的信心。

“九月,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清华牛荫冠、师大杜润生等同学携款到灾区慰问,我很佩服这种关心劳苦大众的义举,也领会到这是开展高校爱国运动的好方式。接着,燕京、清华女一中等10校学生自治会发出的《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表达了广大学生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我热烈赞成。”

在这期间,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彭涛、谷景生、周小舟),在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的直接领导下,不失时机地把水灾赈济会组织转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是彭涛、周小舟、谷景生),负责人有郭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华、孙敬文、邹鲁风、高惠如等,统一领导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11月3日,学联便通过了举行大规模请愿的提案。

12月6日,学联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便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救国请愿活动。

2.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中

清华大学当时党支部有党员蒋南翔、牛荫冠、吴承明和何凤元等,蒋南翔是书记,这是清华的领导核心。11月27日,清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学联请愿游行的提案。由于右派学生捣乱,提案未能通过。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华北就要沦亡的威胁下,12月8日,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主持大会的左派代表人物黄诚、陆瑾,中派代表陈元,右派代表司徽,会前有了协商,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全体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

清华原来就有合法的学生会,在此基础上又专门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并立即发表了救国宣言,说出了北平学生的心里话:“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第二天一早,清华即组成了参加请愿游行队伍。李老回忆说:“在‘一二·九’召集和发动过程中,我作为一个骨干分子,主要是参加纠察队,动员同学参加全体会议,配合大会主席团布置台下的发言配合等工作。”

清华在城外30里,为了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同学们在早晨5点多钟就起了床,沿着平绥铁路,向西直门进发。8点钟左右,清华的队伍和燕京大学的队伍汇合,在半路上还有城外的弘达中学、成达中学等100多名同学参加。但是,到了西直门却进不了城。

李老说:“原来,在我们的队伍到高粱桥时,北平当局根据西郊警察署长林雁宾的报告,已将西直门关闭。西直门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和二十九军的士兵。为了能与城内的请愿队伍及时汇合,我们派出代表与军警进行交涉,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领队决定留下两个分队在西直门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其余的队伍奔向阜成门。可是,阜成门也关闭了,又转到西便门,还是如此,就又返回西直门。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城区周围的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北平大学农学院的二三十位同学赶来声援,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最后,按照指挥部的决定,由清华女同学陆瑾站在高凳上向全体同学讲话:“我们今天请愿不成,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动来回答他们!”

就在清华、燕大的队伍找机会

进城的时候，城内的学生已经按原定计划进行了。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女一中的学生。上午10点多，一二千学生已汇集到新华门前。同学们临时推出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大学生宋黎和师大学生陈泽云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到了中午，何的秘书才出来说，何眼下不在北平，学生的要求可代为转达，并说华北成立政治组织是国家的政策，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等。同学们呼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表示抗议，这位秘书只好缩回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代表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总指挥为东大的宋黎，路线定为先去西直门，接清华队伍入城，然后到天安门举行大会。示威队伍由中大学生带头，冲过了西单牌楼军警的第一道封锁线和西四牌楼的第二道封锁线，向前进发。这时，交通员探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并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打散学生。于是，代表们决定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途中，辅仁大学刘达等100多名同学加入了队伍，到了红楼，又有敲钟临时会集起来的200多名北大学生参加。队伍越来越扩大，到王府井大街时，已超过3000人。

当队伍抵达王府井时，一场惨烈的搏斗开始了。军警用水龙头、大刀、木棍等喷射和砍打学生。东大的林泽被打断了鼻梁骨，女二中的毛真左臂被砍伤。经过长达三十分流的流血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还是被冲散了。指挥部当即通知学生到北大三院集合。在这里，宋黎传达了学联的意见：从10日起，全市实行总罢课，再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队伍高

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各自返校。

12月10日，北平的学生举行罢课。在罢课中，学生们首先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并展开了救亡活动。李老说：“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救亡工作很活跃。那时我们经常和燕大的学生会（代表大会主席张兆麟、执委会主席黄华）组织多种形式的专题讨论会。我记得的题目有：‘华北如有变动青年应该怎么办？’、‘日本侵略华北的方式’、‘《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真相’等。”

陷入沉思中的李老，仿佛又回到60年前。他说：“那时，清华一院各教室全让位于学生组织。我们工作起来可真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啊！”

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吓坏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宋认为学生游行罢课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是反对他的，因此竭力压制，将警车队和保安队开进了城内外的各重要学校，随时准备逮捕爱国学生。冀察当局还将各大学校长召集在一起，商讨制止学生运动的办法，并在13日发表了《告学生书》。此后，各学校当局举行师生谈话会，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但结果却不如他们所想。李老说：“当时，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在全体学生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一去游行，清华就保不住了。你们应当爱学校，可是更爱国家。’我们为这位学生热烈鼓掌，搞得校长很狼狈。”

在此期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在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市学联在中共市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和制定了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

行的方案和战斗部署。在12月14日北平报纸刊登出国民政府要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另派代表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扩大影响，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响应。这次示威队伍共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大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大率领，第三大队由北大率领，城外各校组成第四大队，由清华率领，参加学生共约一万人。

“我们是在15日接到通知的。”李老说，“为了给游行作准备，清华成立了临时纠察队、交通队，赶作各种宣传品，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学联鉴于清华和燕京上次游行在城外受阻的情况，决定每个学校抽出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我们先遣队员临行前，与同学们饮酒告别，以表达为了民族的解放甘愿牺牲的决心。”

城外的清华和燕大等校学生在8点汇集到西直门，但城门紧闭，戒备森严。队伍转而至阜成门，又到西便门的铁路门，途中，平大农学院、孔德中学的学生加入队伍。面对这个铁路门，同学们怒火中烧，大家臂膀挽着臂膀，在“一·二·三”的喊声中，用集体队伍的力量，猛力撞开了紧闭的铁门。铁门一撞开，刹时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春雷般的欢呼声。同学们终于进城了。队伍到了和平门，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并接应了被包围在这里的师大同学，然后一起在珠市口与大队伍汇合。

关于城内的情况，李老说：“经事后了解，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第三大队冲破军警对学校的包围圈，和附近的学校汇合成1000多人的队伍，到南长街时，遭到了军警的水龙头的喷射。一部分同学绕到军警

背后将水龙割断，李俊明、朱穆之、杨雨民等，冲上去夺过水龙，反向军警喷射。这样，大队人马冲了过去，在新华门又冲破了第二道防线。虽有同学受伤，队伍还是向天桥开进。以东北大学为首的第一大队和清华、燕大的先遣队伍200多人一起，从北河沿出发，沿途联络了一些院校的同学，到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前接应师大同学突破军警阻拦时，军警用马鞭、大刀向同学们乱抽乱砍，队伍经过多次顽强抵抗，才赶往大会会场。以中国大学为首的第二大队的同学们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方式，赶往天桥。

“11时左右，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议。”当清华和燕大的队伍与大队队伍汇合后，李老说：“这时队伍人数已有二万多人，浩浩荡荡向前门开进。到了前门，军警阻拦，无法进城，便在前门外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由师大的阎世臣担任主席，通过决议，向北平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要求对日宣战和保证不再逮捕屠杀学生。但是，会后，同学们又遭到军警的阻拦和毒打，只好分散回校。这天共有二三十人被捕，400多人受伤。”

“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虽然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但北平学生冲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响亮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掀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的怒潮，配合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事件。从此，中国革命

的形势，经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除农村中工农武装革命而外），重新进入新的革命时期。

3. “平津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之后，各大中学学生一致罢课；而各学校当局则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纷纷提前放假，企图分散学生的力量。学生运动往何处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李老说：“当时，我们都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却拿不出个解决办法。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与敌人斗；有的主张下乡发动群众；还有的主张再像‘九·一八’那样，到南京请愿去。”

当时，中共北平工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这样，既可以把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又可以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但是，”李老话峰一转，“党的这一正确决定当时却不为大多数同学所理解。”

那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为了分化、瓦解学生运动，以学生到处请愿为由头，让学生选出代表赴南京。一些学生看不出这是蒋介石企图收买学生，反而认为‘九·一八’那次大批学生云集南京，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次还可利用赴京的机会，扩大政治影响。

在各大学都奉命选派“赴京聆训”代表的情况下，北平学联决定召开由各学校代表组成的会议，商讨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请愿的问题

在会议过程中，赴南京请愿的

意见仍然占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决定休会。经过充分的酝酿，学联党团成员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作了很多解释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凌又作了长篇有说服力的发言，终于通过了组织南下宣传团的决议。李老说：“我们按照这一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一方面宣讲南下宣传的意义，另一方面准备宣传品，学唱救亡歌曲，购买下乡用的蓝布工裤和球鞋。”

宣传团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职人员。

宣传团分四个团，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当团长；二团由东大、师大、中大、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法商学院担任；三团由清华、燕大、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部领导是黄华、吴承明等；四团是由天津的大中学校组成。

关于三团的情况，李老说：“我们三团有三个大队，还有一个先遣小队组成，任务是侦察情况、选择路线和交涉食宿地方。杨学诚、于光远、谷苞和我都在这个大队里，我是大队长。三团在11月4日从西郊蓝靛厂出发，第一天到卢沟桥畔的宛平县城宿营。此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有的骑车，有的步行。数九寒天的北方原野，风沙满天，寒风刺骨，但是大家有说有笑。我们队的燕京女同学梁思懿，很勇敢，每天和我们一起出发，等到天大亮了一看，她的头巾下露出的鬓发都哈气成霜，红颜少女一变而成

‘白发老妪’了。宣传团沿途在大的居民点和集镇进行宣传、访问，召开群众大会和帮助乡村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播撒抗日的种子。当时用的主要方式是唱歌和演节目。”

李老至今还记得这些歌曲，他说：“当时唱的歌有《时事打牙牌》小调和苏联的《工人歌》等。《时事打牙牌》是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歌词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咳嗽咳嗽，关东起狼烟’。《工人歌》的歌词是：‘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我们心窝’。”说着，李老向我哼起了这两首歌。

南下宣传的四个团在7日、8日分别到达固安集中，但县长不让学生进城，宣传团就在城外开展宣传工作。9日，全体团员在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开会，讨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李老说：“在我们宣传的口号中，到底是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有些人是认识不清的，争论非常热烈。最后，由

北平学联的董毓华根据党的‘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阐明了为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是正确的道理，统一了思想”

谈到这次行动的感受，李老说：“南下宣传中和农民群众的亲身接触，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痛苦，也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这样，我们就从原来的只是激于爱国热情、单纯要求抗日的立场，提高到初步具有为工农大众谋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说，昨天在游行中因为冲破十年白色恐怖，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感奋得热泪盈眶，那么，今天在华北原野上毫不顾虑地高唱《时事打牙牌》和《工人歌》，我们是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战士而自命和自豪了。”

南下宣传团的抗日救国活动，震动了北平当局。在他们指令一些学校派人去劝说学生回校，并下令沿途各县镇压、破坏无效后，便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围追

堵截，武装强迫他们返平。

“我们第三团在14日到达高碑店后，就被军警围困在一所小学校里。”李老说，“当时，我们明白再向南走是不可能了。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用英语讨论回去以后怎么办，并向团员们传达了讨论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回去以后要成立永久性的战斗团体。”

“晚上8点，我们四个人一排，相互挽着手，向火车站走去。到了车站，才知道已没有北去的火车了。我们住进了小客店后，军警特务怕我们继续南下，将几间小客店包围了，先将冷水泼进屋里，后又把窗户点燃了。我们拿起桌子腿和板凳做武器，拼死抵抗。第二天一早，才在军警的押送下，上了火车。”

16日，回到北平的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基本成员是参加过高碑店斗争的宣传团员。

21日，到达保定的一、二团，在得知三团被押送回平并成立团体的消息后，也决定成立永久性的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天，也被押送回到北平。

2月1日，一、二、三团在北平师大召开了团员代表大会，决定两个组织统一，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制定了工作纲要和有关组织问题的文件，并且发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总队部第一任负责人是敖白枫（高锦明）、刘导生、王仁忱等。

民先队的成立，标志着“一二·九”运动有了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运动也将巩固地发展下去。

4. 清华反对搜捕斗争和“三·三一”抬棺大游行，李昌说：斗争锻炼了我

面对蓬勃发展的全国各界救



清华和燕京大学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动员人民起来抗日

亡运动，国民政府在1936年2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着便在全国开始了镇压行动，企图把刚兴起的革命热潮迅速打下去。

“从2月25日起到29日，北平当局连续搜查了中大、北大三院和清华等许多学校，共逮捕同学100多人。”李老说，“军警是在29日的黎明开进清华园的。大概有400多人，将学生宿舍包围了，然后按黑名单抓人。我们一些民先队员带头，和同学们一道冲破了包围圈。这时，我们听到消息说，军警已在二院宿舍开始抓人了。我和民先队员们立刻向校门口警卫室跑去，把绑着的蒋南翔和纠察大队长方左英抢救出来，从城内坐校车刚回学校的姚依林也被拘留在那里，也放开了。愤怒之下，我们还把军警的汽车给烧毁了。军警撤走后，清华的主要干部都分散隐蔽，以防他们再来搜捕。”

果然，当天晚上，北平当局又出动了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约5000名军警，对清华进行搜捕。由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员早有准备，把大多数同学集中和隐蔽在体育馆的后厅里，军警一直到天亮才冲进了体育馆。他们胡乱地抓了二十几个人，主要干部一个也没有抓着，便气势汹汹地撤退了。

军警对清华的两次搜捕后，清华爱国学生的心态如何呢？李老说：“这两次搜捕，加深了我们对军警的仇恨，也更激发了骨干分子的斗志。但是，”李老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反搜捕斗争后，一部分学生领导，迫于家庭的压力，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另外，大批学生领导骨干的离校，国民党的御用教授趁机大肆鼓吹‘读书救国论’和安逸的学院生活

等，对一部分同学，甚至个别民先队员，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当时，以民先队的负责人张之光为代表的某些人消沉了，民先队的组织也松懈了，大队和小队的一些会也开不起来了。

“我当时虽只是民先队的小队长，对这种状况很是着急。我们一些骨干分子便聚在一起，讨论应付这一局面的对策，最后产生了改选大队部的念头。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大多数队员的支持。于是，召开了队员大会，重新选举了领导人。通过选举，杨学诚、凌松如、纪毓秀和我，还有钟烈铤（后因病休养），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我担任大队长。由于我们新的领导班子是经过民主选举的，所以得到了队员们的支持。工作后不久，很快又把民先队活跃起来，使清华成为当时北平整个民先队伍中最坚强的一支。”说到这里，李老笑了笑说：“当然，事情也不是就那么顺利。因为那些消沉后的少数学生领导人，以元老派自居，对我们的工作指手划脚。我们这些人也就被同学们称为少壮派。元老派只重视上层联络工作，不重视发动群众，而我们则恰恰相反。这样，我们与元老派的徐云书、黄刊等人，终由明显的思想分歧发展到对立和决裂了。”

“但是，我们虽然很积极，但对斗争的发展方向也是比较模糊，急躁情绪也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后来的‘三·三一大游行’中，我们就受到了挫折。”

当时，北平十七中学18岁的郭清同学，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消息传来，大家怒火中烧。北平学联反映了一部分激进同学的情绪，决定在3月31日举行抬棺游行。

“这次大会是在北大三院召开的，”李老说，“参加的只是民先队和一些积极分子1000多人。大家

推举清华、北大、师大三校组成主席团。在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祭文，然后，有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和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不再出现逮捕学生的现象，要求停止内战，实行对日抗战。但这时，警察和特务打手已将三院包围；北大开除韩天石、吴沛苍、巫省三、叶纪霖的布告，也贴到开追悼会现场的礼堂门口。于是，大家更加愤怒，就从邻校孔德中学后墙，由姜文彬用粗树干将小门撞开，大家迅速拆开一个缺口，从北池子向南抬着空棺游行。杨学诚、柯家龙（燕京学生）和我打头阵。到了北池子南口不远，就遭到军警的突然袭击，抓去了53名学生，其中女生17人，还有一名记者。”

“但是，”李老说，“参加斗争的实践也磨练了我，更坚定了我的信念。4月间，清华又吸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担任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团支书是韦毓梅，宣传委员是黄诚。5月，根据中央的通知，改组共产主义青年团，所有的团员一律转党。于是，我又参加了清华的党支部委员会，任组织委员，党支书是赵得尊，宣传委员是李孝芬。“当时，我们把入团叫做入‘中学’，入党叫做入‘大学’。有一天，杨学诚、凌松如、吴继周几位同志对我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我说：‘好，我就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也就在这一时期，北平各校的民先队员有很多人都陆续入了党，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更加坚强起来了。

二、刘少奇同志主持华北局工作，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在民先队逐步壮大的同时，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后来又转到联蒋抗日）的策略口号，以及在工作中肃清“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等方针、政策、方法和作风的指示，都反复传达过，并且组织讨论。这对于端正民先队的统一战线思想和进一步广泛开展救亡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配合学联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抗日的组织，民先队的工作方式方法也多样化了。李老说：“从‘三·三一’到后来的‘一二·一二’这段时间内，由于开展群众化的以游击战术训练为中心的多样性的活动，民先队也就一天天壮大起来了。五六月间，我担任了民先队西郊区区长，改变了以前只与各校民先队负责人联系的作法，加强队员的横向联系。当时，清华、燕大和平大农学院等几个大队，经常开联欢会。城内的民先队也常到清华园访问、联欢。整个西郊区队的工作很是活跃。这期间，我发展了农学院的民先大队长高万章入党，当时中共西郊区委书记刘杰领导清华党支部，我根据他的意见，把高的组织关系转交给区委组织委员牛荫冠。不久，领导安排我到总队部工作，主要负责人有敖白枫、刘导生、萧敏颂和我。敖白枫调走后，8月，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民主改选，我被选为总队长，与刘导生、孙传文（孙陶林）、萧敏颂、杨雨民、杨克冰等同志一起工作，后来又有了顾德欢同志。以后，市委就

派黄敬同志领导我们。”李老只是粗线条地讲述了他担任总队长的经过，对他所作的工作却避而不谈。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为党工作的热情和过人的领导才干，党也不会把这样重要的职位放在他的肩上。

我了解李老的工作成绩，他却顾左右而言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当时民先队的工作方式。

1. 既拿笔杆子，又准备拿枪杆子

民先队诞生在华北国防前线，严峻的形势使队员们认识到，要发动全民族抗战，只拿笔杆子，不拿枪杆子，是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三·三一”以后，民先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方式，如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办清寒食堂，扩大民众学校等，而最主要的是抓紧了游击战术训练和政治学习。

“最初的游击战术训练，是秘密进行的。”李老说，“有一次，党组织找到一位打游击有经验的同志，由黄华借到燕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客厅，开了一天的训练班。我当时作了笔记，刊载在民先队报上，供大家学习。但光讲不练，有些抽象；秘密传授，人也太少。到了4月28日，就由清华、燕京两个大队开始在西山举行行军和游击战演习，方式生动活泼，效果很好。这样，民先队总部也采纳了这一作法，成立了专管军事训练的武装部，由杨雨民负责。秋后，中共北平市委又特地介绍了老红军袁也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当军事教官。军事演习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钓鱼台和西山是经常演习的地方。最初几次，军警还出动干涉，但是我们的队伍采取化整为零、分进合击的方式，军警根本控制不住；后来，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不大管

了。”

谈到这一活动的意义时，李老说：“游击战术训练，不仅对当时组织游行示威很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大批民先队员抗战后参加了敌后游击战争。”

组织政治学习，也是民先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实际斗争的开展，遇到的问题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队员们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各种问题的讨论，兴趣也愈浓厚。为此，民先队总部推荐了一批书目供大家阅读。李老回忆说：“这些书目有《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萍踪寄语》、《母亲》、《铁流》、《毁灭》等。当然，那时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党内负责同志所写的文章是不合法的，只能内部传阅，不能公开。学习的方法是，个人阅读、集体讨论。收效最大的是推动大家结合实际工作读了一些书。”

为了指导工作和推动队员的学习，总队部还办有不定期的机关报。“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完全靠募捐维持；由于没有稳定的印刷地点，就印一期，算一期。所以，机关报的出版时断时续。”李老说：“这些困难有时还是可以克服的，最大的困难还是要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检查没收。为此，报纸的名称经常改换。先后用过《民族解放》、《解放之路》、《一周间》、《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生活》等名称。编辑人员也是轮流来的，如顾德欢、杨述，都编过队报。”

政治工作的开展，确实起到了增强队员凝聚力的作用，但是，李老又不无遗憾地对我说：“现在看

来，如果当时在繁重的组织工作中，还能用更大一些力量，从事思想理论工作，可能在推动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方面，收到更大的效果。”

当然，当时的其它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留给李老印象最深的是文艺演出。李老说：“当时救亡歌曲和街头剧的教育作用很大，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荣千祥（高棠）的国难大戏，大家尤其爱听。”

轰轰烈烈的活动，使民先队也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刚成立时队员不过300人左右，经过“三·三一”的挫折，到5月底达到600多人，6月就发展到1300多人了。

队伍壮大后，如何正确对待其他的救亡青年组织？清华民先大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李老说：“‘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之后，清华有高葆琦（高原，是队长）、钱伟长、凌松如（则之）、郝威（罗青）、吴瀚、戴振铎、张石城、彭平等21位同学，本着爱国热情，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队，一方面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宣传，一方面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到浦口后，他们被押解回来了。接着，就以自行车队为基础，在清华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这样，在一个时期内，清华的民先队、救亡团和国民党学生组织的护校团，几乎鼎足而立。救亡团的主要领导人陈元（清华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虽然动摇于左右两派之间，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但是救亡团的团员，特别是自行车队的队员，联系广大中间同学，爱国热情很高，在实际斗争中政治上进步很快，必须主动积极地团结和影响他们。因此，我们对救亡团采取诚恳合作的方针，而对团员则团结争取，对他们如民先队员一样看。这样，到了‘一二·一二’前夕，救亡团从团员到领导，基本上都加入

到民先队里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沈海清、刘毓桁、高葆琦等同志，后来都先后加入共产党。通过团结救亡团团员，我们把更广大同学团结在民先队周围，右派更加孤立了。”

由于民先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壮大起来的，所以在斗争中，始终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六·一三”游行示威活动即是一个例子。

2. 体现统一战线思想的“六·一三”游行

在整个“一二·九”运动过程中，“六·一三”游行示威活动，是响应天津学生“五·二八”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要求清查“海河浮尸”的（日军将被迫为其修筑军事工程的中国工人杀死灭口，抛尸海河，五月间发现尸体120余具）。但北平行动滞后，没有形成全国浪潮，影响不是太大，以至于在史书和人们的回忆录中，往往一笔带过。但是，李老却不这么看。他说：“这次活动对全国影响小一些，但对激发二十九军的爱国热情，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示威后，北平学生于6月13日举行示威。在这次斗争中，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清查海河浮尸”的口号，造成了平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的新局面。沿街的第二十九军也为学生的抗日热情所感动，所以，他们虽然沿途阻拦，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学生了。同时，民先队员们所学到的军事知识也发挥了作用，在游行中采用了一种灵活的迂回前进的战术，叫做“头调尾，尾调头”。李老解释说：“这也叫‘穿插战术’。当先头部队遇到顽强障碍时，立即改变方向，后卫带头从旁绕道前

进；再遇到阻拦时，新的先头部队又变成后卫。这样灵活的渗透，使军警根本无法阻拦。”

“六·一三”游行之所以获得成功，是与北平学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的。在此之前，北平学联发表了“师生合作”的文件，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不当之处，恳请爱国师生的教导。北平学联改组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取得广大师生的支持。这时，经过一个时期的隐蔽后，蒋南翔又回到北平，参加学联的领导工作。

“六·一三”游行后，利用这一大好局面，民先队和爱国学生把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到了国民党部队。李老说：“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和二十九军接近、联欢，表扬他们在喜峰口抗日的爱国行动；日军于11月3日在北平城郊举行军事演习之后，市委发动社会上层和二十九军内部，影响和推动二十九军进行了两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我们组织学生热烈慰问，并且向官兵献旗，使二十九军受到很大的鼓舞。”

李老顿了顿，又强调说：“这一大好局面所带来的后果，在下面要谈到的‘一二·一二’大游行当中，很快体现出来了。”

3. 进一步体现统战思想、团结国民党军政的“一二·一二”大游行

“1936年12月12日的北平学生大游行，原本是准备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12月9日举行的。游行指挥部由市委黄敬、学委高承志和我组成，我任现场总指挥。为了保证游行的顺利进行，我们作了充分的组织工作。”李老解释说：“但12月9日这天，正赶上段祺瑞的大出殡，城内戒严。为了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我建议指挥部将游行时间改在了12月12日。”

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日本加紧进攻的形势下，站在国防前线的北平广大爱国学生推动时局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发展。因此，李老说：“我们的口号是：‘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了游击战术。清华、燕京头天都派了先遣队员进城以接应大队，各校学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也不在学校集合，而在好几个地方分别集合，最后汇合在东皇城根。

李老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租用了一辆漂亮的小轿车，杨述和女一中的魏宜威坐在车里，一方面在队前队尾进行联络，另一方面在队伍旁边忽前忽后地散发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军警看到这一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一个个瞠目结舌。游行队伍采取了更机动灵活的‘穿插战术’，遇到军警阻拦，立即分散做宣传工作；一声集合信号，分散的队伍又立即集中起来。”游行的队伍在东华门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要求宋哲元接见，宋哲元开车门要传单去了。下午1时，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传来保安队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对学生训话。李老说：“那时我们还拿不准宋的态度是否真诚，也担心宋是否会借此机会镇压，但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救亡运动的合法性，下午2时左右，我还是指挥队伍开到了景山。当时，冀察政务会办事的人很是粗野，队伍进入景山公园，他们就把大门紧紧关上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很担心他们要对学生实行镇压。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怕当官的没

来，学生一走，他们交不了差。事后我了解到，在外面负责指挥的黄敬，也以为可能发生屠杀学生的惨案。为防止万一，他在外边动员了有关的上层人士，又通知中外记者到景山采访。北平市委的李雪峰、安子文也到景山附近观察事态的发展。”

后来，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同学们讲了话，除了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辩护几句外，一再表示他们也是抗日的，希望同学们谅解。这样，这次集会游行完全取得了合法地位，当天在城内整队游行，高呼口号，再也没有军警阻拦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

4. 同伪学联的斗争和团结广大同学的“生活路线”

“一二·一二”大游行的当天，发生了西安事变。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时局如此迅速曲折的变化，在北平学生界引起一些波动。李老说：“我们是在第13日一早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奔走相告，沉浸在极度的兴奋和欢乐之中。你想啊，叛变革命、发动内战的祸首被捕，我们能不高兴吗。我们的头脑当时很有些发热，盼望张、杨除掉蒋介石，对亲日派可能借讨伐张、杨，挑起新的内战的阴谋，还不能有清醒的考虑。所以，民先队员们对党中央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成这次变事的和平解决，很不理解，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心情陡然变得沉闷和不安。”

而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则利用这一机会，在12月25日对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他们将人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危机消除而称庆的心理，狡猾地转换成庆祝张、杨悔过、领袖脱险的活动。他们发动市民鸣放鞭炮，并集合部

分右派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次日，又令各中学放假游行，并操纵成立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避免鱼目混珠，人们称之为新学联，实为伪学联）。伪学联依靠政权的势力，准备以暴力打垮各校学生会和民先队。李老说：“在清华，25日晚，‘护校团’擅自搜查民先队员宿舍和救国会，把搜到的《清华周刊》和一些救亡书籍，在操场上付之一炬，一时火焰冲天。我们党支部得知消息后，立即集合民先队员，由杨学诚同志带头，冲到了操场。经过一场搏斗，把他们打得狼狽逃窜。”

在此期间，其他学校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如师大的“饭团”（以投靠国民党来拿津贴谋出路的少数学生）殴打师大民先大队负责人阎世臣等。但是，由于各校民先队的有组织的行动，这股不可一世的气焰很快被阻止了。

在西安事变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党加强了对民先队的领导，民先队总部直接和北方局的彭真同志联系。李老说：“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于1937年的2月6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人，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个地方队部。鉴于大规模的武装抗战已迫在眉睫，这次大会提出了民先队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在大力发展民先队员的同时，加强学习军事，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把救亡运动发展到广泛的各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大众中去。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我被选为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共同组成全国总部。”

总部成立伊始，工作异常繁忙，于是总队长李昌和于光远（当时岭南大学教师）脱产专门做民先

队工作，另成立北平地方队部，孙传文为队长。当时，国民党利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动舆论界大肆宣传取消左派、取消特区的“片面抗战”论，清华的元老派也随之唱一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如果不实行各党各派合作，发动广大群众，展开全面民族的抗战，是注定要失败的。”李老说，“因此，我们同元老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时，刘少奇同志以华云的笔名写了‘论左派’的文章，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派的重要作用。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坚定了正确立场并驳倒了‘元老派’附和‘片面抗战’的谬论。”

但是，要打退国民党的政治进攻，还要把广大同学团结到学联和民先队周围，孤立反动势力。李老说：“我们经过充分地酝酿，提出了走‘生活路线’，作一些以抗日为内容的群众文化福利工作，以团结绝大多数同学。最突出的是春季野游。学联和民先队在1937年的春假中，组织同学到西山一带旅行，采取演出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战。记得第一次是去香山。游山后，崔嵬和张瑞芳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第二次去温泉，参加的人更多。这次在现场排演了一幕《公审七君子》的活报剧。演出者有北平学联主席王文彬等同志，黄敬在后台任导演兼化妆，我担任编剧和台词讲授。这出剧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压迫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演出结束后，群情激动，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这样的活动，博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护，我们团结同学的目的也达到了。”

5. 赴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昌说：我们是去武装头脑的

民先队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李昌（前排左二）在晋察冀四纵队工作，前排左一为胡耀邦

也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北平党组织派黄敬、李昌、清华党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参加了这次会议。谈到参加这次会议的感受时，李老说：“我们是去武装头脑的。”

“我们是化装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集合去延安的，住在延安城内基督教堂附近的招待所。有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来看我们白区代表团。主席和少奇同志与大家坐在地铺上，主席给我们介绍少奇同志是管白区工作的。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线》上读到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指导作用的署名‘K. V’的文章，原来就是少奇同志写的。”

“在会议期间，我和杨学诚都发了言。我们从进步学生的思想情绪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工作意见，也谈了个人思想上的一些顾虑。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作了详细的回答。我们

确实有了换脑筋的感觉。会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强调了在新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战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在会议间隙，朱总司令要林彪给我们讲授了游击战术，王震带领我们到桥儿沟练习打枪。”

在离开延安的途中，李昌和黄敬还到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住了几天。李老解释说：“在延安会议时，我们白区来的同志受到了热烈欢迎。很多同志离开大城市已经十年了，有些同志从来也没有到过大城市，看到城里来的同志很高兴。一些老同志对我们青年党员和民先队员充满了热情和期望。关向应同志要我和黄敬搬去和他睡在一铺炕上，晚上听我们介绍白区各阶层动态、‘一二·九’运动和民先队。会后，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就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到部队和战士们见见面。在庄里镇附近部队的大会

上，我和黄敬都讲了话。我们诉说了进步学生听到红军北上抗日和东渡黄河胜利消息时是如何欢欣鼓舞，这次我们看到人民自己武装时的兴奋心情。我们说，爱国学生和民先队员一定和红军打成一片；不久，在抗日战线上，将有许多爱国学生和民先队员参加到工农红军的队伍。红军将士对我们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带着党中央的期望回到北平后，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李老说，“我们针对形势，发动同学们学习军事，参加二十九军主持的学生军事训练。”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民先队员们积极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去。7月28日晚，宋哲元退出平津，北平沦陷。学联和民先队的工作面临着新的局面。

三、到敌后参加抗战和推动救亡运动

1. 组织平津学生大撤退

在北平沦陷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学生撤离北平。李老说：“7月29日，黄敬在石驸马大街东口一家茶馆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我、黄诚、王文彬等人，布置了分头撤离北平的任务，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之后，市委安子文又找学委和学联党团的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王文彬，布置撤退。我们城内的一些民先队干部和队员，立即赶回清华，和杨学诚汇合，还把校警的枪也背上，准备从磨石口渡河去保定。途中发现永定河沿线日军已经布防，除了于光远、赵德尊、李友九等少数几个人冒险突过封锁线外，队伍只好折回，分散入城等待时机。后来，黄敬又把我们找到

他西城的家中碰了一次头，根据当时平津已经通车的情况，决定化装坐车到天津，再继续撤退。”

在学生撤离到天津后，下一步怎么走，是学生领导干部必须考虑的问题。李老说：“8月10日，蒋南翔、我和杨学诚、李哲人、王德、李华等同志，在叶方家里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对撤退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北上’，留在华北同农民一起打游击，一是‘南下’发动群众，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我和蒋南翔各申述一种意见。我阐述的理由是：刚刚参加的全国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号召华北爱国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对日作战。而且，民先队向来就是以促进抗战为宗旨，平时就作游击战训练，拿起枪杆投身抗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南翔同志也阐述了他主张南下的理由。”

以当时的情况看，平津学生撤离了沦陷区有组织地乘船经烟台、青岛到了济南后，大批学生骨干，除一部分如刘居英、孙传文、林一山、余修等留在山东外，都经济南转太原，分赴华北各地参加抗战；而大量南方学生自行南下，或在本地开展救亡运动，或复校复学，而其中一部分学联骨干、民先队员也集中南京。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配合学联的工作，民先总队部几个人商量，由丁发善（丁琇）担任民先队南京地方队部部长，后来又由武衡和张震寰担任徐州地方队部部长。现在回过头来看，组织学生北上是很重要的，南下也是需要的。

2. 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部是动员爱国青年学生奔赴抗日战场的大兵站

“我和部分同学到济南时，这里已建立‘平津流亡同学会’。”李老说，“‘平津流亡同学会’，实质

上是学联和民先队的办事处，为大家争取各方支援，免费食宿行等问题。我到济南后，又和一部分同学转车去石家庄。在月台上，我碰到了同济大学共青团老战友饶斌，他姐姐就在石家庄一所小学教书。我们便住在这所小学里。我见到了石家庄民先队部负责人陶鲁茄和他的哥哥陶希晋（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转车到了当时的华北抗战中心太原。”

太原已建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临时总队部，这是先从北平撤离出来的于光远等同志建立起来的。李昌到太原与于光远汇合后，立即投入了工作。李老说：“我们依托太原地方队部负责人马寅等人开展输送干部的工作，同时和北方局彭真、林枫同志取得了联系。当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〇师北上路过太原时，宋尔纯、饶斌、康世恩和王季青（后来是王震同志的夫人）随军奔赴战场；李俊明、徐达本等随彭真同志和黄敬到晋察冀和冀中；牛荫冠、纪毓秀和凌松如则早已参加了薄一波同志主持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另有一批干部输送到延安学习。民先总队的杨雨民和杨克冰等参加了杨秀峰教授组织的太行山师生游击队，李哲人后来到晋南开辟根据地去了。流亡同学会和民先队部成了输送干部的大兵站。”

8月底，民先队总部派于光远到汉口，成立民先队总部办事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工作。9月，为了发动敌后人民、迅速壮大抗日力量，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命李昌到南京去，动员民先队员和平津学生到前线参战。李老说：“我到南京后，在方琦德的家，和蒋南翔、段尚祺（段君毅）、李华等见面，

说明来意。但他们说，南京也需要平津学生，来推动和打开群众抗日运动的局面。我又由蒋南翔陪同，见了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博古，也没有得到支持。我只好回太原复命。”

此后不久，南京形势恶化，国民党当局逮捕流亡同学会负责人，强制对他们军训。蒋南翔也由北方局调回了太原。

11月，太原沦陷，民先总队部随北方局撤退到临汾，这里又成立了流亡同学会。由蒋南翔主办“动员报”，蔡颀刻蜡板出版，传播抗战信息，宣传党的主张，影响很大，连国民党军人都争相购买阅读。北方局杨尚昆同志也为这个报纸写过社论。关于民先总队部的情况，李老说：“总队部这时由我、陆平、顾大川、丁浩川、夏英、徐明、赵志萱等一起负责。我们积极开展战地青年和群众工作，尚昆同志还特意向我们介绍了过去苏区农村青年和群众工作的经验。我们还创办了秧歌‘动员剧团’，由金鹏举负责。剧团每到一处，群众派人远道迎迓，常常演出后不让离开，情绪很是热烈。”当时，演剧是宣传抗战的有力形式。杨易辰、荣高棠、张瑞芳等组织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一带活动，影响很大，荣千祥因演抗日小调卖梨膏糖而出名，他也改名为荣高棠了。

在临汾的同学会和民先队总部，仍然是输送干部的兵站。李伟和薛公绰就是在这时被介绍到八路军炮兵团的；留法学生吴子牧和江枫也是从这里走向敌后战场；清华的宋平和陈舜瑶，从这里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学习。当时，还发动了大批以民先队为骨干的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文化工作。如清华的赵石等，就参加过汤恩伯的十三军战地服务

团，还有很多人参加抗敌演剧队。只是后来都被赶出来或解散了。站住了脚的，即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有在胡宗南第一军服务的熊向辉、陈忠经和申健等。

3. 国民党压制救亡运动，李昌在西安逃脱特务追捕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仓惶迁往武汉。为了抵抗日寇的进攻，不得不表示依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时，武汉开放民运，群起救亡。在“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会上，平津学生和武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建立了先进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团。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1938年1月，李昌受刘少奇同志指派，到武汉动员爱国学生到华北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李老说：“我到武汉后，住在青年救国团团部，和蒋南翔、杨学诚见了面。鉴于当时形势的发展，武汉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拿起武器打游击的前景。我又和南翔、学诚等交换了意见。青年救国团召集1000多人开大会，我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我们的认识一致，我完成任务返回了临汾。”

在此期间，很多人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如黄诚，就在新四军政治部任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死于国民党集中营；后来杨学诚也在湖北乡下打游击，成为李先念、陈少敏同志为首的豫鄂边区创造人之一。

1938年2月，临汾又告失守。民先队总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撤退到西安。3月，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大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邓颖超、徐特立，国民党一方有陈诚、黄琪翔、康泽、邵力子，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也参加了。所

以，这次大会影响很大。会后，各级的国民党政府也组织了青年救亡团体。

在西安，陕西国民党党部组织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西北青年抗敌先锋队”。但这两个团体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基调，对当地的“西北青年救国会”和来到这里的民先总队部，采取排挤打击的手段，陕西省党部也对民先总队部不予承认。李老说：“我们的工作首要的是在西安取得公开合法地位。5月中旬，我和几个同志又到省党部，找到书记长郭紫峻，对他们不承认民先队的做法，据理驳斥。说得他理屈词穷，他把桌子一拍，板起脸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了，我不吃这个。我们国民党的政权，是流血得来的，你们如果想要当政，那就请吧！’

“从省党部出来，我知道，国民党不会容忍民先队在西北活动的，便提醒同志们提高警惕。果然，有一天早上，我们刚起床，中共陕西省委派毕于仁通知我赶紧隐蔽，说内部消息，国民党省党部已下令抓我。我们立即处理文件，收拾东西。就在这时，有几个警察到了院内，看样子不像抓人的。一问，原来是附近的警察分局例行公事，催促和检验救亡团体登记的。我趁机大摇大摆到警察分局，说明正在办理登记手续。了解到分局长是华北沦陷区的人，我就大讲全国人民和各党各派要团结抗日的道理。最后，他客客气气地送我出来。我一转身就跳上黄包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问了问情况，立即让我到西青救办事处附近的宣侠父家里避一避。下午，西青救办事处和宣侠父家周围，布满了宪兵和警察。我藏在他的床上，挂着帐子，特务进院搜查，也没有看到。黄昏后，林伯渠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个同

志，以看望宣侠父的名义，来到他家，然后把我夹在几个人中间，一拥上了汽车，开回办事处。脱险后，林伯渠还怕特务闯进办事处抓我，又连夜送我到正在西安的新安旅行团隐蔽。过了两三天，风声小了，才又叫我化装成八路军军官，坐火车到了武汉。”

讲完这段脱险经历后，李老又补充说：“在这之前，约5月上旬，我曾奉召到延安汇报工作。当时由洛甫主持会议，参加的人有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冯文彬等同志。我汇报民先队的工作后，少奇同志肯定了民先队这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在青年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陈云同志兼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委员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高郎山和我。”

到武汉后，李昌又参加以宋一平为书记的长江局青委，和于光远、黄华等一起工作，民先队总部也从西安迁到武汉。李老说：“这时，总部有我、于光远、丁浩川、殷参等。长江局书记王明，决定加强民先队，想以民先队和三青团结

成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湖北省也成立了民先队省队部，负责人有孙世实（队长）、韦君宜等人。”

但是，不久，国民党就开始了取缔救亡运动的行动了。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个爱国团体，并11月13日在贵阳以召集训话为名把八十多名民先队员逮捕，后来把为首的张益珊等5人枪毙。为了逃脱国民党的再一次追捕，9月，李克农帮助李昌化装成为八路军军官，随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

谈到回延安之行，李老说：“我们途经西安时，周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和老师的身分，严辞向胡宗南要回了西北爱国五青年（民先队西北队长李连璧、西安队长于志元等）。到了延安，中央在北门外广场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主要是欢迎王明和周恩来，也欢迎爱国青年重获自由。我当时像一个在外受到莫大委屈而回到家的人，感到温馨而心情舒畅。”

此后，李昌便和冯文彬一起，作为青年工作者列席了中共六中全会。11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下，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会议鉴于国统区镇压抗日运动，西青救、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已难以存在，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而抗日民主根据地青年运动已从城市转入农村，由和平转入到武装斗争，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乡村青年，组织形式改为广泛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半武装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因此，学联、民先队和青年救国团等都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由新的各种形式的青年团体取而代之了。各青年团体共同组成了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冯文彬任主任，李昌任副主任。

60年后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李老说：“正如龚自珍诗所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一·二九’和运动中诞生的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战，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到过。我作为一个‘一二·九’战士，追随革命前辈之后，是终身无悔，豪情满怀的。从五·四运动和党成立以来几代人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现在已开拓出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时代。”因此，他寄语我们青年一代，要发扬“一二·九”运动中青年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继承先进骨干组织和广大青年结伙伴，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和团的带头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 洛松）



李昌（右）与本文作者

港岛聚英

——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在香港的抗日活动

● 马仲廉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门口上方挂着一块醒目的横匾——粤华公司。这个公司是经营茶叶生意的，经理叫连贯。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商号，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港办）的工作机构，是为了不妨碍港英当局的“中立”地位，以公司做生意为掩护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接着华北大部和平、沪、杭失守。沿海港口被日军封锁。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就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渠道。由于英国当时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得以在这里角逐，国际斗争的变幻在这里也及时反映出来。1937年底，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会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经卡尔同意并获得港英当局应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初成立。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中共南方局委员和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连贯负责办事处的日常事务，潘汉年也参与领导。

港办成立之际，一批曾经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界人士撤退到武汉、广州和香港等地。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在广州的这些人士又转移到香港。港办即团结在港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新闻、出版、电影、戏剧各界建立了宣传阵地。

为了开展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宣传工作，港办创办了《华侨通讯》，并在1938年到1939年间，组成进步文化团体。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领导人范长江、

胡愈之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参加这个分会的除国民党和汪（精卫）派的报纸外，香港各报如《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珠江日报》、《时事晚报》、《新生晚报》、《星岛晚报》等均有编辑、记者参加。这些报纸都大量转载延安新华社、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和新闻报导，宣传抗日，特别是注重报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抗日的情况。不久又创办了中国新闻学院，先后办了三期，培养了180多名抗战急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新办的进步文化刊物有《文艺阵地》等10多种。

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文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戴望舒、许地山、叶灵凤、陆丹林、徐迟、袁水拍等71名香港和内地的在港作家。文协下设文艺通讯部，创办了《文艺周刊》，文协研究部还创办了三期文艺讲习会。参加讲授的著名作家有许地山、刘思慕、戴望舒、黄绳、端木蕻良、简又文、林焕平、叶灵凤等。

一些电影、戏剧界人士编导演出了许多抗日的电影与戏剧，并指导港九地区工人、学生展开抗日的戏剧活动。1937年全国抗战展开以后，港人初山笑、林坤山等倡导发起华南电影界赈灾会。在港的六家电影公司响应这一活动，合拍了反映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最后关头》、《前进曲》、《回祖国去》、《女战士》、《儿女英雄》、《华南烽火》、《抗战伟绩》、《民族罪人》等进步影片。1938年4月，由蔡楚生、司徒慧敏合编的《血战宝山城》在港演出后，受到香港同胞的热烈欢迎。之后，他们又推出《游击进行曲》。此片于1938年底上映。

后，港民精神为之振奋。1939年9月蔡楚生改编的《孤岛天堂》，其中的《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风靡港岛。由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影片《白云故乡》，于1940年3月在香港上映后，广大青年为之激动，纷纷返回内地，走上抗日前线。

1940年6月，由蔡楚生编导的电影《前程万里》，宣扬了“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

1939年初，金山，王莹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团到达香港，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该团在香港演出半年，之后，转移到南洋演出。

二

文化艺术界活跃在香港的同时，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群众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也活跃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

1938年6月14日，以宋庆龄为主席，宋子文为会长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成立了。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向世界宣告：“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救济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宋庆龄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嫌怨，团结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为保盟的发起人。作为保盟发起人的还有中外著名人士冯玉祥、颜惠庆；印度民族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英国知名人士克莱·布恩，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保盟的办事人员许多是中外著名人士，如，名誉书记是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布尔达·沙文——克拉克女士，司库是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郎士，担任宣传的是原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参加了保盟的工作。廖承志为保盟的中央委员。

因为宋庆龄的特殊政治地位，在她领导下的保盟的主要工作就是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支持中国抗战，而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舆论宣传则起重大作用。在爱泼斯坦的主持下，保盟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在初创阶段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出版发行了七种宣传品，其中五种是油印的《时事通讯》。1939年4月1日，正式铅字出版了《保盟两周通讯》，同时出版了



中共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

《保盟报告》和各种小册子。宋庆龄除广播演说，致函海内外朋友外，并发表文章申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她的文章也经常发表在保盟出版的刊物上。她在《保盟通讯》第24期（英文版）刊登短文《圣诞节致读者》，文章的开头说：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时刻，这时，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互相赠送礼物，但是许多人将不能欢度今年的节日，许多家庭甚至不能团聚。

“你们是否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是否知道我们北方的游击队员需要冬用毛毯，我们的伤病员需要药品，我们的难民和战争孤儿需要寒衣、食品以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吗？”

她在这篇短文中还提出西方国家在欢度圣诞节的时候，是否想到中国的“人民已经战斗了三年多的时间。这个战斗实际上也是你们的战斗。”抓住了西方读者的心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保盟还同港办配合，翻印、出版中共领导人的论

著，在港澳和海外发行销售。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还翻印了中共长江局的机关刊物《群众》。这些书刊广泛发行到欧美、东南亚各国，对于宣传中国人民真实的抗日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保盟在宋庆龄领导下，取得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团结了大批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争得了巨额捐款和大批物资救济灾区难民，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并介绍了一批批国际朋友和医疗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仅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经保盟捐助中国抗日斗争的就是遍及美、英、加、新、印等各国的社会团体一百多个及无数的个人。而保盟将这些捐款即分配给最需要的地方。1938年9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向保盟提供2450万英镑，在中国建立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决定将这个医院建立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巴苏、米勒等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保盟在积极争取外援的同时，还在香港组织义演。1940年2月6日和8日，香港首次公开举行援助华北八路军的义演。10月18日在香港半岛旅馆举行音乐舞蹈演出会。宋庆龄亲自到门口迎接客人。从特立民达和伦敦路经香港回国的青年舞蹈家戴爱莲、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长笛演奏家沃尔特先生，表演了精采的节目。宋庆龄特邀著名画家叶浅予设计舞蹈中用的农民服装。戴爱莲同叶浅予通过这次成功的合作产生了爱情，宋庆龄亲自为他俩证婚，在寓所为他们备酒祝贺。

三

1938年到1940年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香港战时文化的高潮和繁荣的到来打下了基础。然而，在发展中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绥靖政策，香港的政治形势随之变得复杂化。港英当局根据英国政府“对抗日言论当注意抑制”的意旨，限制抗日活动，压迫抗日言论，《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在港发行日益困难。一批批国民党委员频频到香港活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港总部书记吴铁城进一步控制舆论，加强反共宣传。汪（精卫）派办的《南华早报》、《天演日报》、《华宇》与日本在港办的中英文《香港日报》相配合，加紧反共宣传，并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宣传。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赴越南河内，30日，在香港发表通电叛国。

1939年1月，廖承志在《抗战文学》声讨汪逆，专刊发表《汪精出走以后》的文章，严厉谴责汪精卫的罪行。香港文化界掀起了打击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之汪精卫”的热潮。香港文化协会发动会员及会外爱国民主人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和平文化运动”的汉奸谬论。汪派《南华早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的工人发动了反对投降卖国的联合罢工。

1939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香港各进步报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辉煌战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赢得了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即注视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的发展。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同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发出“致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委诸同志”函，谴责国民党剿共内战，违背民心，要求他们“遵循总理遗训，‘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月14日，宋庆龄又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合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斥国民党“最近讨共之声，竟甚嚣尘上，”认为此将使“抗战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旦。”

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的消息传到香港以后，宋庆龄于18日同何香凝、陈友仁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此电在19日的香港各报发表。

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掩盖其制造事变的罪行。为了让国内外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廖承志在1月19日保盟召开的会议上报告了皖南事变的情况，宣布了中共中央抗议电文，说明共产党仍然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希望国际人士主持正义共挽危局。廖的报告，引起与会人士的同情激愤，港府医务署署长，保盟成员司徒永觉提议，立即电告伦敦援华委员会；贝特朗也提出立即电告斯诺，并同时向英、美公布。电报稿经香港当最高检查人特准拍发。

当日，港英文《南华早报》登出了皖南事变消息，并发文责问国民党。21日该报除将廖承志在保盟会议上的报告全部发表外，并有长篇评论文章。《保盟通讯》从1941年2月15日第26期开始，连续发表文章，详细报导皖南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袭击的经过，并抨击国民党倒行逆施。

由于港办和保盟的努力，当国内大多数人在国民

党新闻封锁下还不清楚皖南事迹真相时，国际上已经普遍响起了抗议国民党声援共产党的舆论。

四

皖南事变后，大批文化界和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由重庆、桂林等地涌入香港。3月24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和重庆周恩来，提议在港建立党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在宣传、文化方面成立新闻、学术、文艺、妇女等座谈会。经中共中央同意后，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于1941年5月正式成立。

中共香港大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张友渔、胡绳、夏衍为委员，下设学术、新闻、文艺三个组。

学术组组长胡绳，张铁生、乔冠华、张友渔参加。在讨论一般学术工作时，邀请戈宝权参加。学术组的主要工作是国际问题的研究，出版事业的讨论和对各杂志的领导。其国际问题资料室由张铁生负责，叶籁士在其中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学术研究会由胡绳实际主持，参加人员除全组外，另有董文建、林伯修、戈宝权、陈翰生、于毅夫、千家驹、沈志远、金仲华、张明养、龚澎、杨东莼。组内有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沈志远主编的《今日论坛》。另，《生活书店》由胡绳任总编辑，并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之座谈会。

新闻组组长张友渔、乔冠华、黎树昌、郑书祥、吴全衡参加中国通讯社小组。黎树昌主持国际新闻社。廖承志也参加新闻组的工作。参加新闻座谈会的人员有金仲华、范长江、张友渔、乔冠华、廖沫沙、恽逸群、张明养、胡仲持、羊枣。

文艺戏剧组组长夏衍。尤竞、杨刚、章泥参加。夏衍主持文艺座谈会，尤竞领导电影党小组，章泥领导戏剧党小组。参加的人有罗志权、李枫、李殇伦。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有夏衍、茅盾、胡风、戈宝权、葛一虹、杨刚、黄药真、蔡楚生、叶以群、尤竞。文艺杂志有《时代文艺》、《新流》、《笔谈》、《电影与戏剧》。参加戏剧座谈会的人有夏衍、章泥、宋之的、金山、凤子、葛一虹、尤竞、蔡楚生、司徒慧敏。另外建立了一个文艺通讯社。

文化问题研究由于毅夫负责。参加人有戈宝权、韩幽桐、周鲸、尤何镜、张华秉等。

参加救国会干事会的有邹韬奋、杨东莼、张友渔、金仲华、李章达、韩幽桐、陈此生。

妇女小组负责人吴全衡，胡乃礎、沈潜参加。参加妇女座谈会的有刘清杨、韩幽桐、廖梦醒、梁澍德。

新美术社，参加的人有肥老、特伟、邵风、黄新波、丁聪、张光宇等。

国际文艺宣传方面，英文中国左翼文坛月刊，参加者夏衍、杨司粟、柳无垢、乔冠华、贝特兰、爱泼斯坦、稟格尔登，还有美国驻香港副领事华德。

国际宣传小组主持人黄维健。参加者有乔冠华、杨司粟、黄药真。出版《新中国通讯》（英文）。

如此严密组织起来的大批文化精英，在一个城市内，按照分工的各系统开展工作，给香港文化方面带来空前繁荣。周恩来十分重视和关怀这批文化人。当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之际，周恩来于1941年5月7日致电廖承志提出了工作方针：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为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的习气和作风”。

廖承志遵循周恩来的教导，团结和领导了香港文化界这批知名人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五

1941年2月，廖承志召集夏衍、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创办一份报纸。2月10日，廖承志电报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示：

“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定名《华商报》，由邓文钊等作老板，胡仲持任总编辑。编委则由长江、夏衍、逸群和我担任。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们每月津贴一千元港币。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示。”

报名定为《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是为了能够在香港公开发刊，避开敌特分子的注意和便于寄往南洋各地。中共中央于当日即复电同意在香港出版《华商报》，同时指出“报纸基本政治面目应是主张抗战团结的中间派。”

4月8日，《华商报》问世。由香港华比银行帮办邓文田、邓文钊办注册手续。邓文田为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钊、范长江为副总经理，胡仲持为总编辑，陆

浮为采访部主任，张惠道为营业部主任。后来，又以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

《华商报》从创刊号开始连载邹韬奋的《抗战以来》20万字的长文，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罪行作了无情的揭露。范长江的《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也在报上发表。7月7日，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许地山、夏衍、胡风、许广平等人署名的《致世界作家书》，呼吁全世界文艺界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作家联盟。副刊《灯塔》登载了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解放区的光明。还先后连载了巴人的《沉沦》，艾芜的《故乡》，前者对侵略者和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后者唤起人们同黑暗势力斗争的决心。

《华商报》发行不久，国民党特务便多方捣乱和破坏，致使发行量下降，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也攻击《华商报》。对此，《华商报》与《国家社会报》、《大众生活》《时代批评》结成统一战线，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周恩来十分关心《华商报》。他在6月11日致中央书记处转廖承志的电报中指出，“报的面目仍以现在的方式，

并由邓文田出全资本为好。因一则易于应付港政府，二则使港政府易于应付国民党（我正拟向卡尔做些工作），三则资本有着。如果以救国会出面，韬奋主编，国民党必跟踪追击，势非弄到封闭不可。请将此意直告长江，并转告韬奋。”又指出，“《华商报》内容已经暴露了许多，详情容研究后再告。”8月31日，周恩来再次指出《华商报》存在的问题。他说，《华商报》“做得太琐碎（有些道听途说不合事实的材料）、尖锐，就是中间分子也有些感觉。不仅黄炎培，甚至沈老（即沈钧儒——笔者）也觉得有些太过。”“国民党无论如何总是要压迫我们的，但如果我们态度较好，可多争取中间分子，不可太刺激英美港政府，总好做一些，不仅报纸应如此，即是对外谈话的态度也应如此。”“香港是我们同美国和南洋联系的据点，我们应求得：住这一据点。”

在《华商报》出版发行期间，由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于5月17日在香港复刊。这一刊物一经发行，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平均每期达到十万份左右。在此刊物上连载的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引起了广大读者强烈反响。小说以日记体裁，通过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受骗、犯罪到觉醒自新的过程，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血腥罪行。

《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报刊的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向到重庆的香港警查总监俞允时提出，取缔在港出版的《华商报》、《大众生活》和《国家社会报》。俞回港后将此情况同宋庆龄、邓文田、邹韬奋、廖承志交谈。国民党当局还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比利时政府转致比利时银行总经理，压迫邓文田停止督印《华商报》。国民党中央社不发通讯给《华商报》并企图破坏《华商报》与印刷厂的关系。为对付国民党的压迫，《华商报》由邓文田、陈嘉庚合办的公司继续出版。《大众生活》也在国民党反动分子百般刁难下继续奋斗。

1941年9月1日，茅盾主编的综合性文艺半月刊《笔谈》出版发行，它内容广泛，文体多样，文字精炼，以直接或间接揭露国民党的丑恶面目为主，同《华商报》副刊《灯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合影 前排右起：廖承志、夏衍、茅盾。后排司徒慧敏（右）、郁风（中）、潘汉年（左）

塔》一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惜出版不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一切进步报刊即停办了。

在影剧界，司徒慧敏、金山、宋之的、章泯、蔡楚生等发起成立了“旅港剧人协会”。于伶的《夜上海》由大观公司的罗志雄导演搬上了银幕。在皖南事变后，大观公司还推出了李枫编剧，罗志雄导演的《小老虎》。剧中一位农民战士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这是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的揭露和抗议。在香港的舞台上，“旅港剧人协会”还先后组织演出了暴露国民党腐败丑恶行径的《雾重庆》和鞭挞法西斯暴行的《希特勒的杰作》。

六

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不同内容与形式的研究会、座谈会，由于参加者都是有造诣的知名人士，研究和坐谈的主题是当时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成果又及时地由报刊发表，推动香港和海外侨胞间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香港人沿习英国喝下午茶的习惯，在每日下午纷纷到饭店、茶座喝茶。大批文化界人士虽然工作很忙，也常到饭店喝下午茶。而这种喝茶实际上变成了讨论时事的“茶会”。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的“阁仔”咖啡店是文化界人士经常去的地方。这里每天必去的人有夏衍、乔冠华、杨刚、郁风、徐迟、冯亦代等人。廖承志也经常来这里盘桓。他表面上是在这里闲坐，实际上是会客和洽谈工作。

1940年6月10日下午，在挂着猫头鹰招牌的“聪明人”咖啡店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辩论会，主题是当时欧洲西线战事情况。一大群中外记者正在对法国的前途争论不休。这时，一个宏亮的声音震动了与会者。

“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会不战而降！”

“怎么能这么说？”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为什么？”有人提问。

“一百年内，巴黎圣母院曾经五次看见了普鲁士的闪烁炮火，1814、1815、1860、1914、1918，难道不能有第六次吗？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说过，要保卫巴黎，必须武装工人阶级，这一点就在今天也还做不到啊！”下此结论的人，就是《时事晚报》的社论撰稿人乔冠华。对于乔的判断，在场的新闻记者们都认为看得太悲观了。

第二天的《时事晚报》发表了“巴黎将于两日后不战而降”的消息。这个报导立即震动了香港。6月13日

巴黎投降了。14日德国军队进入巴黎。

这样的辩论会、座谈会，当时在香港几乎天天在召开。

当时在香港，人们认为有“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三个是乔冠华、金仲华、张铁生，半个是张友渔，而乔冠华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每日活动在这个饭店，那个酒吧或咖啡店；不是在这里报告，就是在那里参加座谈会。他在“临终前身世自述”中，讲到在香港的这段历史情况时说，“当时是国内抗战的低潮，正义的青年都在苦闷，都希望了解形势，都在寻找出路。所以他们纷纷地组织各种读书会，什么银行界、基督教青年会，各行各业吧！有时他们请我去作报告，我怎能参加那么多读书会，我只能给他们讲讲话，或帮他们搞起来，我采取这个办法，答应他们去出席一、二次，鼓励他们搞，搞起来以后由他们自己去办。”“另外，我做的比较多的是做报告、演讲会，当然这个范围就更广了，爱国的华侨，爱国的港澳同胞组织，爱国的学校，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地说，我是通过报告会，亲临这些地方。”

各种形式的集会和进步报刊发表的大量的言论、报导，还有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洪流，汹涌澎湃地游荡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

1941年12月8日（美国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夏威夷的珍珠港实施大规模的突然袭击，美军损失惨重，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军侵华派遣军第38师团沿广（州）九（龙）铁路向九龙半岛进攻，从当时英军部队的实力看，是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的。圣诞节过后，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聚集在这里的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也必将成为敌人捕捉的对象。

中共中央十分关怀在港的文化界人士，一场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秘密地展开了。关于这次秘密大营救，笔者在另文阐述。

（责任编辑 萧徐）



“六十一人案” 平反昭雪的前后

●戴煌

一、“六十一人案”的 来龙去脉

在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案件，就是平反“文革”中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六十一人案”。所谓“六十一人案”，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寇势力蚕蚀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入了抗日斗争。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入党的老党员；有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干部；也有当时还没有入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

要职务。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有些人刑期已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其时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缺少得力的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步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经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他迅速派人将决定转送狱中党支部，要求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北平市委另一位负责人徐冰委派当时担任地下交通的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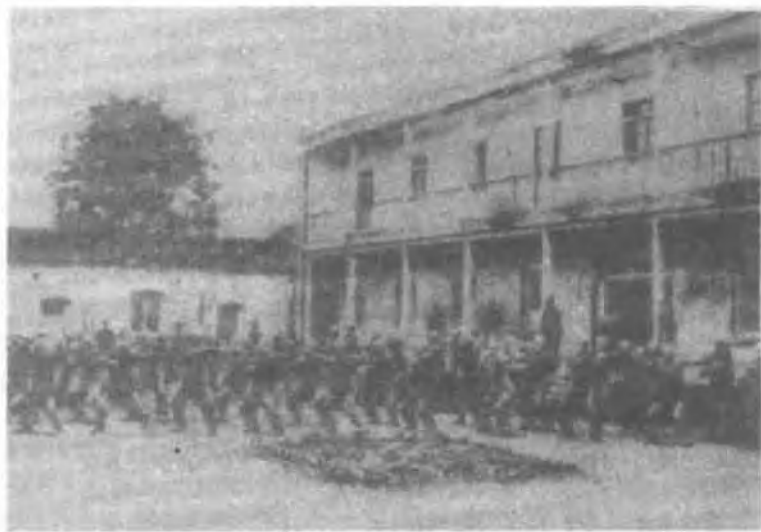
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让我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还开玩笑似地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主席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主席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



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专请康生吃饭，工作团全体成员也“参席”。

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占据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

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的，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个人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写“自首书”的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这件事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

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和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40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13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这些幸存的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说：“南开‘8.18’、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大抓“叛徒”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总理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

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被国民党或侵华日寇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61人也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0位老同志惨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说：61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强迫一些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了北京：安子文去了安徽淮南，刘澜涛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连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那些人也曾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还要派人押送他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地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对薄一波不止一次地警告或“提醒”：“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

以从宽考虑。”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不要写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二、王先梅上诉——“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

粉碎了“四人帮”，尤其在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1977年11月11日，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逝。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孔祥祯在这封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没想到，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

些人依然冥顽不灵，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还是照样坚决不去。双方正在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当他提出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时，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恰巧，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之一王其梅的遗孀。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遵照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已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后又转入新四军的老同志，此刻与4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4处。后来，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8岁到16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

干校。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京，王先梅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经周总理批示，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是，孩子的户口未能在北京落下，却被转到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此后，孩子们在分配工作、参加政治活动等方面，都因其父“六十一人案”问题未解决而屡遭磨难。

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

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翻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

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王建梅、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小屋，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们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10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同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



1939年，在晋东南地区拥护抗战、反对投降的群众大会上，朱德（中）、薄一波（右）、傅钟（左）在主席台上

题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评论员文章。

这篇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作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地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到来。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了。

三、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

然而，人们对问题不能想得太天真了。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这些负责同志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他们强调，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

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胡耀邦说：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同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中央专案组所接受。

按照他们这种说法，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六十一人案”的所谓“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徒”、“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这样做，哪里还谈得上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了。在这种情况下，耀邦断然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胡耀邦很快把中组部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先后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们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然后才向大家下达了“另起炉灶”、

重新搜集材料的动员令。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毛泽东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就这么办。

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未几，小平同志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1978年6月25日，他在其中的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胡耀邦对参加复查的同志说：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必须查清楚。过去在搞“六十一人案”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些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真实情况，从“结论”上是看不出一些影

迹的。所以，我们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分清是非，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材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吃完饭，耀邦象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侧面对坐在旁边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抽空去看看薄老薄一波？”

贾素萍，一位忠诚干练的老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她就担任过太行兵工厂的党委书记。她连忙答应：“这就去。”当天下午，贾素萍等四人就去探望无家可住、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



1978年12月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的薄一波。其时，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派”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听说是胡耀邦派人来探望他，十分感动。

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我们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贾素萍等四人请到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此后，贾素萍等四人又找到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楨等多人，逐一交谈。接着又连续奔波数月，访问了被下放到安庆的刘澜涛、淮南的安子文，以及山东、天津、吉林、陕西等地所有受迫害仍然健在的同志。

回来后，他们研究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

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初期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浹背地跑到当时仍为“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下转50页）

长征途中的「孙胡子」



红军时期的孙毅

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途中，有一位“而立”之年的年轻人，鼻子下边留着一撮黑色胡须，手上经常拄一根木棍，在行军队伍里跑前跑后。这就是先任师参谋长、后任军团参谋长的孙毅，人们津津乐道的“孙胡子”。

“孙胡子”一名的由来

清朝末年出生于河北大城县的孙毅，青年时代千里奔波，浪迹天涯，寻求出路。他在旧军队谋事11年，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和反蒋战争，由士兵升至中校团副。

孙毅所在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南都举行起义，步入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从此，27岁的孙毅获得了新生。

孙毅在担任红军学校军事教员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升任营里的主任教员。这时，红校广泛开展文艺活动，多才多艺的孙毅，当了训练部俱乐部主任。他经常带头编排节目，教唱革命歌曲。他那嘹亮的歌喉，受到大家的称赞。

每逢重大节日，学校举行文艺



九十岁高龄的孙毅

演出。有时叶剑英校长亲自拉二胡，何长工、李伯钊（女）、赵品三等和教员、学员同台演出，热闹非凡。

赵品三编了一个名为《活捉敌师长》的活报剧，反映的是部队的真人真事。由谁来扮演这个蓄着小胡子的敌师长陈时骥呢？负责物色演员的李伯钊、赵品三，一下子便想到了留着胡子的孙毅。

演出的那天，舞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红军战士顽强追击下，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如丧家之犬，四处碰壁，走投无路，无奈举起了双手。演出结束后，赵品三拍着孙毅的肩膀夸奖说：“你演得很成功，人们说你演得太象了，没有想到你的‘胡子’还真派上了用场。”

二人哈哈大笑过后，和孙毅同岁、性格爽朗的赵品三，两眼盯着孙毅的胡子，好奇地问：“老孙，你这胡子是什么时候留起来的？”

孙毅说：“要说我这胡子，是21岁那年留起来的，到现在已经八个年头了，那是1925年，我在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当兵，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两个月。由于缺乏营养，病好之后，脸显得又瘦又长。有位好

●赵勇田 全玉林

友劝我留起小黑胡，会显得精神些。从此我便蓄起了胡子。”

孙毅留起小胡子之后，虽然也有人不同意，但性格倔犟的“大城之子”，全然不顾。他走南闯北，探亲娶亲，晋见官长，都因蓄着小胡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认识孙毅的人，开始戏称他“小胡子”，久而久之，便把他叫成了“孙胡子”。

在工农红军队伍里，当孙毅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滕代远等高级领导人时，孙毅的小胡子都曾引起过他们饶有兴味的议论。

没有“四条腿” 还有两条腿

1934年8月下旬，赣南瑞金。一天上午，担任军事教员的孙毅正在备课，突然接到通知，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请他马上去沙洲坝军委总部。

叶副参谋长见孙毅满头是汗地赶来，随手递给他一把扇子，开门见山便说：“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应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中央决定尽快组建一支部队——教导师。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已经确定，教导师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嘛，刘伯承同志指名叫你担任，我完全同意，今天请你来，是正式通知你的，看你有什么意见？”

从事部队管理教育工作多年的孙毅，当然懂得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何况刘伯承、叶剑英两位老校长对自己如此信任。于是霍地站了起来，立正说：“坚决服从命令！”

在瑞金城西19公里的陈村（高围村附近）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

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并保障其安全。有关警卫、安全的业务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领导。因任务紧急，军委参谋长刘伯承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克服各方面的困难，8月底完成组建，9月初开训。

尚在粤赣军区担任司令员的何长工还没来这里上任，师长张经武和参谋长孙毅集中力量抓部队组建。几天之内，地处闽赣地区的瑞金、会昌、兴国、汀州、宁都、于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补训团和游击队的成员，纷纷结队前来报到。

全师编为三个团，每团1700人，加师部各直属队，全师共6000余人。来自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大都年纪在17岁至22岁之间，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精神饱满，情绪高昂。孙毅看了心中充满喜悦。

8月底，教导师准时组建完毕。孙毅根据刘伯承参谋长“立即投入政治、军事训练”的电话指示，制订了《新战士训练计划》，经过张师长审定后，又亲手刻在蜡纸上，油印后发给连队遵照执行。

赣南的9月，仍是烈日当空，干燥闷热。教导师的指战员们，在骄阳下苦练杀敌本领。练习射击、刺杀、投弹，并开展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的军训比赛。

这个难忘的10月10日，是教导师出征的第一天，几千名红军健儿、特别是江西老表，就要告别这里的父老乡亲们了。各连队都杀了猪，官兵中午聚餐。

张经武师长从军委总部开会回来，传达了总部会议精神之后，把孙毅叫到自己的住房中，面带为难之色说：“老孙呀，有件事你可能预料不到……”

“什么事？”闷在葫芦里的孙毅追问。

“你可别生气呀！”

“到底什么事呀，你就说吧！”

这时，张经武才不得不把事情合盘端出。原来，在布置完远征任务后，讨论领导干部的乘马问题时，一惯独断专行的军事顾问李德，得知参谋长孙毅是从白军起义过来的，手里的兰铅笔一挥，便把孙毅名下的“马”字勾掉了。尽管张经武为孙毅争辩，最终也无济于事。张经武说：“老孙同志，看来，你要吃苦了。”

孙毅当时对于这个生于德国慕尼黑奥地利的李德并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他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1933年春随中共中央进入红都瑞金，任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这位高个子、红头发、黄眼珠、高鼻子、满脸络腮胡子的李德，住在瑞金城北郊外一座孤零零的祠堂里，出出进进，是一个神秘人物，红军战士们叫他“独立房子”。但是，由于李德很受王明、博古的赏识，常常是盛气凌人，事无巨细处处干预。这次他既为孙毅乘马问题发了话，只是张经武的几句辩护，李德是不会收回成命的。

好在孙毅性格开朗，处事大度，面对即刻出发远征的军机大事，有无马骑的区区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虽对这位洋顾问有点气，还是忍住了。他幽默地说：“好嘛，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放心吧，我绝不会掉队。”

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孙毅，咬紧牙关，下定决心，靠两条腿行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当然这是后话了。

下午4时，军号声声，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向高围村沙丘一带集合。

教导师就要出发了，利用沙丘高地当会场，孙毅整理队伍，李熙

主持会议，张经武讲话，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感谢瑞金地方干部、父老兄弟的热情欢送。

出发时间一到，孙毅参谋长宣布行军序列后，便插入队伍上路了。

采纳下层意见

两次用“包袱”

为了保密，转移中的党中央和军委统称为“红星纵队”。红星纵队真是一副大搬家的样子，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修理枪械的兵工机器，统统都要搬走。这任务自然落在教导师的头上。

五六百担的东西，包括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以及用稻草捆绑的三五个人或十来个人才能抬得起的机器部件，由教导师的战士肩挑杠抬，经过四个晚上的夜行军，进入敌军控制的赣县、信丰、安远边界，这里即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负重行军的战士十分疲劳。一位名叫郭路的排长不仅坦诚地向孙毅反映了战士们的艰辛，而且明确表示了对“负重转移”作法的怀疑。这一反映深深打动了行伍出身、了解战士疾苦的孙毅。一天宿营后，教导师几位领导研究近期行军小结时，孙毅把听到的郭路排长的反映一一转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经过缜密的讨论，何长工政委说：“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发电报，说明抬运机器掉队的人跟上了主力，但请求上级批准，今后再遇危险道路时，把十来个人抬的机器部件，炸毁后丢进山涧，以保证部队人员免遭伤亡。”这一建议，第二天便接到军委总部“同意”的复电。

浩浩荡荡的教导师进入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这里怪石林立，

深渊万丈。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往陡坡上攀登。抬着大机器的战士，艰难地向上移动，稍有不慎，即可跌入深渊。张经武、何长工、孙毅等果断决定，把两个人和十几个人抬的机器部件处理掉。战士们高兴地当即打开用草包、麻袋包裹着的石印机、大型车床，能砸碎的砸碎，无法砸碎的，顺山势推了下去。滚动的机器部件隆隆作响，战士们拍手叫好。

上百个大件处理后，使一千多战士从沉重的“负担”下解脱出来了。剩余的四百多担装有各种物资的箱子，仍由教导师战士挑着前进。

教导师11月初通过敌军沿粤汉铁路线所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12月1日渡过敌军设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后，经广西北部资源县，向湘、黔边界的通道县方向进发。

途中，部队要越过2000米高的老山界，这里山高路险，行走困难，在险陡的雷公岩下，眼看着二十匹骡子摔下去不见踪影。负责运输物资的一个被称为“大力士班”的副班长，身子一晃便摔下山去牺牲了。不少人在老山界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倒下去就声息断绝。

部队减员严重，翻过老山界后，教导师六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半。在这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东部边城召开了黎平会议。此次会议的重大决策是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放弃北进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根据任务需要，教导师的建制撤销，3000余人分别编入一军团、三军团。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重回军委总部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并宣布张经武调军委分配

工作；何长工调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孙毅去军委干部团任职。

教导师行至黔东施秉县境，召开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黎平会议精神、安排整编事宜之后，张师长宣布：教导师战士所挑的400担机器部件、物资，全部投入乌江之中，然后部队整编。孙毅对郭路排长说：“你们这大力士肩上再没有沉重负担了，轻松多啦！”

不管“参谋”两字 后边有没有“长”

教导师撤销后，孙毅分到军委干部团，任作战科长。不久，调国家政治保卫团当参谋长，和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一起共事。这个团辖两个营，人员精干，装备优良，每人佩带长枪、短枪、大刀三大件。

孙毅背着背包，跟随国家政治保卫团团部走了三天，也还没人找他谈话，更没有人给他分配任务。

一天晚上，孙毅在团司令部桌子上看到军委一份干部任命：“任命孙毅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但仔细一看，“参谋长”的“长”字，有人用毛笔圈掉了。“参谋长”去掉“长”字，不就成了“参谋”了吗？

目睹这张任命状，孙毅心里明白了几分，但他却很坦然，并没有生气。他想：受不受重用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人何止自己一个！那41岁的毛泽东患重病躺在担架上还受人折腾呢！

在向遵义进军的路上，团长姚喆才对孙毅说：“老孙，真对不住你，两三天以来没给你分配工作，我同邓发局长说了，你还是参谋长。”

1935年1月9日，中央机关进驻贵州名城遵义。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议。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深夜一点多钟，月明星稀，寒风阵阵，孙毅带两个参谋在街上巡逻，突然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他们警惕地走上前去，仔细一瞧，原来是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和戴着深度眼镜的张闻天。两人小声地谈着，看样子是刚刚散会。

孙毅向两位领导人问好，毛泽东亲切地说：“你们辛苦啦！”张闻天知道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卫团的干部后，伸手摸了一下孙毅那单薄的衣袖说：“夜间天凉，巡逻时要多穿点衣服。”

历史性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孙毅手捧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如饥似渴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心情激动，欣喜若狂。

两天后，孙毅接电话通知，到红三军团第五师任侦察参谋，没过几天，改任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

该教导大队下设两个队，学员大部分是营团两级干部。孙毅亲自给他们讲课、做示范动作。每到营地时，如天还不黑，便挤时间上一节课。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对孙毅“行军中办学”、“见缝插针”找时间教学的精神，颇为赞赏。

长征途中的孙毅，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也不论事情的大小，他都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做。

北进的中央红军，于5月20日攻占越嶲（今越西）、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为了取得彝族人民的支持，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正当刘伯承总参谋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时候，红三军团的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合影。左起：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
(斯诺 摄影)

一个司务长，因侵犯彝族同胞利益，引起愤怒彝民群起而攻之的风波。彭德怀得知实情，为避免更严重的后果，使全部红军得以顺利北上，毅然决定从严处理，对违纪的司务长执行枪决。彭德怀让孙毅写好判决布告，盖上他的印章，张贴在山寨路口以教育部队，安抚民心。

顺利通过彝族少数民族地区的红军队伍，继续北进。5月28日，红三军团到达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为了火速抢占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红三军团随左纵队红一军团跟进，来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主峰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临，忽而狂风大作，民间素有“神山”之称。

经过千里跋涉、体力虚弱、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过这样的大雪山，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见的。叶剑英对孙毅说：“胡子，你带几个人深入居民中，了解一下怎么样过雪山。”孙毅和两个参谋便到山下晓碾村居民家访问。一位70

岁姓王的老大爷说，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要多穿衣服，上山前喝些姜汤或辣椒汤，最好每人拄一根棍子，防止跌倒。老大爷还一本正经地对孙毅说：“在山上四不准：不准说话、不准嘻笑、不准坐地、不准……若有人故意嘻闹，山神就会发怒，性命难保。”

“山神发怒”的说法，共产党当然不会相信，但这山民的爬夹金山的经验之谈，确实是对红军很有启发的。叶剑英听了孙毅的汇报，当即口述四条指示：一，过山时不能走快；二，官兵不要说话；三，任何人不能坐地休息；四，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他还要求各伙食单位把生姜、辣椒、大葱发给指战员。

在雪山上，孙毅拄着棍子，和战友们手拉手，互勉前进，顽强地同风雪作斗争。他们肚子饿了就吃口炒面，渴了就抓把冰雪。但是，不管多么累，多么困乏，谁也不敢坐下休息，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身

体疲倦到如此程度，只要一坐下去，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

不管前进路上多么艰难困苦，6月14日傍晚，红三军团终于翻过了夹金山，到达达维镇。为了统一红军编制，7月21日，红三军团改为红三军，彭德怀为军长、杨尚昆为政委、肖劲光为参谋长。8月上旬红三军离开黑水、芦花地区。出发前，孙毅担任了红三军的作战科长。

部队开出毛儿盖，奔向草地。

在白茫茫一片的沼泽地面上，半尺深的水，脚踩下去，稀泥立刻淹没膝盖，每走一步，如负千斤。

正向前走，孙毅发现前面的人不动了，他费尽全力过去一看，原来有8个战士陷进了泥潭，两腿越是用力挣扎，身体越往下沉，不一会儿，有俩人便停止了呼吸。

越往前走越困难，不少人的口粮已尽，身体虚弱，军部机关的干部、战士如果不能很快吃到一点东西，要有更多的人躺在这草地上。

彭德怀军长万不得已，忍痛对孙毅下命令：“把军部的六匹牲口，包括我骑的那一匹，全部杀掉，挽救干部、战士的生命。”

历尽千辛万苦，9月11日，红三军及军委纵队抵达甘南俄界镇。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陕甘支队于9月22日在甘南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改编，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红三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孙毅在第二纵队司令部任教育科长。这支队伍，过渭河，走平凉，直插陕北吴起镇。时至11月6日，中央红军和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42年不予更正

的照片说明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原红三军团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孙毅任第一军团教育科长。

这以后的孙毅，既参加过1936年1月下旬的红军东征渡黄河，推动抗日运动；又参加过红军西征——根据1936年5月18日的西征命令，讨伐宁夏反共军阀“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等部。

西征的红军，军团司令部利用战斗间隙，抓紧对师、团参谋长的培训，孙毅在集训班上讲纪律条令、内务条令，还带队出操，组织野外训练。

西方野战军（以红一方面军部队组成）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组织实兵进攻演习。演习开始前接军委通知，说是毛泽东主席请来了一位美国客人，要给大家拍电影。

那个时候说到“拍电影”，在红军部队里多数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孙毅虽在平津大城市看过电影，那也是“无声”电影，不清楚这位美国人来拍什么电影。

部队演习中，只见一位身穿红军灰军服、大鼻子、兰眼睛的高个外国人，背着拍电影的机器不停地跑前跑后。

这位外国人就是到达陕北保安镇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

在演习以后，斯诺在军团部大院坐在板凳上和彭总说长论短。

斯诺建议为彭德怀司令员和其他几位将领拍照。

彭德怀开玩笑地说：“哎呀！斯诺先生，这个照可拍不得呀，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

站在一旁的年轻翻译黄华，把彭司令员的话翻译给斯诺先生。斯诺站起来拍着彭德怀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连声说：“OK，OK，还能拿200万现大洋赏金呢！”

两个人的对话，惹得在场的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彭总一挥手，招呼院里几位战友说：“走，就让他把我们的形象送给蒋介石吧！”

举起照相机的斯诺，拍下了一张6人的合影。从左至右是：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一



本文作者赵勇田（右）、仝玉林（左）与孙毅老将军交谈

牛背诗词

欧初

“文革”期间在五七干校多年，偶作俚语以自解，此为其中几首。

无题

(1971年)

二三挚友探索回，
夜漏沉沉只自哀。
患难知音传口信，
阿亮何日始归来。

注：阿亮我之乳名。

看牛读书

(1971年)

山间僻野放牛时，
监管松时偷读诗。
日暮归来先检点，
红书挂角竟生疑。

犁田有感

(1971年春节)

横风急雨独犁田，
负却春光瞬几年。
练得此身成铁汉，
瘟神也怕赶牛鞭。

注：五七干校规定“走资派”不得放假，勒令我去耕钉螺田。

清平乐

饲料房被困

(1971年于始兴)

饲料房被困，
往事思量处。
屋外斜风飞冷雨，
除却漏声谁语？
半生驰骋南州，

鬓斑直做霜秋。

一念弯程尚远，

漫因寒暑生忧。

采桑子

思量

(1972年于英德)

迎秋丁未重回首，
越是思量，
越怕思量，
家園安危感断肠。
神州底事来风雨，
旧说红羊，
又见红羊，
历历前车警未忘。

注：丁未即1967年

军团教育科长孙毅，西方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

当年10月，斯诺回到国民党统治的北平，他把采写的文章、拍摄的电影和照片，陆续发给英、美各国报纸、电台发表。无疑对扩大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

次年，斯诺的力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问世，斯诺拍的那张6人合影收在该书内。此书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0年、20年、30年过去了。这本书在世界

各国印刷几十次、发行上百万册，流传甚广。作者斯诺却未想到，由于他的笔误，竟把那幅6人合影上孙毅的名字误写成了邓华。他这一误，转眼就是近半个世纪。

直到1979年，孙毅的外孙、12岁的雷雷在翻看新出版的《西行漫记》时，发现那张照片上的“邓华”也留着小胡子，手拄棍子，他好奇地喊叫起来了：“这好像是我大爷呀？”

雷雷去问妈妈，妈妈找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派人去请教80高龄的聂荣臻元帅辨认，聂帅毫不犹豫地：“照片上留胡子的那个人就

是孙毅！”

此后，三联书店再版《西行漫记》时，才替已故多年的斯诺更正了这张失误42年的照片说明。

事后，有记者问孙毅：“《西行漫记》问世多年，你为什么没有对照片说明的笔误提出更正呢？”孙毅长叹一声，沉重地说：“我老汉是幸存者，是后死者，和死去的先烈比，我是只有从苦之劳，而乏建树之功，不必去计较那些。”

（本文作者即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传记《名将孙胡子》一书的作者）

（责任编辑 洛松）

孙中山 伦敦蒙难始末

● 陈廷一

遇难，是在访友的时候

伦敦，英国的京城。

1896年9月下旬，孙中山置身于这座陌生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孙中山眼前的是，工厂林立，交通发达，商铺满街，客流如潮，一派繁荣。

孙中山完成对美国的考察后，于1896年9月23日由纽约乘麦谒斯地号轮，过大西洋，到了英国的利物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摄影

浦。昨天刚到伦敦，投住在斯屈郎街的赫胥旅店。

怀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新奇，第二天，他就早早地起了床，沿街观看城市风光。说实在的，他走了西方这么多城市，伦敦雾都，名不虚传。在街的中心，一个公用电话亭内，他拨通了康德黎老师家的电话。

当天的下午，位在翠文省街46号的黎家花园似的小院，热情地迎来了这位来自东方的革命家，康德黎夫妇果不食言，热情地款待了自己的学生。

“什么时候到达伦敦的？”康教授春风满面。

“昨天晚上，因天都黑了，没敢打扰老师。”

“你太客气了。不行，从今天开始，你就搬回家里住。”

“不要麻烦你们了。”

“要不，在这附近，我给你安排个旅店，我们说话也方便。”

“可以。”孙中山答应了教授。

说话间，师母已经把饭菜端了过来。

“咱们边吃边谈。”教授挥了挥手。

“师母也一块儿吃吧。”

“好，好，我就来。”师母说完又从橱里取出了一瓶红葡萄酒。

餐桌上，三人边吃边喝，说着重逢的话，亲热无比。

康德黎笑说：“既然来伦敦，好好转一转。中国使馆就离此不远……”话未讲完，师母嘘了一声，“万万使不得！他是中国通缉的政治犯，进了使馆还能回来

吗？”

“没那么严重吧！”孙中山说：“这是英国，恐怕他们也不敢吧？”

“与狼打交道，还有什么敢不敢之理。”师母又道。

数日之后，孙中山又到了香港雅丽医校另一位师友孟生家作客，孟也像康师母一样提醒他：“慎勿行近中国使馆，免坠陷阱。”

正义在胸的孙中山，毫无畏惧。殊不知，这时清政府驻英使馆已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还在8月孙中山在美国期间，清政府驻美国公使杨子清，即已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粤省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飭电知龚公使。”在他到达英国利物浦的前三天，龚照瑗又接电报：“孙文于9月23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利物浦。”龚照瑗派他的侄子龚心湛（使馆职员）雇暗探赴利物浦守候，侦察的情况是：“孙文剪发着洋装于9月30日登陆，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

孙中山在文明的都市仍以革命大义自恃，认为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都会赞同的。基于这种思想，他来伦敦第10天，即10月10日，途经中国使馆之门，巧遇使馆的宋芝田回家。异乡遇知己，说起话长。

“使馆有无我们广东籍的老乡？”孙中山满腔热情地问。

“四等翻译官邓刺史便是。”宋芝田答。

“能否约我相认？”

“怎么不可以？”宋芝田说完：“那就随我进使馆吧！”

“那好。”孙中山没容更多的思考，阔步入馆。

邓刺史正在埋头公文，听宋芝田禀报有位广东同乡求见，便放下公文，迎了过来。

“邓刺史，我是陈载之，前日来伦敦，听宋芝田说，你也是广东人，特来认老乡。”孙中山自我改名换姓地介绍。

“月是故乡圆，情是故乡真。欢迎，欢迎。”邓刺史拱手相迎，分外惬意。

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一会，孙的观点，使邓生疑：“莫非此人是广州起义的孙逸仙吗？”既是同乡，不便相问。末了，孙中山抬腕看了看金表，“嘛，不早了，我要告辞，改天再谈。”

“噢，陈先生的金表好漂亮啊，是哪儿产的？”邓刺史有心地试探。

“是朋友送的，我也说不清。”孙答。

“能否让我瞧瞧？在下也想买一块哩。”邓说。

“那好。”孙中山无有提防地把表取下给他。

邓刺史本来生疑，接过金表，如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细心察看，果在表壳的下端看出几个英文字母来。细拼，这不是个“孙”字吗，心中一惊，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道：“好表！好表！”便把金表还给了孙中山：“陈先生如有时间，明天再来，我请客，好吗？”

“也好。你定个时间吧？”孙中山满口应承下来。

“上午9点，我正好有空。”邓答。

“一言为定。”

邓刚把孙送出使馆大门，急忙转身跑回，向上司龚心湛报告，殊不知，清政府已发通缉令，扬言捉拿孙逸仙者，赏黄金万两。金钱的诱惑，使龚心湛眉开眼笑，急禀公使。公使也马不停蹄地与英籍参赞马格里和王鹏九参赞紧急密商。一致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先下手为强。就这样，邓刺史设下了陷阱，只等同乡孙中山跳下，束手被擒。

再说孙中山也是义气之人，他根本没意料到大祸临头。10月11日，他早早吃了早点，按时赴约。二人接着昨天的话题，谈了两个小时，邓便邀请孙吃饭。饭毕，邓刺史请孙中山登楼到卧室相叙。

“那好！”孙中山并不介意。

二人来到二楼入室交谈……

恰在这时，一个贼眉贼眼的人推门入室，唤道：“邓刺史，有人找？”

“好，你稍坐，我去去就回。”邓刺史出得门，见到马格里参赞以手相招，继而附耳相告：“三楼地方已找好了，请君再引他上三楼。”邓转身入室，对孙说：“三楼地方好还有水果。我们到三楼谈好吗？”

“一切听你的安排。”孙中山说完就起身，拾级而上，在马参赞的引导下，旋即打开一个空房。邓客气地用手指道：“此房即是，请君先进。”

“好吧。”孙中山迈步入房，展目一看，既没有桌椅，更没有水果，空空洞洞。惊愕间回头，只见大门“啪”的一声紧紧关闭，外面传来马参赞正言相告的声音：“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公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说毕，马参赞与邓刺史扬长而去。

孙中山身陷囹圄的第三天，使馆接清政府回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14日，使馆又向清政府去电“唯有专雇一船径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密探，穷其所往。”后句言下之意是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

在死神到来前

被捕后的孙中山，曾想到了死，因为残酷的现实已摆在眼前。关于如何死的想法，他曾设计过多种。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为祖国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想到这一点，他又不无欣慰。说明敌人怕自己，自己的人生价值，抑或精神坚守的高地，将会有一代代的人继承下去，直到共和的旗帜，飘扬在中华的血土上。由此，他又想到自己留在旅馆里的衣物，包括那些革命党人的花名册。万一落入政敌手中，岂不更遭！在他与死神抗争的日日夜夜里，直到敌人的屠刀没有放到自己的脖子之前，他决不会放弃一丝生的希望。自杀不是革命者的本性。即便是他杀，精神永不倒，即使是失败，革命永不败。

要生，就要有生的办法，他首先想到了一般常人所想到的办法——逃跑。眼下关押的牢房位在三楼，不休说铁锁把门，单是那哨兵就有三层，窗户皆是钢筋加固。即便是逃出，也会被抓回的。在逃跑不现实的情况下，他便将生的希望寄托到外界人的营救上。这时，他立即想到了恩师康德黎夫妇，此时，他不为事前没听师母之警告而后悔莫及。眼下，不是后悔的时候，怎么把被捕的消息尽快转达给他们，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天地里，举目无亲，唯一的老乡又是背叛者。他曾要求使馆同乡邓廷铿刺吏帮助，邓假惺惺地作出援救姿态，反而骗去了孙中山写的“亲到使馆”的书面材料。后来，孙又写了一个纸条，扔于室外，也被发现。发现后又是一场毒打。同时，他想到了那个引他见同乡的宋芝田，每天俯在窗前，望穿双眼，盼宋芝田路过此地，可是到头来，也不见其影儿。时间不等人。接着，他把生的希望又寄托到每天给他送饭的大师傅身上，竭力争取他的帮助。可是大师傅却无反应，像个呆痴人，金口不开，白费口舌。从那公使的话里，孙中山知道几天后要送自己回国，与亲人团圆。说得好听，不如干脆说送赴刑场。从使馆的一次次审讯中，他看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己是错把坏人当好人……想到这里，外面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孙中山细看，是一个身背煤篓的老翁。

“大伯，我向您老求救！”孙中山拱手低声求告：“若不救，我今生就完了！我真正冤枉了！我家还有像您老这么大的老母待养，还有哇哇待哺的儿女呀！”

“你为什么事被拘禁到这里？”几句话说得老翁心里酸酸的，便停下活计问。

孙中山用英语说：“吾是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怕他未能领会，又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皇帝欲杀我，如土耳其苏丹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

老翁说：“不知英政府亦肯援助否？”

孙说：“英政府乐于相助，无需赘言。中国使馆背着英政府将我幽禁于斯，恐外人闻之。”又说：“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惟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

老翁的妻子也天天到使馆帮老翁烧火，老翁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老夫妻俩商量好，决定搭救他。第二天早晨，老翁又来添煤，临走时以手指煤篓，孙中山走过去，见篓中有一纸条，拾起，上面写着“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惟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匙孔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

于是，孙中山取出两张名片，伏在床上，面壁疾书，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致覃文街46号詹姆斯·康德黎博士：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使馆，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祈尽快营救我！中国使馆已租下一艘船，以便把我递解回中国，而整个途中我将被关锁起来，禁止和任何人联系。唉！我真不幸！请照顾目前这个帮我送信的人。他很穷，将会因为替我效劳而失去他的职业。”

当晚待老翁来收煤灰时，孙中山把名片交给了他，并将仅有的20英镑也给了他。

老翁将孙中山的书简和20英镑交给了他的妻子。她把书简藏在反摺的袖口里，躲过密探，从使馆直奔康德黎家。

营救孙文，分秒必争

清驻英使馆与清政府电讯来往频繁。因为这是一桩不可告人的丑闻，万一泄露天机，国际舆论将使他们狼狈不堪。

17日，清廷紧急复电使馆：

“庚电悉，购商船径解粤，系上策，即照行。七千英镑不足惜，即在汇丰暂拨，本署再予划扣。惟登舟便应加镣。管解须加慎。望荅等周备。……”

北京清廷，决心违犯国际公法，欲将孙文密解回国

处死。事在万急之中……

几日不见学生中山，想必是凶多吉少。康德黎夫妇正在坐卧不安之时，17日晚，忽得柯尔匆匆送来一信，已是午夜时分。康德黎知道事急，叮咛一下老伴，便匆匆披衣出门，驱车径往清使馆，请求马格里相助营救。殊不知马氏是诱捕孙文的主谋者。使馆告之，“马格里不在。”康教授又马不停蹄，驱车直驶梅尔蓬巷警署报案，然后又至苏格兰场警署，在私室寻见探长，呈诉一切，探长一一记录在案，未了，对康说：“此事关系重大，我一人难以主持，请耐心等待。”

“那就拜托你了。”康德黎出署时，只见满天星辰，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时值下一点。

次晨，康德黎心中有事，早早起床，匆匆吃过早点，又驰往甘星敦找友人会商，意欲求见驻伦敦的中国税务司某某，让其以私情相助，直告中国使馆，知其私捕犯人，当会引起国际交涉，促其尽快放人。但康君的这位朋友听后摇摇头，颇不以为然。康大失所望，转身又往中国使馆找马格里，仍不见人。无奈间便驱车到孟生博士家。刚至门口，正巧碰上柯尔在这里相等。原来，柯尔把昨天捎信的事已通过老伴转告了孙文。孙文在焦虑中方又回信，此信是在手绢上写的。柯尔来到康教授家里后，方知康已到孟生博士处，便赶到孟生处相等。“一杯水没喝完，康教授已风风火火到来。

“这是孙文的信。”

康接过来，展读后放入口袋：“真是火烧眉毛的事！”

接着，柯尔又将孙文被搜身后仅剩下的20英镑交给康德黎：“请你为孙先生代存吧。”

康德黎收下钱后感叹地说：“我两次到使馆，不知为什么，就是找不到马格里？”

柯尔告之：“那是马格里在躲闪你，他天天在使馆，并未出门。此主谋诱捕和严密负责囚禁孙文者，正是马格里所为。”

“噢！是这么回事。”康孟二人闻听，不禁为之骇愕。

柯尔经二人询问后，又道出中国使馆已对孙施加了强暴，拟将孙文以疯汉名义于明后天，秘密雇船押回中国。同时，又道出中国使馆院内近日忽来三四名中国兵丁，估计与押解之事有关……

康、孟二君即回一纸托柯尔密达孙文，告之柯尔：“我们二人正为此奔走营救，请他不要着急，光明只差一步！”

送走柯尔后，康、孟二人分析一下情况，认为当前最为主要的是阻止使馆秘密押解孙文出馆。于是二人复往苏格兰场，请求警署出面干涉，以维护人道。探长

接见了二君。叹道：“教授刚来不久，复又来此，警方尚来不及行动啊。”康孟二人不得要领，经过再三思考，二人决计到外交部一试。值班人员告诉他们下午5时后再来。5时后二人复往，果然见到主事者。二人详陈孙先生被捕之经过。主事者认真记录，但仍是信疑参半。因本日为星期天，外交部无负责人办公，答应第二天晨转呈上官。

二君虽急如星火，亦无可如何，又怕中山先生于其间被押送回国，遂决计前往中国使馆，告知中山先生被囚事已为英政府所知，使其不敢马上押解回国。他们见到邓廷铿，邓拒不承认。康、孟二君于此危急万分之时，深怕中国使馆因外界已知此案，而迅速转移囚禁之地。便即时由康氏到附近之警署找侦探守候在中国使馆门外，以防使馆将中山先生秘密转移。但时值星期天，即使给予酬谢，也无人愿受雇，他们辗转找侦探于深夜，也未成功，最后只得找一个暂时侦探代替，于18日午夜12时半和康德黎一同往中国使馆门前守候，看到中国使馆内人来人往，顿时紧张起来。19日晨2时，康因肚子不适回家暂时休息。天明后，康复往思兰德雇到一侦探。可叹可敬的老师啊，在学生需要知识的时候，你以知识的乳汁相献，在学生蒙受危难之时，你又以赤心相献！

在找侦探的同时，康德黎又两次找《泰晤士报》副主笔和记者，请其披露此一消息，但该报特别谨慎，未即时予以刊载。

19日，即为星期一，康德黎教授奉外交部命令，将孙文先生被诱捕等始末写成报告，一式两份，呈英国外交部。

外交部次长山德森提出初步意见是：“试行一妥办法，使中国使馆释放中山先生完事。因为诱捕之事，外界尚未公布，知者极少，不必扩大事态。及英国政府质询格来轮船公司，中国使馆确曾有定雇轮船之事，至此始知诱捕中山先生一案属实，遂正式加派侦探六人密伺于中国使馆之外。并分饬附近各警署，加强监视。同时将中山先生游美时的西装像片交警署，以资辨认。”

当次长的意见报知部长萨里斯侯爵那里，很快得到批准，命令山德森次长到外交部谒见他，并说明英国政府决定干涉到底。这是侵犯人权大案，也是对英国的不尊。

政府的态度引起了新闻界的强烈反响。

当日下午，《地球报》派访员采访康德黎。康尽其所知以告，记者笔录后，经康同意，公布于晚报，其标题则曰：《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禁于伦敦》、《公使馆之囚囚》等。自此英国朝野大哗，康氏寓所访

者不断，几乎门槛为穿。不到两小时，《中央新闻》、《每日邮报》也各派记者一名，前来康氏寓所。康氏与之相谈大概情形后，两记者则径往中国公使馆求晤中山先生。接见者又是邓廷铿，他仍然拒不承认。于是老记们示之以《地球报》新闻报道。邓则狡猾地大笑曰：“皆是欺人之谈，纯系凭空捏造。”

《中央新闻》记者则正色相告：

“君无庸讳饰，彼孙某被拘于此，若不立行释放，则明晨将见有数千百市民，围绕使馆，义愤所发，诚不知其所极耳。”

但邓仍不动声色，并百般狡辩。各记者复出寻找马格里，最后于米狄兰旅馆找到马格里。同时英外长以照会形式要中国公使馆放人，否则驱逐清公使出境。

当天，柯尔将《地球报》剪报藏煤篓送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看后，非常欣慰，他说：“真似临刑者之忽逢大赦也！”

次日，英国报纸公布各记者和马格里的对话，主要内容摘下：

访员曰：报纸已有报道，谓外交大臣萨里斯倍已照会中国公使，请其将拘留之人释放。

马凯尼（马格里）曰：诚然。

访员曰：敢问此照会之结果若何。

马凯尼答曰：某甲自当释放，然释放之时，须照顾公使馆之权利，勿使稍受侵害。

但是马格里又辩解说，使馆中幽囚之人，并非孙逸仙；又说此人是自愿赴使馆，并非引诱，因而英国无权干涉。但强大的舆论压力如排山倒海一般，马格里又于同日，赴外交部见次长商谈释放中山先生之事，旋自外交部回使馆，直入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燮居室，告以英国外长必欲释放之意，龚只得答应释放。

下午4时半，英国外交部具文并特派专员会同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及康德黎至清廷驻英公使馆，接中山先生出公使馆。使者出公文交马格里。马格里当着这些人的面，将搜去之物一一送还。并告诉中山先生说他已经恢复自由，一一握手后，孙中山先生一行从使馆侧门步出，进入回默街。这种悄然而出的作法，系英国人不愿把事闹大，只要人得释放即为胜利，不计较此等细节，亦含有留面子与中国公使馆之意。而中国使馆则会以此邀为胜利。出公使馆后，孙中山先生等即坐马车至苏格兰场警署。到署后，孙中山先生将此次遭遇历述一遍，警官记录以后，即向孙中山先生宣读一遍，中山先生同意后，即于纸末签名。约一小事完后，康德黎偕孙中山先生回家，招待甚殷，夫妇二人举杯为孙中山祝贺。

当晚，访见者络绎不绝，至深夜，中山先生方得入睡，一觉到次日9时（24日），为康氏儿女喧嘩声所惊醒。

康氏儿女，正在扮演其父教中山先生之短剧，一会儿马格里被扑打于地，而中山先生获释，然后齐唱《不列颠之先锋队》歌，以壮声威。

中山先生经此脱险，遂成为世界新闻人物。

英国《泰晤士报》及各大报均先后刊载此案，谴责中国公使馆任意捕人，侵犯驻在国权利和法律。

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中山先生蒙难新闻。香港《德臣西报》于12月3日刊登此消息，并发表社论，说孙中山不是寻常人物，或将“为历史中之重要人物”。上海梁启超主编之《时务报》，也一再译载伦敦各报的此种新闻（见第十五期、第十九期等）。同时，剑桥大学教授翟尔斯亦将孙中山手书自传刊登于《中国名人传记辞典》，此书于1898年问世。

中山先生于是以孙逸仙之名成为世界名人。当时驻英武官风凌写日记曰：“十九日获孙文案，反为该人成名。”

中山先生获释后即投书各报馆，对英国政府和报界表示感谢书曰：

“予此次被幽禁于中国公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所之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吾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以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爱驰寸简，敬鸣谢悃。”

中山先生，当时并未成为全世界闻名的革命家，而英国的政府竟能如此重视人权与国法，一丝不苟地助中山先生恢复自由，极尽职责，这在腐败而又专制的清王朝统治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正因如此，中山先生更以亲身体验到英国立宪政治的文明和先进，更下决心为反清而奋斗。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毛泽东

为小青年“照写”的四幅手书

● 师 宁

过去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常有毛泽东的批示：“照办”。意思是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办理。

本文所说的“照写”，也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但不是写在中央红头文件上，而是在孩子们来信上的批示。孩子们要求毛泽东给他们写字，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写”。“照办”是指示全国各级都要照中央的指示办理；“照写”则是“指示”自己照孩子们的要求来写。

大家知道，毛主席的手书是十分珍贵的。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手书，但又不大敢请他写。不要说请毛主席，就是请一位地位较高、名声较大的人和书法家写字，平民百姓也是不大敢的。

据说山东老根据地某县，有几位穷秀才办了个刊物，想请一位曾在他们那一带打过游击的名人兼书法家给题个刊名。但那位名人却迟迟不给写。什么原因？答曰：没时间。向他的秘书一打听，真正原因是一个“钱”字。要多少钱？据透露一个字至少要三位数。几位穷秀才一听，直吐舌头。只好请另一位书法家。问此位书法家要多少钱润笔？答曰：分文不要，只要刊物出版后送一册作个纪念即可。这实属难得。

毛泽东的当代社会地位，别人不好比。中国革命胜利前，他是一位

充满传奇性的革命领袖，国民党悬赏10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解放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5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又是雄据中国书坛的书法艺术大师，被尊为书圣。他的手迹是无价之宝，谁人得之，便身价百倍。然而出奇的是，几个小孩子要毛泽东给他们写字，毛泽东二话没说，照写。对此，有人简直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一个请毛泽东写字的孩子

常言道，“英雄出少年”。大人不敢想不敢说的事，孩子们没有那么多禁忌，敢想敢说，而且竟出乎意料之外，如愿以偿。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跑去找毛泽东题几个字作纪念，毛泽东欣然命笔，立即给写了。初听起来，有点奇。奇乎哉，不奇也。

事情发生在1945年9月6日的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中国第一号统治者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去重庆，共商国事。毛泽东来到重庆后，整个山城轰动了，全世界也震惊了。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说：这样一位威名赫赫的大人物，初见其丰采，原来他身穿延安灰布

制服，像一个中小学教师！

毛主席到重庆后，忙于应酬各界人士。在渝社会名流欢欣鼓舞，郭沫若、于立群、邓初民、冯乃超、翦伯赞、周谷城等，相约去毛泽东住处拜访。见面时，周谷城即问：

“过去你常写诗，现在还写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近来没有情绪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骂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的“土匪”。此话引起在座的人们哄堂大笑。

话虽那么说，但这次毕竟是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三通电报请来的客人。

南社诗人柳亚子缠着毛泽东要诗。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走访柳亚子，并以旧作《沁园春·雪》相赠。没想到半路上却杀出个程咬金。柳亚子邻居的小孩卢国琦——一个中学生，人小胆子却不小。他拿着纪念册，闯进柳亚子家，对毛泽东说：

“毛先生，你们都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我非常敬佩你们，今天我能见到你，特别高兴。请你们给我题几个字，作个纪念吧！”

毛一看，原来是个孩子，便笑着问：

为和平、民主、团结
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不喜欢在框框中写字，更不习惯在小框框中写蝇头小楷。便问：“在方寸大的八分邮票上写吗？”

杨绍明忙说：“不，今年为了纪念国庆十周年，邮电部发行了纪念邮票，很漂亮。今天一大早我就去排队，买了两大张。请您就写在这两大张邮票上吧！”

毛泽东笑着说：

“那不把邮票弄脏了吗？”

杨绍明说：“那才有意义呢！”

毛泽东又问：“你要写什么字？”

“请毛伯伯签名，并写上年月日。”杨绍明就像要自己的好朋友签名一样回答说。

毛泽东乐哈哈地说：

“好，照办！”说罢，接过笔，在邮票上签名：

毛泽东 1959年10月1日

写毕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吧？”

杨绍明高兴地说：

“谢谢！谢谢毛伯伯！”

双手从毛主席手中接过邮票。

后来，这张邮票在世界青年联欢节集邮比赛中展出，并获得了青年奖，成了集邮史上绝无仅有的珍品。



“要和我们交朋友？”
卢国琦说：“拜你为师！”
毛泽东说：“好，咱们交个朋友。”

说罢，接过纪念册和钢笔，就龙飞凤舞地写道：

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

接着，周恩来、王若飞也都题了字。周恩来的题字是：“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的题字是：“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可是小国琦还不满足，他把纪念册送到柳亚子面前说：“请柳伯伯也给题字！”柳亚子笑着接过纪念册，挥笔写道：“国琦小友纪念册，润之、恩来、若飞都有题字，余亦随声。并作七绝一首曰：

兰玉庭阶第一枝，
英雄崇拜复何疑；
已看三杰留鸿爪，
更遣髯翁补小诗。”

卢国琦喜出望外地接过纪念

册，向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柳亚子深深鞠了一躬，连道谢谢！

孩子不知也不会用金钱相报，“谢谢”两个字，是发自赤子之心的衷心感谢。毛泽东等含笑目送孩子的背影离去。

签名于方寸之间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大庆。白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晚上，他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看罢焰火，回中南海休息。这时一位年方15岁的少年杨绍明拿着笔和墨盒来找毛泽东题字。杨绍明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儿子，是个集邮爱好者。

杨说：“毛伯伯，请给我题个字。”

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便笑着问：

“写在什么地方啊？”

杨绍明说：“写在邮票上吧！”

一个15岁的小孩，敢于要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他的邮票上签名题字，而且如愿以偿。这固然与他的爸爸是毛主席身边的大干部有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但在近水楼台的人并不少，为什么一轮明月却叫一个孩子得到了呢？

因为他是孩子。孩子的特点是天真、单纯。他想，要是请毛主席在他喜爱的邮票上签了名，该有多好。他这样想，就这样做了。他们崇拜英雄，但没有想的那么多，更没有什么框框。孩子们只知毛泽东是伟大的人，也是值得信赖的人。在孩子们的思想中，没有参杂那么多势利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伟人也是人，是同普通人一样的人。因此，请他们写字也就同请自己的普通长辈写字一样。这就是可贵的“赤子之心”。

同时，也因为毛泽东能不摆架子，能理解孩子的心，为孩子们办事。中国有句成语。叫“礼贤下士”或曰“礼士亲贤”。据宋人王说的《唐语林》说：“（高崇文）三年为蜀帅，惠大行，不事威仪，礼贤接士。”毛泽东当主席为统帅，则是：“不事威仪，礼贤亲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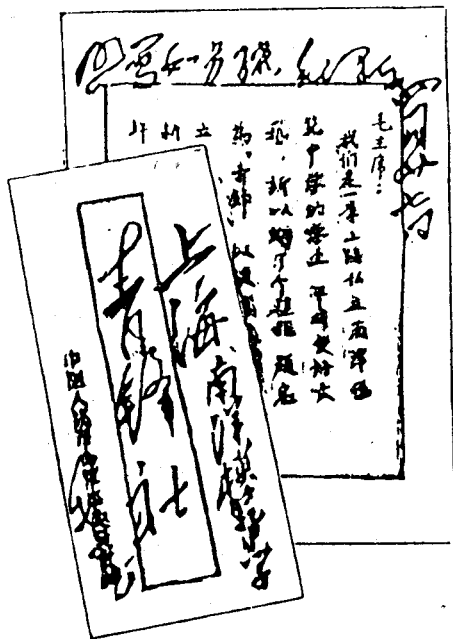
为中学生的壁报 写刊名

1950年4月，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虽然已基本结束，但东南沿海、台湾海峡，国共两军仍严重对立。国民党的飞机，仍不时侵袭上海，轰炸扫射。就在这时，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由上海一私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写来的信，说他们办了个壁报，要求毛主席给他们题写报头。信是用毛笔写的，字写的端端正正。信上说：

毛主席：

我们是一群上海私立南洋模范

青锋



中学的学生，平时爱好文艺，所以办了个壁报，题名为“青锋”……

文字语言很朴素，直呼毛主席，没有客套的恭维话，真挚诚恳。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他被这群勤奋好学、态度诚挚的孩子们感动了。他想起了自己“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便立即拿起笔来，蘸饱浓墨，用中锋行笔，力扫千军，一挥而就，“青锋”两个潇洒道劲的大字跃然纸上。毛主席写毕“青锋”二字，在原信上批道：

照写如另纸，毛泽东，4月27日。

同时又在署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封上写：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青锋社

毛寄

放下笔，毛主席吩咐秘书迅速寄出。

这一群学生的姓名，我们不知道。这并不重要。他们只是当时勤奋学习，追求进步的千千万万学生的

代表。他们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他们在创造着历史，他们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和求进的主动性。同时使毛泽东在50年代初的一幅珍贵的书法艺术留了下来。更可贵的是，这一幅字、一封信留下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广大人民特别是孩子们的亲密情谊。

向巾帼孩儿致歉

女孩子同男孩子一样，敢想敢做，富有风雅文采。他们同样敢请毛主席写字，毛主席同样给他们“照写”了。芙蓉国里的张明霞等就是这样的巾帼孩儿。

这事得从毛主席《赠李淑一》这首词说起。

李淑一是长沙第十中学的语文教师，她是毛泽东已故夫人杨开慧烈士的好友，又是毛泽东战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1957年2月，李淑一读了毛泽东发表在《诗刊》上的18

首诗词之后，写信给毛主席说了自己的读后感，并把自己在1933年所写的怀念柳直荀的《蝶恋花》寄给毛主席请教。同时又说，杨开慧生前曾向她讲过毛泽东填过一首赠杨开慧的词，希望毛主席能抄给自己，以作纪念。毛泽东于1957年5月11日写信答李淑一：“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按：这里所说的不好的那一首词是《虞美人·枕上》。1921年作。现已于1994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李淑一收到这首赠词后。长沙十中师生争相传阅。当时在十中实习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张明霞等也看到了。他们爱不释手。张明霞即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同意把此词在她们办的刊物上发表。1957年11月25日，毛主席给张明霞复信，表示同意张的意见。信如下：

张明霞同志：

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

《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信封上写：

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

张明霞同志

毛泽东 缄

收到来信，张明霞喜出望外。于是这首词便在1958年1月1日出版的《湖南师范学院学报》元旦专刊上首次刊出了。一时轰动全国，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全国各地报刊也相继刊载，并迅速传到国外。这首《蝶恋花》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是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早日公之于众，对于诗歌艺术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这封简短的信，值得深思：

张明霞等当时还是未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只是未来的编辑。他们对编辑业务、印刷出版等都还不大懂。也就是说，还是未出茅庐的孩子，毛泽东即以同志相称，平等相待，这是一。

张明霞等的刊物，正在筹措中，尚未公开出版，毛泽东即同意在这样的刊物上首次发表自己的诗词，足见他青少年学生的信任和厚爱，这是二。

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从不轻易发表。况且此词主要是说他同杨开慧的婚恋关系和怀念之情。其发表当然需要很好斟酌，未能及时答复，是很自然的事。但毛泽东即因迟复向张明霞表示歉意，可见毛泽东对待孩子们的谦逊、诚恳态度，这是三。

毛主席喜欢“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学少年”，他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青少年学生，不摆官架子、不倚老卖老，不以权威自居。不管今天人们对毛泽东怎样讲怎样看，他的这种态度

都是很难能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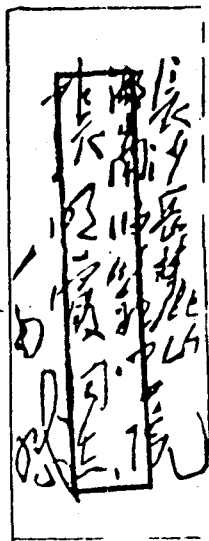
从四幅手书 所想到的

上述四幅手书，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思想上也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对孩子、对青少年的平等态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孩子是家庭主人的奴隶。这种落后腐朽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影响。有些人提到孩子，总认为小孩子懂什么！这是完全错误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在人格上与大人应该是平等的。孩子们要毛泽东帮助他们办点事，毛泽东二话没说，立即照办，并亲笔回信，像对待大人一样，这种对孩子们的平等思想，应该肯定、应该发扬。

第二、承认孩子的平等地位，就要尊重和信任孩子。孩子从小是在父母、教师的教育抚养下成长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依赖思想。如

张明霞同志，
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
《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果不尊重他们，就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性。青少年学生中最可贵的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

封建社会给孩子们所规定的清规戒律，如《弟子规》、《女儿经》等等，强要孩子们老实、听话、事事听命于家长、老师。这都是束缚孩子思想的枷锁，必须打破。

大人教孩子捏泥人，孩子天天捏的都是泥人。有一天，孩子越规，捏出了小老虎，这就是孩子的独立性创造行动。也许捏得不大好，但应善于发现、支持、鼓励孩子们的创新思想和行为。

毛泽东到重庆，孩子请他题字作纪念；孩子们要办个壁报，请给写个报头；孩子们爱好集邮，请在邮票上签名；青年人喜爱毛泽东诗词，请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这些都是独立创新的行动，应该听、应该办。毛泽东都一一照写、照办了。为青少年办事，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革命党人的命根子，也就是毛泽东的伟

大之处。

第三、向孩子们学习，寄希望于孩子们。孩子们往往幼稚，甚至无知，但他们单纯、真诚。他们不懂花言巧语、弄虚作假，更不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两面三刀。孩子们的这种纯洁朴实的“赤子之心”，在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豪夺强取的混浊横流中，特别可贵。在孩子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是欣欣向荣的力量。毛泽东说过：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成年人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不该以教育者自居，要善于发现青少年新生向上的积极性，看到他们的首创精神，支持鼓励他们，并向他们学习。

鲁迅说的好：“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至于说到老一辈人，说到他自己，鲁迅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

会朽的腐草”（《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按照毛泽东和鲁迅的思想，老的东西总会死去，总要腐朽的，应该化腐朽为神奇。所谓“化腐朽为神奇”，是指腐朽的东西可以化作培养新生事物的沃土，而不是指人不会死亡、返老还童、万寿无疆。因此应该把希望寄予孩子们，努力为孩子们做事，向孩子们、向青年人学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所倡导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

必须指出，上面所说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和子女。毛主席对待孩子的原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为公”的“大道”。

毛主席给孩子们“照写”的几幅手书，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书法艺术珍品，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欢迎为《炎黄春秋》踊跃投稿

《炎黄春秋》杂志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以历史纪实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本刊坚持以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讴歌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讴歌改革开放大潮，宣扬海外华人爱国奉献精神为主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讲实话，讲真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其本来面貌。

本刊创刊四年多，以其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来信来稿不断增多，许多佳作被国内外报刊转载。为了更好地办好刊物，提高质量，拓宽刊物内容，欢迎学者、作家及热爱本刊的作者和读者，根据刊物的宗旨、内容和风格，踊跃投稿。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要深入采访；反复核实，

掌握可靠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根据有关资料加以整理，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二、文字力求简明、通畅。来稿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欢迎二三千字的短稿。最好配有清晰的图片（彩色、黑白均可），并写清说明。

三、文字要规范，不要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年月、数字、引文、古文、生僻字、外文等，一定要写清楚。

四、请自留底稿。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退。如必须退回，请予注明。

五、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来稿在三个月内如未见刊用，亦未接刊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如发现其它报刊已经采用，本刊恕不再付稿酬。

本刊编辑部

“妈妈同志”

——任锐

● 柯 明



1950年春，董必武心情沉痛地写下了这样几首诗，诗的题目是：《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作》。

(一)

五十年来变故多，
人生甘苦味如何？
夫死毒谋几战毁，
身逢胜利染沉疴。

(二)

革命原非为个人，
支持群众得翻身。
即今此事初如愿，
况复芝兰秀有春。

(三)

革命儿童爱不除，
群呼孙母老妈妈。
慈祥恺悌流风远，
春日坟前共献花。

这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出版“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特刊，任锐的女儿孙维世作纪念文章《献给革命的母亲》，在特刊发表。

任锐，就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延安广受敬重的“妈妈同志”——一位一生颠沛流离、献身民众的著名女革命家。

1949年，中共中央将任锐的

遗体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苍松秀柏之间。周恩来亲笔题碑：

任锐同志之墓

周恩来敬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任锐原名任纬坤，曾化名张芸。1891年出生在河南省新蔡县城关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她的父亲任芝铭，是清末的举人，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早年由于从事反清活动，被革除功名。辛亥革命前，任芝铭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组织从县衙劫教被捕同盟会员后，持伞跳城墙出走躲避缉捕，被清廷通缉。1913年讨袁之役失败后，又被袁世凯政权明令通缉，二次逃亡。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自“四·一二”后，他将救国救民之希望寄予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第十三军任后方留守处主任。之后任新蔡县参议会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任芝铭受到冲击，又知子孙辈多人遭迫害，于1969年郁郁而终。享年100岁。任芝铭育有6女，任锐是二女。

任锐从小生长在一个血雨腥风的动荡环境中。父亲经常逃亡在外，家庭屡遭清兵搜查。祖母为此忧伤过度而死。世态的炎凉、逆境的摧残，培养了她不屈的性格。

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和家庭的影响，任锐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03年，她13岁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08年又远离桑梓考入北京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在北京女师学习期间，正值孙中山倡导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推派各省负责人创办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任锐倾向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喜欢阅读《民报》及其它进步报刊，深受其影响，辛亥革命前，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京津同盟会），投身反清大业。那时，任锐经常装扮成豪门闺秀，携带运送炸弹的箱子，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她每次执行任务都身揣炸弹，穿行在大街小巷，随时准备着，一旦被清兵发现就同归于尽。辛亥革命期间，任锐一直忘我投入，出生入死。

在同盟会的活动中，任锐结识了同盟会员、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学生孙炳文。任锐负责保藏和运输同盟会的炸药，常住北

京存放炸药的秘密机关。孙炳文因为工作需要，也常来秘密机关。她被孙炳文深刻敏锐的见解、献身民众的激情、文采流溢的才华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吸引。两人从一起战斗的志士友谊中逐步产生了爱情。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帝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1912年夏，孙炳文担任了《民国报》的总编辑。任锐也与何素卿、杜君宜两位同盟会员一道，共同编辑《民国报》专设的《妇女专刊》。这张报纸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经常与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的报纸互相笔战。孙炳文平时温文有礼，但在原则问题上，毫不留情。有一次笔战激烈时，孙炳文气愤极了，一个人跑到“进步党”的报社，乱砸了一通，用拳头将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回到报社时两手血淋淋的。

1913年春，孙炳文和任锐在北京结婚。婚后不久，“铁血团”刺杀袁世凯事败露。他们夫妇都是“铁血团”的成员，孙炳文已被列入缉捕名单。为避开追捕，他们不得不在同学胡金祖的资助下，告别使他们相识相知的北京，一起南下入蜀，返回孙炳文的家乡。

二

任锐和孙炳文回到四川南溪县后，在附近的叙宁县以教书为业。这时期，以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主子的各派军阀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国家危在旦夕，民众生灵涂炭。任锐在川，生儿育女，也时有书信与父亲，并述心系国家之情。父亲任芝铭了解女儿，曾有诗与她，鼓励她的报国志：

寄二女锐

人言生女恶，缓意慰情难。
赖有音书至，报知骨肉安。

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
国事烟塘里，北风增暮寒。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他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滇军将领蔡锷首先发难，成立护国军，在云南起事，入川同袁世凯的“讨伐军”作战。护国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率部进驻南溪。正在这里的孙炳文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朱德。他二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因政见一致，成莫逆之交。1918年1月，孙炳文应朱德之邀，到朱德旅部任参谋（参谋）。从此，朱德与孙炳文朝夕相处，肝胆相照，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1年初，朱德和孙炳文约定，由孙先去北京，朱德暂回云南。待打倒唐继尧后，朱德马上离开滇军，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然后一块儿到外国去研究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于是，孙炳文、任锐夫妇告别朱德将军，偕子女宁世、维世、济世，离开南溪，乘船下长江，出三峡抵武汉，又乘火车北上，路经河南，去新蔡县任锐家乡逗留数日后，重返北京。孙炳文暂在北京一家报馆任职，同时着手出国事宜。第二年8月，朱德到了北京，与孙炳文会合后，二人即去上海，乘客轮远航欧洲，赴德国留学。

已是四个孩子母亲的任锐，虽知丈夫离开后自己会生活艰难，但出于忧国忧民之情，支持孙炳文出国寻求真理。她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含辛茹苦地抚育四个孩子，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三个春秋。

1922年，在德国，孙炳文与朱德同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他们和周恩来成为亲密朋友。

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学生回国工作，孙炳文便离德国，转道莫斯科，于这年

冬回到北京。夫妻久别重逢，任锐倍感欣慰，在天伦之乐中度过了几个月较为平静的家庭生活。这期间，任锐经孙炳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隔不久，1926年春，孙炳文接到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的电报，遂偕次子孙济世和北京大学张斗南数名同学，离京南下，经上海去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北伐军留守处主任等。任锐带三个子女留北京，并继续求学。

不久，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这天，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的任锐，怀着身孕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当游行示威的爱国群众到达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政府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刘和珍等47人遇难。任锐被手持铁棍的卫队打倒，腹部被踩伤。

“三·一八惨案”后，孙炳文去北京接任锐及子女宁世、济世、维世、名世到广州。在广州一年的时间里，正值大革命轰轰烈烈，任锐投入其中。为了北伐军的胜利，她协助孙炳文做了很多工作。

1927年4月6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来电报，催孙炳文赴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4月10日，孙炳文和任锐带孩子们，并有秘书张斗南等工作人员随行，离穗赴港，13日搭乘法国轮船启程北上，打算绕行上海去武汉。行时虽然小心，但12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了孙炳文去武汉任职的消息。为避人耳目，孙炳文、任锐一家坐二等舱，工作人员坐进三等舱。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全然不知。在这条船上，不期冤家路窄，遇到在欧洲时就与之有过斗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褚民谊（后沦为汉奸）。褚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早就对孙炳文咬牙切齿，此时找到了时机。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告密。4月16日，轮船刚抵上海汇山码头，一批法国巡警就蜂拥而上，直扑孙炳文客舱。褚民谊指认孙炳文，说：“总司令部要拿你查办！”任锐见状，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孙炳文被带上了手铐。同时被捕的还有秘书张斗南和十二岁的长子孙宁世。他们被押解下船，并被引渡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

突如其来灾难，使任锐悲痛难忍。她立即不顾一切地奔走寻问，在同志和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丈夫、儿子和同志的下落。次日，她带着三个子女，冒雨去探监。看守所岗哨林立，铁栏栅寒气逼人。任锐和孩子们站在铁栏栅门前，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叮当声，看到带着手铐、衣衫破敝的孙炳文出现在门内，任锐泣不成声，孩子们哭喊“爸爸……”。

孙炳文安慰亲人不要悲伤，并嘱咐任锐通过国民政府设法营救。任锐抱着营救的希望，带着孩子离开了丈夫，各方奔走。

她没想到，这就是最后的诀别。

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先以高官厚禄引诱孙炳文变节投降，后又用刑迫降，但孙炳文拒不屈服。1927年4月21日，被捕后的第五天，孙炳文从容就义，被腰斩于上海龙华特务处。时年仅42岁。

烈士遇难，任锐悲愤交加，万箭穿心，她强忍巨大悲痛，带上孩子，挥泪离开上海，继续西去武汉。

到武汉，她把孙炳文存放的北

伐军驻广州后方留守处余款1万元转交给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后，她在武汉街头慷慨演说，将自己写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愤怒揭露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国内外许多报刊都在醒目位置报道了孙炳文遇难的消息。

任锐为自己失去丈夫而痛苦，为孩子失去父亲而悲伤，为这种痛苦悲伤而铭心刻骨地仇恨。她相信，自己和丈夫所投身的事业是正义的，任何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希望儿女们能继承父业。十四年后，她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写下了这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三

孙炳文牺牲后不久，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宁汉合流，中共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任锐和组织失去联系，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四处漂泊、历经艰辛的生活。

最初，任锐携儿女回到丈夫的家乡四川南溪。南溪的进步人士为她返里而召开了一次欢迎会，对孙炳文的遇难表示痛心和惋惜，对任锐的处境深表同情。

当时，她最小的女儿出生仅数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无法生存，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来，不得已，她把这小女儿过继给了姐姐任霞坤。

不久，南溪发生了“李庄暴动”，任锐没有参加暴动，但在暴动失败后，成功地掩护了一位女同志

脱险。当地豪绅以前就将孙炳文视为眼中钉，现在便勾结地方驻军，企图加害于任锐。她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无奈，任锐于1928年农历8月15日，携儿女高川，辗转到达安徽省浮山县。

浮山县中学董事长是孙炳文生前好友房师亮的父亲。房师亮把任锐安排到浮山中学当图书馆主任，同时兼教小学。可是，因聘任了任锐，房的父亲被当地劣绅状告犯有掩护共产党家属之罪。为不连累房师亮的家庭和学校，任锐离开了浮山中学。

1929年，任锐又带着孩子们离开浮山县去上海。当时上海时局正紧张，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任锐得知地下党组织为抚育忠烈遗孤，设法遣送一批孤儿去法国学习。但她联系上时，已因形势紧张，停止遣送了。那时，她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养育儿女。可是，中共组织正处于最困难时期，无力解决任锐的全部困难，仅能补助她50元钱作临时费用。她觉得组织此时更需要钱，便谢绝了资助。正无奈时，“四·一二”后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任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任锐出任明凌小学校长。

1932年，任锐到北京担任北辰中学校长。后因经济来源不足，不能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得已学校关门。

1934年秋，任锐离京返回河南新蔡家乡。冬，她为了找到党的组织，带上六妹任均、女儿孙维世，再赴上海。在影界友人的关照下，六妹和女儿一起到“东方剧社”学习演剧。任锐找到文光甫，请他帮忙恢复组织关系。1935年春，任锐担任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交通联络工作。她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多次从密探的跟踪下脱险。一日晚，

她忽然接到通知：负责人顾大同被捕自首。她仓促移居，再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这次在上海期间，任锐带孩子去孙炳文遇难处龙华，收敛了孙炳文的遗骨。

1936年秋，任锐和六妹任均离沪返豫。她和六妹一起，将孙炳文遗骨葬在了河南开封的四川义地。

1937年春天，任锐担任了新蔡今是学校小学部主任，兼教中学。今是学校是父亲任芝铭先生苦心经营多年创办起来的，设有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多达2000余人，毕业生数以万计。在任芝铭先生的支持和掩护下，中共新蔡县委以今是学校为基地开展活动。党组织在校内设有支部，从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中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任锐到此工作时，正值“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校内以涂建堂为首的几个亲蒋教师，经常集合学生训话，漫骂共产党，漫骂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压制抗日宣传，激起师生愤慨，使得矛盾激化。在任锐的秘密组织下，进步师生和涂建堂等人开展了说理斗争，学生们把那几人的衣物摆出校门，涂等仓皇离校。

1937年秋，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任芝铭即赴新乡，在国民党将领张轸当时主持的豫北师管区和第一一〇师供职，参加抗战。任锐和六妹任均均在新蔡县积极组织了妇女救护队，拉到郑州，日夜护理从抗日前线退下来的负伤官兵。后又带领全队加入“抗敌后援会”，担任慰劳队长，为抗日前线运输物资。当时河南一家报纸称赞说：任芝铭先生的两位女儿积极投入抗日战斗。因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压制群众运动，“抗敌后援会”后解散。

那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周恩来得知孙炳文的遗孀任锐在河南时，立刻托人在开封找到了她，让她去延安。

任锐只身北上，1937年12月到达山西临汾，暂考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

四

1937年，任锐的长子孙宁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父亲生前老友周恩来，不久，被派到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随后，她的女儿孙维世也离开上海到了武汉，被周恩来送到延安抗大学习。朱德对已故老友的孩子严格要求，悉心培养。周恩来和邓颖超缅怀忠烈，决定抚养孙维世。他们写信给任锐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任锐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很是感动，接受了这个建议。

1938年2月，朱德总司令从山西洪洞抗日前线写信给任锐，介绍她去延安抗大学习。任锐即赴延安。

她到达延安时，女儿孙维世已在那里。她和维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那时任锐已是47岁的老同志。在学员中，她岁数最大，又有过较深的阅历，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还常鼓励青年同志努力学习，大家都很尊敬她。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亲切地叫她“妈妈同志”。那时在延安，人人知道有一位年纪虽大、斗志弥坚的“妈妈同志”。毛泽东给任锐写信时，也随大家，称她“妈妈同志”。周恩来在送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背面也这样写：“代送给任锐妈妈同志”。

1938年5月，任锐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冬，任芝铭先生亲身送他最小的女儿任均到延安参加革命。任锐同父亲、妹妹、女儿和从前线归来的长子宁世一起，在延安相聚了一段日子。从父亲那里，她得知次子济世正率一话剧团在豫北积极宣传抗日，心中甚慰。

父亲任芝铭在延安逗留期间，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举行的招待宴会。毛泽东对他说：“任老先生从蒋管区不远千里而来，我们非常欢迎你！”

任芝铭不仅仅是送了他的女儿到延安。1938年春，任芝铭所在军队的长官张轸升任第十三军军长，任芝铭调任这个军后方留守处主任。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回新蔡，动员并亲自领来几十名青年，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平时，他委托一人在新蔡随时动员、介绍。凡去延安的，都由他派第十三军军车护送，穿过胡宗南辖区，直达延安。张轸以前去日本留学时，曾得过任芝铭的资助；袁世凯杀国民党人时，又受到任芝铭的保护。他把任芝铭当做长辈，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师友关系。因此，他虽然知道了任芝铭送青年学生去延安的情况，也未加制止。那时经任芝铭帮助去延安的青年，共有37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今是学校的学生。

1939年，任锐从马列主义学院毕业，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安排在四川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保育院有500多个孩子，都是从日军炮火下抢救出来的孤儿。任锐视孤儿如亲生儿女，从学习到生活无不关怀备至。孩子们被分成若干中队，其中有病的孩子编在一起。任锐特别关心这些“病中队”的孩子们，亲自照顾他们大小便，送水给他们服药，还用自已的

生活津贴费给孩子们买白糖等营养品。她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民族英烈的故事。这些孩子们，后来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任锐在保育院对孤儿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引起了国民党CC派注意，认为任锐不是一般工作人员，有特殊身份。因她反对克扣儿童粮饷，遭到国民党CC派的排挤，被迫去职。随后组织上分配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

1941年秋，任锐奉调从重庆回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负责公文审阅加印。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任锐年长体弱，大家都照顾“妈妈同志”。但她不甘落后，尽其所能参加劳动和安排好同志们的吃住。当时物质条件艰苦，组织上照顾老干部，让她吃小灶，她却省吃俭用，食粗粮吃咸菜，把每月发给的很少的津贴费节省下来，给有病的家属孩子买白糖和鸡蛋吃。她说：“要照顾好下一代，孩子们比我更需要。”她衣着朴素，补了又补，多次把发下来的新制服退回去。她说：“前线的同志比我更需要。”因此，大家非常敬重这位老革命“妈妈同志”。

1945年秋，任锐的三子孙名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那时，她的长子孙决（孙宁世）已去东北前线，女儿维世也早于1939年被周恩来带去苏联学习，六妹任均和妹夫王一达在延安平剧院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任锐，决定把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在任锐心中，家庭命运早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她决定将小儿子送到最需要人的东北战场。名世去了牡丹江炮兵部队。

临别，名世对母亲表示：不会忘记爸爸的血海深仇，不会辜负妈



任锐（右）和女儿孙维世

妈的殷殷期望。送走儿子，任锐的心情不能平静。与小儿子一别数载，此次仅相聚数日，却又鼓励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但母亲视民众利益高于一切，见孩子已承父志，并能理解妈妈，她心中甚慰。可是，孩子此去毕竟山高水远，谁知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任锐心绪起伏地写了一首诗：

送儿上前线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忧。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此后，她再没有见到小儿。1948年秋，孙名世牺牲在辽沈战场。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

军主动撤出延安时，任锐已病情加重。在随政府机关疏散途中她经常呕吐，疼痛不止。但她始终对疾病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犯病时，就在地面上蹦跳，以对抗疼痛。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任锐随胜利大军，又回到这座她在这里投身辛亥革命、在这里与孙炳文结为伴侣的、阔别20多年的古城。

任锐激动。她知道，一个新的政权即将诞生，她将有更多的事情去做，也可以去享受和平的阳光。可是，为了这个胜利而奔波奋斗了一生的“妈妈同志”，此时已身患绝症，癌症折磨得她日渐消瘦。她知道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了，在医院，她握住泪流满面的女儿维世的手久久不放。看到孩子已成就人才，可以告慰亡夫英灵了，她放心坦然。她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眼前这心爱的女儿孙维世，和她与孙炳文的第一个儿子孙决，会在一场“文革”中死于非命。

任锐的六妹任均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向邓颖

超打听，得知二姐病危，住在天津天和医院，急向大会请假，与三姐任载坤一起奔赴天津探视。但她们去迟了一步。姐妹重逢之日，已是诀别之时。任锐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了。她只默默地拉住妹妹的手，流下了饱含手足深情的最后几滴眼泪。

1949年4月11日，任锐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终年58岁。

父亲任芝铭在报纸上看到二女儿病逝的消息，悲痛异常。6月，他到了北平。

周恩来听说任芝铭来到北平，正住在清华大学他的三女儿任载坤、女婿冯友兰家，就亲自前往看望。周恩来对任锐的去世深表惋惜，他请“伯父”节哀。朱德接任芝铭到中南海家中会晤，赞叹了任锐坎坷而坚定的一生。

80岁的任芝铭老人在外孙女

孙维世陪伴下，到万安公墓哀悼女儿。在任锐的墓前，他回忆起二女儿十七八岁就随自己参加辛亥革命，出生入死；后来，同她丈夫一起，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不幸早年丧夫，中年失子；20余年来，她携儿带女，奔走革命，不辞劳苦，鞠躬尽瘁。胜利之日，她却撒手而去。老人情不自禁，老泪横流。

（责任编辑 徐孔舒 蓝）

（上接28页）

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耀邦不但及时阅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访问回来，他都立即听取汇报，认真阅读他们所写的每份调查材料。他先后在这些材料上写道：“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耀邦就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了给中央的复查报告。

四、中组部的调查报告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

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天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的实践表明，历史的真实不容歪曲！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

（责任编辑：林耀 萧 徐）

“求实部长”

杨显东

● 吴德才

给“棉花卫星” 泼冷水

1959年，庐山会议后。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随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乘专机到安徽合肥，主持召开全国棉花现场会议。大会由谭震林主持，作为棉花专家的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当然只能给谭震林当好“参谋”。

一路上，谭震林对农业科学家杨显东是比较尊重的，互相交谈，也很随便。

“老杨，在这次全国棉花会议上，要鼓干劲、反右倾，总结经验，解放思想，”谭震林笑着说，“你是棉花专家，你觉得明年棉花规划指标要求多少呢？”

“这个……”杨显东感到不好先开口，指标说高了吧，不符合科学规律；指标说低了吧，又不适合领导意图，故迟疑地思索着，反问道：“谭副总理，你的想法呢？”

谭震林感到自己的思想也许跟不上形势了，下面报产很高，放的“卫星”也不少，令人将信将疑。他用一种试探性的口气说：“安徽巢县报亩产棉花700斤，我们要求

明年亩产350斤，你觉得怎么样？”

“高了……”杨显东直摇头，用恳切的语气回答说，“巢县亩产700斤是不可能的。”

“啊——”谭震林听了一惊，接着说：“300斤呢？”

“也高了……”杨显东仍然摇头地说。

“200斤呢？”

杨显东继续摇着头，不吭声。

谭震林又问道：“难道我说200斤，你还认为是高指标吗？”

“科学不能掺半点虚假。”杨显东笑了笑说，“谭副总理，干劲要鼓而不可浮夸，规划指标一定要留有余地。”

“我们的棉花专家，你的思想要解放呀！”谭震林笑着说，“要从洋书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农业大跃进的形势啊！不过，我们是两人在议论，畅所欲言，你说明年规划指标应该提出多少呢？”

“我觉得，明年全国棉花亩产皮棉能过百斤大关，就是特大的跃进……”

“哈哈，你这不是跃进，而是倒退吧！”谭震林笑了笑，严肃地说，“1958年全国棉花单产就突破了百斤大关嘛！”

“谭副总理，去年下面报来的数字水分很大。”杨显东说，“我和一些棉花专家进行典型调查和科学测算，去年全国棉花单产约50斤左右，这个增产幅度不小，也是百分之二十五呀！”

“那这样吧，”谭震林想了想说，“我们不先提出指标要求，以免泼下面同志的冷水，规划指标由下面提出来吧！”

杨显东与谭震林的对话就这样告一段落。他们到合肥下飞机后，立即到巢县检查号称亩产皮棉700斤的棉田。杨显东与随行人员一起量了棉田面积，数了株数及每株桃数。杨显东和技术人员计算后，结论是：棉花长得很好，也确实是真的丰产了，但亩产皮棉约200斤。杨显东对当场群众鼓励地说：“你们这片丰产田办得不错，即使是亩产皮棉200斤，也是了不起的成绩呀！”为了照顾当地基层干部情绪，向谭震林解释说，可能是地方领导听错了，不是亩产皮棉700斤，而是亩产籽棉700斤。最后，杨显东还说“大面积丰产片，亩产籽棉700斤也达不到呀！”

杨显东率领检查团到各地参观完毕，最后到河北邯郸作总结，



1958年，时任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的杨显东（中）与国际友人在一起

综合各省上报的规划指标，要求全国单产皮棉200斤。这个指标虽然比350斤要低得多，但杨显东和一些棉花专家觉得这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怎么办呢？根据谭震林的意见，再不能给下面同志泼冷水了！杨显东在心里暗想，好在是谭副总理对他比较了解，不会抓他的小辫子，也不会批判他的“右倾”观点，使他解除了后顾之忧。谭震林笑着问：“老杨，你是棉花专家，要实现全国棉花单产双百斤，你们打算怎么办？是做大跃进的促进派，还是做大跃进的绊脚石呢？”

“我们当然力争做大跃进的促进派啊！”杨显东的回答是恳切的，他的行动也是积极的。“我已经和河南省吴芝圃同志商量好了，他同意将安阳棉场三千多亩棉田拨给我们农科院作为棉花科学研究所的基地，我们派几位棉花专家，专门搞棉花优种高产试验，并调安阳行署副专员任棉花科研所党委书记，加强对棉花科研工作的领导。”

“那好，这条措施很得力。”谭震林赞赏说，“通过棉花高产试验

中心，培育优良棉种，创造高产经验，及时指导全国棉花生产。你是棉花专家，这个棉花科研所你要亲自抓好啊！”杨显东又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

可是，这个棉花科研所，在浮夸风严重的影响下，头脑发热，要放棉花卫星上天，提出棉花亩产籽棉一万斤的高指标。杨显东知道后，又好笑又生气，语重心长地对棉花科研所党委书记说：“你是领导专家们搞科研工作的，不能搞浮夸说大话呀！”接着又用科学数据对他说：“你知道吗，每亩植棉5千株，每株平均15至20个桃，最多共10万个桃，每斤籽棉约100至120个桃，这样满打满算的最理想的预计高产，也只有8百多斤到一千斤籽棉呀！你提出亩产籽棉一万斤的高指标，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请你好好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坚持求实精神，才能领导好棉花科研工作。”

1958年金秋季节，棉花喜获丰收。杨显东怀着高兴喜悦的心情回到自己家乡湖北沔阳县。沔阳是

湖北重要产棉县之一，全县当时有七十万亩棉田。他一回到家乡，县里领导就陪同他到长埧口公社黄益大队参观一块棉花高产卫星田。田头竖起了一块丰收喜报牌，牌上用红油漆写着醒目的大字：亩产籽棉10138斤。他一看就大吃一惊：“啊！我家乡的棉花卫星上天了！”县、社领导以及来参观的代表、大报小报的记者都希望这位农业部副部长、棉花专家鉴定确认万斤棉花卫星上了天，以便作为特大新闻登报宣传。杨显东以科学家的认真态度，和随行人员量了棉田面积，从株距到行距，从桃数到成桃数，进行了科学测算；又检查棉田科学管理，合理密植，科学施肥，防病治虫，保蕾保桃等，这些都搞得很好，棉花高产大有希望，是了不起的科研成果。杨显东激动地说：“同志们，乡亲父老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三位棉花姑娘确实了不起，她们用勤劳的双手和钻研精神，把这块高产试验田办得很好，她们的科研成果达到了我们棉花专家的科研水平。”大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三个棉花姑娘心里也乐开了花，满脸露出了喜悦的微笑……

杨显东接着幽默地说：“不过，你们的丰收喜报牌写错了，多写了一个零吧！同志们，亩产籽棉七八百斤，就是棉花卫星上了天嘛！你们说什么亩产籽棉超万斤，却多说了十多倍，这可不能开玩笑啊！”

“杨部长，我们已经核实过了！”一个公社干部说，“这块棉花卫星田的棉梗都拔起来秤过……”

“嘿，如果你把一亩田的棉梗都拔起来过秤，加上棉梗可能有一万斤……”

在场的干部、记者听了杨显东的话，似乎从头到脚淋了一桶冷水，大家都不吭声了，记者也不摄影了，都用冷淡的目光注视着这位

泼冷水的“求实部长”……

“同志们，我看到家乡棉花大丰收，而且是抗灾夺丰收，感到非常高兴。请大家冷静地想一想，亩产籽棉超万斤，是根本不可能的。”杨显东对社队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有几位棉花专家办的试验田，亩产籽棉不到千斤，而家乡棉花姑娘却创造了高产奇迹，这使我感到万分高兴。但见到少数干部搞浮夸，我又感到非常痛心。我衷心地希望各级干部要学习科学知识，用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重新核实这块试验田的产量，不要浮夸，如实上报，我积极推荐棉花姑娘代表当劳动模范，上北京见毛主席！”

杨显东说完就驱车走了。从此，“求实部长”抵制浮夸风，在他家乡传为佳话。

带头揭“大寨”的盖子

“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轰动全国。为了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杨显东和农业专家们对“农业学大寨”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了研究。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召开全国农业科学大会。杨显东任理事长，代表们一致要求说：“杨老，你带我们到大寨去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啊。”

“那好，我们就到大寨去参观。”于是，杨显东带领800余代表兴致勃勃地乘专列车到大寨去参观。代表们到大寨一看，大失所望，只见大寨的虎头山是光秃秃的。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麦苗长得如何？更是令人伤心！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大家到田

间看了说：“这样的麦苗怎么能高产呢？”只有玉米长得不错，但病虫害严重。代表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其中有棉花专家、小麦专家、水稻专家、玉米专家、畜牧专家、园艺专家、植保专家、土壤学专家等等。大家在大寨参观时，议论纷纷，有的说“一切砍光”不符合农业全面发展的方针，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

杨显东也觉得大寨无科学。

作为一个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亲眼所见，并听到了代表们的议论，心情沉重地思索着：大寨的问题不能再捂盖子了，再捂下去，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搞下去，对中国农业发展是极大的不利。但他又想到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揭大寨的盖子，还必然要触及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这个盖子揭不揭？怎么揭？揭开之后会引起什么反响？也许会惹来再次被打倒的横祸吧！他想到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毛主席负责，对中国农业发展前途负责，就不该有后顾之忧。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要坚持真理，敢于说实话，即使是触及到陈永贵的问题，目的也是希望他改正错误。

杨显东从太原回北京后，以农业经济学会的名义，组织了有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大寨问题。杨显东在座谈会上结论说：“必须揭开大寨的盖子！”在座的老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说：“你说得对！”会后，杨显东又作了一番调查，并对过去宣传大寨的材料进一步作了分析，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大寨问题归纳为六个问题：

一是大寨的耕地面积、产量、大旱之年大丰收、自力更生是假

的。所谓大旱之年并不旱，是陈永贵亲手把当年的实际雨量写少的。大寨尚未出名时，大寨人确实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可是，大寨出了名以后，毛主席又树起了“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不仅是农业生产典型，而且是作为农业发展的方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进行无偿的支援，这能算自力更生吗？

二是没有执行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它多种经营都砍掉了。

三是毁林造田，大造什么山间小平原，破坏生态平衡。把虎头山上的树砍掉，把小麦种到山顶上怎么能高产呢？中国山地占总面积70%，都能学大寨毁林造田破坏生态平衡吗？

四是过去宣传大寨的“海绵田”言过其实。据土壤学家们观察认为，大寨的土壤与一般土壤差不多，可能由于秸秆还田，有机质多一点，但根本谈不上是“海绵田”。

五是社员家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社员家庭中不准喂鸡喂猪，谁家喂养了猪、鸡，要作资本主义批判。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推行极“左”政策，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挫伤了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积极性，把千家万户农民都推进“一样穷”的峡谷中，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大不满。

六是实行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员劳动不计定额，吃的是“大锅饭”，而且吃得很苦。号召全国农村推行评“大寨工”，群众叫做评“大概工”，谁会讲学讲用，谁就评上“标准工”，谁不会讲学讲用，谁就评不上“标准工”。当时农村流传着一首民谣：“大概工，大概工，屋里评议外面通，评到凌晨三点

钟，白天干活磨洋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陈永贵曾两次到杨显东的家乡湖北省沔阳县，他强令沔阳县委要建设成“大寨县”，要扩大人民公社，几个大队并成一个大队，几个生产队并成一个生产队，更严重的是建设“大寨村”，强迫农民拆私房、大搬家，有的搬家两三次，群众怨声载道，干群关系恶化，群众不满地说：“学大寨，建新村，人搬穷，火搬熄，我们越搬家越穷，这是陈永贵积的‘德’呀！”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他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杨显东越说越气愤了，尖锐地批评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政协委员们都情不自禁地拍手喝彩，同时也为杨显东慷慨直言而担忧。因为当时陈永贵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呀！

杨显东的发言像爆炸性新闻，作为小组简报发给全体政协委员后，成了五届政协会议两个重大事件之一。来自大寨的一位政协委员一看简报就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言下之意，就是说谁揭大寨的盖子，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农业部党组了解此情况后，一位负责人大发雷霆，严肃地批评他说：“老杨，你这个发言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说的，你不应该说，未经部党组同意，一切后果都由你个人负责。”

“我个人负完全责任。”杨显东坚毅地回答说，“大寨问题很大，如

果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一名政协委员，我要对八亿农民负责，要敢于说真话。如果我们再捂盖子，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杨显东感到问心无愧，而且他的发言绝大多数政协委员是支持的，包括山西省的一些政协委员都是支持的。

最后，农业部长写了一个条子，要杨显东去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承认错误。他未予理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显东之所以敢于挺身而出地揭露大寨的盖子，决非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出于一个农业专家强烈的责任感，出于对中国农业发展艰难曲折历程的深刻认识。自从农业合作化高潮，批判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同志的“小脚女人”思想以来，中国农业就一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经过了几个“马鞍形”的发展阶段。从1958年“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业陷入了濒临崩溃的困境。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三自一包”，实行了调整方针，纠正了农村“一平二调瞎指挥”的极左错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恢复很快。然而，在“十年浩劫”中批判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了一系列的极左政策，使中国农业再度陷入困境，而“农业学大寨”正是推行极左政策的“典范”。杨显东回顾历史教训，才以科学家

的慎重态度和求实精神，带头揭开大寨问题的盖子。

1980年，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会议上，政协委员对大寨问题都很关心，意见纷纷，坚决支持杨显东去年的发言。直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农业部副部长王观澜说：“大寨问题是农业战线上的重大事件，老杨在三年前就第一个揭开了盖子，可是我们农业部党组还是捂盖子，想起来真令人痛心！”老副部长刘瑞龙说：“老杨是农业专家，敢于说真话，当他第一个揭大寨问题的盖子时，我们农业部党组还要给他处分，可见我们农业部对农业改革的阻力还不小呀！老杨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做农业改革的促进派呀！”主持会议的副总理万里说：“老杨同志不愧为农业专家，三年前就揭开了大寨的盖子，真是难得呀！”

“我们都是农业战线上的老战友，其实我并不比同志们高明。”杨显东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大寨问题群众早已揭露了，我只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良心，代表群众说了几句真话，我的意见都是来自群众，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如今‘农业学大寨’已被实践否定了，今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该怎么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本刊启事

全国各地邮局订阅期刊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凡是漏订或在当地邮局订不到1996年《炎黄春秋》杂志的读者，请直接向本社发行部订阅。本刊每月一期，单价4元，全年12期订价48元。

可根据您的需要订全年、半年、一个季度，也可按月零购，均免收邮费。

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170955

联系人：杜习

龙马精神海鹤姿

——评董寿平先生的书画艺术

● 刘恪山

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鉴赏学家董寿平老先生，1904年2月17日，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汾河岸边的杜成村的一个诗书世家中。其高祖董弄堂是清代中叶著名书法家；祖父董文焕是清咸丰翰林，以诗书见长于世，为清代著名诗人、书法家、音韵学家；其父董维藩亦善书画，家中广集历代名家书画，尤以收藏文物图书称著，藏书十余万卷。

1921年，董寿平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后转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26年毕业于北京东方大学经济系。他无意仕宦之途，立志学画，因自幼深受家庭诗书的熏陶，刻苦自学，经常去故宫博物院观摩历代名家书画，潜心学习，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初步形成自己清新的画风，1931年后在北京作画问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董寿平历尽艰辛始达成都。1938年在成都举办画展，受到各界好评；1939年卜居灌县玉垒关上，遥望窗前青城山色濛濛，窗下岷江拍岸涛声滚滚，巴山蜀水的雄伟景色，陶冶和激励着画家的情操，夙夜秉烛，钻研书画，孜孜不倦，在灌县十二年，作画数千幅，画艺大进，而后又多次在重庆和蜀中各地举办画展。

在蜀期间，国内著名书画家云集四川，先生与林山腴、谢无量、沈

尹默、徐悲鸿、赵少昂等过从甚密，友谊深厚。

1940年沈尹默先生作诗相赠：

山水妙理备四时，
谁欵写之穷神奇，
昔者北苑立标格，^①
浑然璞径绝险夷，
思翁翰墨本多韵，^②
烟云舒卷清醇姿，
胜朝公卿亦好艺，
富春名字犹昭垂，^③
君今年少笔已老，
才堪绍述同襟期，
自是君家有根底，
不比寻常称画师，
学与年进理当尔，
看君更权深沉思。

注：①北苑，指五代南唐画家董源，曾任北苑副使，故称董北苑。②思翁，指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号思白。③富春，指清代画家董邦达，他是浙江富阳人，

位于富春江畔，故称富春。

1951年，董先生携家眷自四川重返京华，1953年任北京“荣宝斋”编辑，又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批会员。他在“荣宝斋”工作期间，为恢复、提高我国传统的木版水印画的印刷技术和培养临摹我国古代名画的技术人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年他的巨幅《山水瀑布》图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

中国对外文化委员会将董寿平先生之画推荐出国展览以后，在历届对外中国画展览时，均有作品参加，饮誉海外。

1954年董先生赴安徽黄山和浙江富春江写生，黄山的雄伟奇险，怪石老松，云雾变幻，深邃钟毓，氤氲之气给他深刻的启迪，此后在他所作的山水画里，多以黄山为意境，他



创作的巨幅山水画《黄山云海》、《雨后黄山》、《天都云汇》等力作，受到广泛好评，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1956年，他应邀去雪山、草地及二郎山旅行写生，创作“长征”巨幅画卷。

1965年，董先生在“荣宝斋”退休，专心从事中国书画的研究和创作工作。

此后，董寿平先生有许多力作问世，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国际机场、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及我国许多驻外大使馆均有他的作品陈列，欧美的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也竞相收藏他的作品。

1979年以来，董老应邀曾十二次访问日本，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和讲学；又于1989年应邀去新加坡举办展览，获得崇高的声誉。

1990年，由山西省政府和太原市政府筹建的“董寿平美术馆”，在太原市风景区晋祠内落成，永久陈列保藏董寿平先生捐赠给家乡人民的二百幅书画珍品，使之传之后世。在筹建期间，得到了日本友人著名书法家村上三岛先生、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宇作美公有先生、旅日华侨林白先生等的热情资助。宇作美公有先生为此曾多次来太原主持由他捐赠的“董寿平美术馆”馆内的全部现代化的陈列设备和安装工程，其情深笃。“董寿平美术馆”的建立，是山西省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体现了中日人民的友谊。

1993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隆重举办“董寿平九十岁书画展览”，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在京友好人士纷纷发来贺电、贺幛和花篮致贺。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一百五十余人专程来北京祝贺，并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董寿平艺术研讨会”。

1994年夏，董老应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之邀请，住进十一号楼避暑，作巨幅“青松图”。其间日本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访华，专程到钓鱼台拜访董寿平先生，并在董老新作“青松图”前合影留念。

1995年夏，董老已九十二岁，又应钓鱼台国宾馆之邀请，住进二号楼避暑，9月17日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专程去钓鱼台拜访董老，就中国绘画的继承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1995年8月，董寿平先生的绘画作品四十幅，应邀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隆重展出，获得广泛好评。

董寿平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协会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董寿平先生的作品出版有：《董寿平画辑》、《董寿平书画集》、《书画大师董寿平》等。在日本出版的有：《现代中国画巨匠董寿平名品展》、《书画巨匠董寿平、村上三岛书画集》、《书画大师董寿平》等大型精美画册。

近年来，外国报刊和学术界尊称他为“董画伯”、“人间国宝”、“中国书画大师”。他为促进中日友好事业和人民友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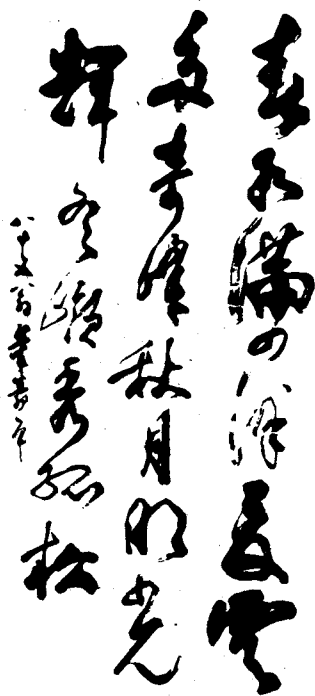
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董寿平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画风清新典雅，苍劲古朴，笔墨精妙，能在继承中国绘画优良传统的理论和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富有时代感。他强调以造化为主，从写生入手，再寓以高度的艺术概括，重在表现物象之神韵。他善于融汇古今各家之长以为自我之法，形成独特的个人画风。他在七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艺术之花绚丽多彩，艺术之果丰硕累累。

董寿平先生年高德劭，淡泊名利，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为赈灾、为抗战、为祖国建设捐献了许多珍贵的书画。如：在1952年时，将家藏历代名贵书画百余幅捐赠给山西省博物馆；1990年为山西太原“董寿平美术馆”捐赠他个人的书画力作二百幅；同年又为北京“炎黄艺术馆”捐赠个人书画作品五十幅；1993年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捐赠个人书画作品五幅。多年来凡向他求字画者，他尽量满足要求，从不计报酬。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是个高尚的爱国主义者。

在董寿平先生七十余年的艺术实践中，在美术理论上和绘画技法上，他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建树；他认为画品要高，画家本身的





品德修养也必须高尚，文如其人，画亦如其人。欲求画品高尚并非主观意愿所定，而是取决于画家本人的素质、文化程度，环境与社会教育的影响；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对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运用的深度；对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艺术的态度。

他说：“中国绘画艺术有它自身的特点和历史渊源。它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中成长的，又紧密地围绕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孕育形成的，正确地理解中国绘画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色，是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依据，也是必要的途径。”

他十分强调学好哲学和绘画的关系，他善于运用我国古代“太极学说”和现代“唯物辩证法”来作为指导自己作画的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构图中的布局，用笔时的力度，用墨时的浓淡。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灵活运用到绘画创作上去。

他认为，应从纵的方面对我国历代的哲学、经史、文学等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才能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绘画风格及技法演变的原因。再从横的方面对我国历代画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风格进行分析探讨，才能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习各家之长作为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法的手段。通过上述的学习研究，进而认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更增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的自豪感。

他说：“画家的品德、修养、气质、思想等的精神境界和深度，都将毫不掩饰地在自己作品中反映出来。作为一个画家应有高尚的情操，渊博的学识，广阔的视野，精湛的技巧才能创造出画品高尚的作品。”

他还认为，“如何去认识客观世界，表现客观世界，应着重表现物情，物态，物趣，从认识物理入手，要对一切事物的常理、物性进行观察，在不违背常理的前提下，突出表现其特性，同时要将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感情倾注于笔墨中，作品要体现出作者的心血，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感染观众，给人以无限美妙的遐想和艺术享受。”

他认为，“中国绘画始终从不排斥和借鉴外来的东西，但它是在继承发展中国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去学习借鉴外来而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理论和技法，做为自己的营养。中国绘画的传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要变的，变的过程中就有创新，创新中决不能把我们固有的好传统丢掉，这样的创新又成为新的传统了。”

董寿平老先生以画山水、松、竹、梅、兰著称于中国画坛，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他画山水，以黄山的奇峰老松为素材，而不是黄山某一景点的具

体写照，而是以黄山的云雾变幻，山势的起伏跌宕，峻峰怪石的经营为主，不拘泥于一峰一石的形似，而求整幅气势的统一，画黄山而非黄山，非黄山而似黄山。凝视其画，先觉气势雄伟而引人入胜，渐觉山谷生风，风动而云起，云随风涌而成雾，雾随气变而峰现，豁然开朗，别有天地，仿佛身在画中，为之心旷神怡，遐想于画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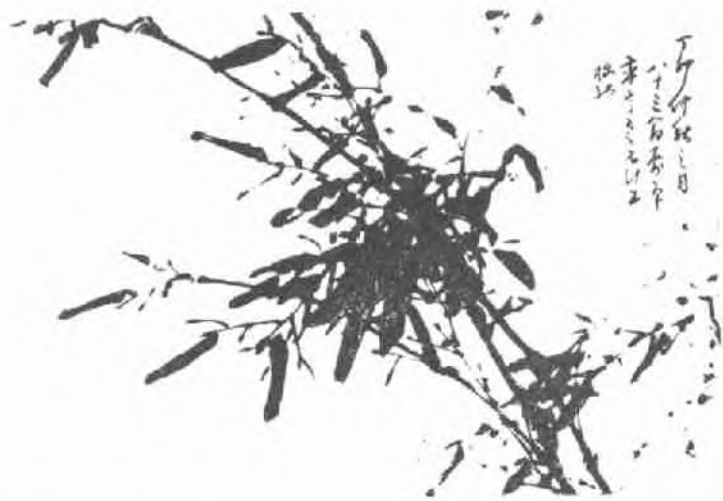
董老说：“195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邀我去黄山及富春江一带旅行写生，我是观察多于写生，我常坐在黄山顶上静看云雾的变化，奇松怪石的生长特点。什么是黄山的特点？使我领会到黄山的山峰是由花岗岩组成的，石纹多为直线条，很少横线条。黄山上的松树不是生长在土中的，而是生长在石隙中的，土少、水少，生长缓慢，因此长不高，松针也不长，山高风急促成了黄山松树杆的短粗，形态奇特，横枝舒展而平缓修长。由于环境的影响，形成松树往向阳的一面生长，这就构成了黄山松的特点。”

“黄山云雾，倏忽万变，自古以来绝无重复，神鬼莫测，在黄山上刚一动笔，则又变化无穷，有云雾的衬托才能显出山峰，没有云雾也就无处寻峰了。”

“我画黄山不去如实地表现某一景点，而是概括黄山的意境，使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黄山。在经营位置上，计白当黑，用山和松的虚实远近景物去显出空白，使人感到峰后还有峰，山外更有山，空虚处还蕴藏着许多奇境在呼唤你，这样去画黄山，其情趣才能无穷无尽。”

“黄山云雾的变化，将静止的黄山变成了飘动的黄山，我要画的是有动态的黄山，而不是静止的黄山。”

由于他深入地观察黄山，心领神会，积淀和掌握了黄山的各种特



点储存在脑海中，结晶升华成他画黄山的素材，此后他画山水之法为之大变。

他在画黄山时，在技法上有许多创造，不起稿，不重复，信手落笔，先用焦墨画出主要山峰的轮廓，一笔下去顿挫婉转，顺笔回锋，敝出山峰的明暗部分，加墨后逐渐引伸开去，再勾出山石的形体，用笔上的余墨画出中景的山峰，将画悬挂起来审视一番后，稍作修饰，然后喷清水湿润画面，再用淡墨晕染出云雾和远山，待画面干后，用焦墨画出松树及点苔。

在运笔时，他强调笔的压度、速度、力度，虚实关系和自我的情感，笔之过处要显示出物象的神韵，笔笔都要有生机，无论简与繁，每一笔都要有他的作用，力求做到多一笔则过，少一笔则欠，要做到画中无废笔。下笔要有千钧之力，收笔也要有千钧之力，“排闥纵横，运斤如风”。在笔的运行过程中，时而如春蚕吐丝，时而如逆水行舟。笔墨不仅显示出作者的情感和技巧，同时还包含了作者与所表现对象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

董老画的山水画，也有不少作品是着色的，他用色讲求和谐、清

雅、沉着。山石以淡赭石色晕染，远山及山石的下部及云雾，稍施花青色晕染，使画中的景色更加层次分明，有深度，有分量。虽整幅画面以墨色为主调，略加色彩后，更凭添了画面的神韵和感染力。

董寿平先生画的山水画，气韵生动，章法恢宏，潇洒自如，意随笔出，一挥而就，充分表达出自然造化之美；博大幽深之美；雄伟峻峭之美；钟毓氤氲之美；中华大地之美。赢得了“画黄山巨擘”之美誉。

董老画松树，别有风韵，华盖亭亭，郁郁葱葱，气势磅礴，有如苍龙探海之势，大鹏扶摇之神。无论巨幅或小幅，从不起稿，激情所致，奋然挥笔。先用焦墨画出松树的主杆及小枝，再手执两管，画出松树的针叶。他画针叶时，多用焦墨，撼动笔尖，稍稍停顿，快速提笔往中心收，或就势往外放，再用板刷笔蘸淡墨涂点每组针叶的中心，又往中心稍着浓墨，使之自然渗化，更觉松叶生机勃勃，坚挺舒展，层次分明，跃然纸上。

1979年，董老应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作巨幅“苍松图”（6米×4米）。如此巨幅，实难画好，但他却不起稿，从容画来，四人抻纸，二人

奉墨，洋洋洒洒，气度恢宏，章法森然，令人叹为观止。

1987年，董老应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之邀请，为“养源斋”接见外国元首大厅正壁作巨幅“青松图”，由书法家、文学家启功教授在画上端题诗：

层盖盘根依太空，
虬枝铁杆势如龙，
八旬董叟摩天笔，
写得黄山第一松。
鳞皮磊落禁风雨，
坐阅桑田几度新，
今日高堂初素壁，
长寿分明出天真。
韦偃丹青迹最奇^①，
精工曾入杜陵诗^②，
钓鱼台畔青松障，
容我淋漓倒墨池。
雄都华构竟入云，
名园一角静尘氛，
金元代代无穷事，
且听乔松说与君。

（注：①韦偃是唐代画家，善画山水、野马、老松怪石；②杜陵，即唐代诗人杜甫，号少陵，故称杜陵。）

1994年夏，91岁的董寿平老先生又应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邀请，再为接见贵宾大厅作巨幅“青松图”。传为画坛佳话。

他画的松树，博得“寿平松”之雅誉。

董老先生画竹，妙趣横生，构图神奇，用墨简练，湿笔过处有如雨后翠竹，枯笔落后如临风飘舞。竹子在风、晴、雨、雪中的各种姿态，在他的笔下表现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

他画竹时，只见行笔如飞，纵跳自如，一气呵成，生机盎然。每一枝每一叶都蕴含着他的哲学思想和高风亮节的品德。他先用浓墨画出数丛竹叶，稍干后用淡墨画出竹竿，在笔端凝聚适量水分，一侧着墨稍重，一侧稍轻，一笔过去，则自然显出竹

竿的圆形，富有立体感。

他画嫩枝梢时，似有弹性，纤而不弱，柔而不软，劲而不硬，刚而不僵，显示出遒劲的笔力。近看穿插有序，远看大气凛然，墨色淋漓，章法自然。

所画风中之竹，迎风摇曳，姿态婀娜，有如婆娑起舞。

所画雨中之竹，枝梢低垂，叶片下僵，苍翠欲滴之感，油然而至。

所画晴日之竹，枝叶挺拔，层次分明，疏落有致，欣欣向荣，笔墨中富有欢欣感。

所画雪中之竹，笔墨奔放，枝叶下垂，用笔苍劲，内含傲倔，再用大笔着淡墨衬出背景，在枝叶上留出空白以为积雪。看后顿觉寒气袭人，表现出竹子傲雪不屈的性格。

董老认为：“画竹的过程就是如何将具象美与抽象美和谐统一的过程，也是画家本身与所画之竹融为一体过程，人即是竹，竹即是人，要做到人画竹而竹化人。人与竹俱达到“物我两忘”的意境之中，才能画好竹。画竹完全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情感的宣泄，笔下之竹是似竹非竹，非竹似竹的理想中的竹子。”

元代画竹大家倪瓒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斜与直哉……”。

他还引用苏东坡《筧谷偃竹记》一文中的一段文章来比喻，“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

在画竹用笔方面，董先生积其70多年画竹的体会，他强调画竹时用笔用墨就是具体实践“太极学说”和“唯物辩证法”的过程。画家的感情就是“生”，作画时要把自己当成万物之主，是你自己在创造竹子的“生长”和“生命”。用笔的压度要均，速度也变均，起笔落笔要有节奏，有旋律，笔锋的粗与细，疏与密，长与短都要统一到整个画幅中去，每条线都有两种力量，“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沉着有力。有往而不收，则笔滑矣。若只有往外撑的力量而无回收的力量则成败笔，往左行笔应有右收的力量，才能表出竹子的质感来。画竹竿时，你原本想画直，而往往由于生理的现象。欲直反而画弯了，因此要既往左用力，又要往右收，使之消除视觉上的误差。

计白当黑十分重要，白纸本身就是画，画竹叶时，每看到的墨色竹叶的外边空白就是画，空白留得好就很美，这也就是阴和阳的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启功先生评论董寿平先生画竹时说：“我常在董老的墨竹作品前近看远看，总觉得他画的枝枝叶叶都是书法的点划，而整体却是一片活生生的竹林。他善于将书法融汇于绘画之中。”

董寿平先生所画墨竹，赢得海内外普遍高度赞赏，获得“寿平竹”之赞誉。

他画梅花，早期师法元代画家王冕，以画墨梅为主，中年以后变法，从写生入手，深入观察梅花的生长过程，取梅树枝杆的轩昂挺拔之态和傲寒不屈的特性作为创作的依据，不断创新，有许多力作问世。五十年代时，喜作粉梅，自染褐色宣纸作画，或用洒金纸作画，焦墨枝干，粉红花瓣，对比鲜明，光彩照人，大有古艳寒香之趣。六十年代后，再创繁枝密萼，绚丽夺目的“朱砂红梅”，朵朵梅花各呈姿态，花瓣的正、反、侧合各具其趣，涂点蕊蕊婀娜多姿，犹有寒香扑鼻之感。

先生自制纯净天然朱砂颜料，所作红梅永不退色。

他在画梅花时，先用大笔沾焦墨画出梅树主干及小枝，同时又注意留出画梅花的空白处，笔势虽中断，但续画时仍保持前进的笔力和笔意。再用焦墨或淡墨皴出树干的



树皮纹路，显出树干的阴阳面又有立体感。他有独特的画梅花瓣的画法，用稍有旋转的笔锋画出花瓣，水份掌握适当，透明，鲜活，浓淡相宜，质感很强，尤其是他画侧面的梅花，第一笔横出成侧面，第二、四笔是稍侧的花瓣，第三笔是正面的花瓣，使每一朵梅花都有不同的形态。

董老画梅特别讲求构图的气势，梅花的安排有如下围棋布子一样，要占有利的位置，要以少胜多，不要红花一片塞满画面。做到繁中有简，简中有繁，不因繁而乱其章法，也不因简而平淡无奇。色彩的浓淡干湿，墨色的晕染层次，扶疏有致，充分表露出梅花的特性。

他还善于作墨梅，只用墨画而不用颜色，画出的梅花反而使你感到有色，这种技法难能可贵。先用焦墨画出枝干，再用淡墨双勾出每朵梅花的花瓣，以焦墨点出花萼和花蕊，洋洋洒洒，犹如一树盛开的白梅，幽香飘来，沁人心脾。

他画梅时，速度很快，一笔在手，勾勾点点，皴皴擦擦，朵朵梅花瞬间即出，形态各异，枝繁花茂，生机勃勃。

看他画梅确是高度美的享受，他的画笔有如一个大交响乐团指挥手中的指挥棒，美妙的音乐旋律，就在他的指挥下迸发出优美的旋律，和谐，深远，时而高昂，时而低沉，这种节奏，使你感到共鸣，感到满足，感到欣慰。

1946年，书法家、诗人，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在成都为董寿平画梅题诗云：

寒梅雪里香浓，
仙境人间自永，
犹余故国青山梦，
画得神州一统。

1990年，启功先生在北京为董寿平画梅题诗云：



董寿平先生（左）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海部俊树

墨染浓淡影横斜，
绰约仙人在水涯，
有目共知标格好，
这瓶才是画梅花。

董寿平先生所画之梅，七十多年来誉满中外，故有“董梅”之赞誉。

他还善于画兰花，兰叶笔势一波三折，变化多端，清新飘逸，独具新意。兰花花瓣，随手点簇，疏散俏丽，花蕊略施焦墨勾点，似有阵阵清香飘过。尤其是他用淡墨画出兰草的花茎和花瓣，姿态万千，自有晶莹透明之感，如有水份运行其中。他画数丛兰草时，兰叶相互交错，形似蓬乱，但细看时，却根根有出处有收处，绝不零散。兰草中再略衬以山石，更显兰花的典雅高洁之神韵，也富有造化野趣。1982年，董老作《幽谷扬花》图，系用双勾法画出多丛兰草，兰叶舒展穿插，纵横交叠，笔法严谨，每根线条都表现出兰叶的质感和动态，体现出他高超的勾勒技巧。此画现存中国画研究院，博得广泛好评。

董寿平老先生之画，神形皆

妙，有传统技法；有自我性格；有书卷气质；有诗词意境；有哲理思想；有音乐旋律；有时代精神，可谓抒浩然之气，传造化之神。

他在国画艺术上的成就，造诣高深，是源于他幼年时代家庭诗书的熏陶，高度的文学修养，内涵品德的素质，勤奋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因素组成的。他在国画创作上的成就和追求，达到了历代中国画家所共同追求的新的艺术境界。董寿平老先生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董寿平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在他幼年时即受到严格的家学基本训练，又由于家中所藏历代名家碑帖和原作很多，视野宽广，加之勤学苦练，有了扎实的功底，青年时在北京求学，又得助于故宫所藏珍贵名家书法的影响，他从“二王”及历代各名家遗法中吸取精萃，自成一派，别树一帜于中国书坛。

他的书法艺术极富有个性，苍劲刚健，古朴潇洒，沉静谦和，严谨庄重，行笔流畅，神采奕奕，大

有飘逸超凡之趣，而无求妍美之意。纵笔豪放，有行云流水，清澈高洁，妙曲徐来，余音袅袅。

他说：“言者心声也，字者心画也。”书法如何表达个性和情感，要有精湛的笔法，墨法、章法，更需要有深厚的文学和各类艺术的修养，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的字外工夫。纵观历代书家，一代有一代的书风，一代书风必定影响一代书家，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志，虽各有不同的时尚，但各代书家又有各自的个性，形成不同的特点和风格。“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古云，“字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他认为，“书法艺术的神采，是审美的高深境界，也是书家孜孜以求的，如何使书法给人以美的感受，充满活力，从而使被欣赏者所

吸引、所感动、所陶醉，所折服，由此而产生美妙的联想，寄兴于无限。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即此之谓也。

董老十分尊重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理论“真以点划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使转为形质，变化为情性。”作为自己书法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董老说：“写行书和草书不能乱写，要每一笔都有根据，要使别人看了认识是什么字，乱草乱写，只图自己写的痛快，以为越草越怪才是好，那是自欺欺人。”

董老还善于悬纸书写和左手书写。悬纸书写时，由两人将宣纸悬空拉平，笔酣墨饱后，侧身作书，笔如走蛇，势若飞龙，转折顿挫，章法森然。悬纸书写，非常人敢贸然试笔的，笔力大则破纸，用力小则笔下浮滑，这一高超的书写技法，是董先生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

在北京和国内许多名胜古迹处，多有董寿平先生的题字，或铸锻为匾，或镌刻勒石，深为世人赞赏。他在国外访问讲学时，曾为许多友人题字，获得崇高的声誉。

从他的书法艺术中，感受到他精神境界的高尚，显示出他渊博的学识和刚正不阿、胸怀坦荡的品德。

赵朴初先生赞誉董寿平先生的书画艺术写到：“平原书法东坡画，龙马精神海鹤姿”。可见董老在书画艺术创作上的追求，达到了中国历代书画家所共同追求的新的艺术境界，而又能集东方艺术精华之大成。

“丹青不知老将至”，是董寿平老先生在八十岁以后常用的一个印章，这也是他老当益壮，勇于进取，不断创新，追随时代前进的心情。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招聘广告 ·

你是否有幸加盟“炎黄人”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北京等地数家实力公司组成的股份制法人企业。旨在复兴东方文化，再塑中华精魂，以新思路、高水平、大手笔为特点，聚合人才，创业图强，以文化产业开发和实业基地建设及综合业务为舞台，让中华精英和四海志士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展现个人的才华，实现自身的价值。

炎黄公司以深圳为桥梁，中原为基地，北京为窗口，构架“三点一线”的企业集团模式，正在河南新郑——这个黄帝诞生地、炎黄结盟的建都地、第八代炎帝榆罔诞生地、东方文化肇造地和将成为一片神奇热土的轩辕故里、炎黄故都，兴建“中华圣地——炎黄城。”

如果说三十年代，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优秀儿女，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話，那么，九十年代，具茨山下、姬水河畔又聚合了一批炎黄精英，在为东方文化的崛起和中华民族振兴搏击奋斗……

炎黄公司需要强干，忠诚敬业，具综合素质和事业心的总经理、文字秘书和公关秘书，企业融资人员、房地产操作和项目规划设计、模型制作人员、财会人员、从事文化产业、影视制作广告宣传人员，工业企业经营人员和综合业务人员……

他们将以自己对事业的忠诚成为炎黄公司的工作人员、企业骨干。在“任人唯贤”和“举贤不避亲”的择优筛

选和人才撞击交融中也可以成为公司的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分公司经理乃至总公司经理级人才，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将会分别安排在新郑、郑州、北京等地工作，并将根据自己的级别和贡献享受优厚待遇。

你想加盟“炎黄人”，请将学历证明、身份证明及相关的证件复印件和个人简历，一寸免冠照片，详细联系电话、地址，在本文见报一周内寄来。或直接来我公司人事部门面谈。

地址：北京复兴路9号（军博俱乐部）

北京炎黄城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46

电话：8514441 转 6260

联系人：李稻田 杨艳娇

郑州：文化路11号任翔酒店6层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450004

电话：0371—3845622

联系人：柳先生、王先生、杜先生

战士、诗人 陈辉

短暂的一生

●何辛

陈辉是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抗大的同班同学。由于他的牺牲我才侥幸地活下来，这使我怎么也忘不了他，深深地怀念他。

陈辉原名吴盛辉，1920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县一个商人家庭。三岁时爸爸吴昌铨去世，靠妈妈钟梅娜缝补、浆洗维持艰辛的生活。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毕业于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历任晋察冀通讯社记者，平西地区涞（水）涿（县）联合县青救会主任、区委书记、县武工队政委等职。1945年2月8日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938年，我俩同在延安抗大五大队学习。我和另一位同学编辑民先队墙报，就发表过陈辉的诗。后来到了炮火连天的敌后战场，他写了许多诗，晋察冀边区出版的诗刊《诗建设》、《诗战线》、《鼓》等经常发表陈辉的诗。《诗建设》还寄到延安、重庆等城市，寄给伟大领

袖毛主席。他还写了不少街头诗、诗传单，把诗写在乡村的墙上，或由他刻写腊纸油印出来，撒在战斗的阵地上、敌人的据点碉堡里。全国解放后，著名诗人肖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选入他的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诗人田间作序出版他的诗集《十月的歌》；作家魏巍主编的《晋察冀诗抄》，选入他十几首诗；涿州市宋俊杰编写并出版了《陈辉传记》；1987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语言学家上尾龙介，把他的诗集《十月的歌》译成日文，传到国外。陈辉的诗当年作为战斗的号角，曾响彻战火纷飞的拒马河畔，传遍神州大地，如今飘洋过海飞到日本。

几十年后，我访问陈辉战斗过的涞涿地区，不少老人仍然记得他是个能文能武的“神八路”，有些青年人会背诵他激人奋进的诗句；到他墓地凭吊的人，大都要默记刻在墓碑上的那首诗：

英雄非无泪，
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
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
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
羞杀狗汉奸。

陈辉的诗，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崇高的思想情操和英雄气概。

陈辉到延安参加革命后，他始终把诗和枪都看作革命的武器。一手拿枪，一手拿笔。1938年冬天，我们都在延安抗大学习，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晋察冀边区。翌年5月抗大二分校毕业后，陈辉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当记者，为报刊写了许多揭露日寇侵华暴行，鼓舞军民抗战的新闻、通讯、特写和诗歌。1940年5月，日寇“扫荡”完、唐两县，一次残杀我同胞800多人，野兽们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无知的婴儿，尚含着已死妈妈的乳头；有的婴儿从尸堆里爬出来哭叫着找妈妈……日寇残无人道的暴行，使陈辉无法抑制胸膛里剧烈燃烧的怒火，再也不满足用笔刺伤敌人，决心到前线上和敌人拼搏。经他再三请求，领导才批准他到敌我斗争残酷的平西涞涿联合县工作。

1942年秋天，我从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结束，组织上分配我到涞涿武工队工作。我兴致勃勃地跋涉几百华里，来到平西地委机关，地委组织部长却对我说：“地委要办张报纸，地委决定把你留下办报。武工队由陈辉去搞。”我一听就急了，要求不要改变我的工作分配。接着陈辉也从县里来到地委机关。我们从抗大分别后已有4年多

没有见面了，两个人见面后顾不上叙离情别谊，就争吵起来，我俩都争着去武工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革命队伍里有一种好风气好传统，越是艰难危险的地方，大家越是争着去。我俩天天为此争吵不休，谁也不肯让步，都找理由为自己辩护。我说：“你当过记者，又是诗人，应当去办报，去写诗。”

“诗人必须是战士，不当战士，哪能写出好诗！你这联大文学系怎么上的！”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决心用生命和鲜血实践自己的诺言。

陈辉去武工队后，我们曾见过几次面。一次在冬天见到他，他仍穿着那件又旧又破的大棉袄，腰里系着布带，头上扣着毡帽头，脚穿着露着脚指的布鞋，一张又黑又瘦的干脸，乍看就象当地的小羊倌。但是，他那睿智有神的眼睛，却闪烁着坚毅、明亮、自信的光芒，使我感到血与火的斗争，把他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钢铁战士。

陈辉武工队活动在涞涿平原，北临北平，南接保定，平汉路穿越其间，为我冀中和平西根据地的连接地带，是战略要地。敌人在铁路两边深挖封锁沟，据点碉堡林立，要把这里建设成为所谓“强化治安模范区”。陈辉武工队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窝，出没在敌人碉堡群里，穿行在封锁沟间，反抢粮、反抓丁、抓特务、除汉奸、攻据点、端炮楼，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消息，给敌占区人民带来了希望。仅半年时间，就在拒马河畔的涞涿平原上，创建了一块隐蔽的根据地。

这个地区的斗争极为残酷，到那里工作九死一生。陈辉去之前，接连有五任区委书记牺牲，陈辉甘愿做第六个。至今涞涿地区还流传着许多陈辉和武工队神奇的战斗

故事。

陈辉在县青教会工作的时候，常常深入敌占区走东家串西家，和群众结下“鱼水情”。一年秋后，陈辉肩负反抢粮的任务，他扮作割谷子的农民，来到地下党员孙玉昆家。孙大娘刚端白薯粥让他吃，一群鬼子闯进了院子，老人急中生智，忙把他摁倒在炕上，拉过被子给他盖上，又往地上撒碗粥，面对着胸口的刺刀说：“我儿子染上鼠疫啦！”鬼子一听吓得拔腿就走，陈辉就这样虎口脱险。

1943年冬天，区里决定召开上层人士参加的绅士会，会期临近，身在涿州城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还未通知到，陈辉决定自己去县城一趟，区长陈琳直摇头：“这太危险！”陈辉谢绝劝阻，穿上日本鬼子的军装，跨上战马，带上通讯员，巧妙地骗过城门口两排严密警戒的日伪军闯进城里，通知两位绅士如期到会。他在城里逗留中，还写下以“神八路”署名的《双塔诗》：

双塔昂首迎我来，
浮云漫漫映日开。
千年古色凝如铁，
一身诗意铸琼台。
涿郡胜状留人叹，
张侯豪志潜胸怀。
今朝仰拜晴烟面，
明日红旗荡尘埃。

次日，《双塔诗》贴上城门额头，伪县长王西宠听说这是“双手能打枪，双手能写梅花篆字的‘神八路’陈辉”进城写的，吓得目瞪口呆，狂呼：“我要活捉陈辉！”

就是这伪县长挂帅，指挥七百多日伪军出城，挥舞洋刀说：“我要会会神八路陈辉。”可是却被陈辉的武工队配合县大队打得溃不成军，把他吓得滚下马来，扔下十几

具尸体和几十辆大车，连跑丢的靴子都顾不上拣，狼狈逃回城里。

伪县长老羞成怒，决心活捉陈辉。武工队手枪班长张大个子牺牲了，尸体被敌人放在松林店伪警察署驻地文殊寺内。王西宠唱用死人捉活人的戏，他对特务队长孙元培许愿：“捉住陈辉，保你薪增五等官升三级。”扬言将张大个子曝尸三日，再碎尸喂狼狗。在文殊寺四周埋下伏兵，妄图诱武工队上钩。陈辉识破敌人的鬼计，以计还计，三日后突兵攻松林店火车站，调走守卫文殊寺的敌军，武工队乘虚夺回战友的尸体。

1944年夏天，陈辉带武工队跨越到平汉路东敌后之敌后开辟工作，10天中连续5天被敌包围。一天深夜，陈辉指挥突围后，发现丢了一个战士，他冒着枪林弹雨两次进村救出这个战士。陈辉胳膊挂花，鲜血染红了小褂，他忍痛主持召开会，研究为什么10天5次被围，经过分析找到了原因，原来敌人以千元大洋悬赏陈辉的人头。有个绰号叫“花姑娘”的特务，把武工队的行动报告了敌人。当天夜里，陈辉带三个战士，闯进她家，把这个正在和鬼子睡觉的败类处死于村外树林里。

陈辉在涞涿地区工作大约5年时间，依靠他和武工队的勇敢和机智，同无比强大凶恶的敌人作殊死的拼搏，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桩桩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

年轻的县委女通讯干事，爱陈辉的诗，也爱诗的作者，她冒着严寒和危险来到陈辉隐蔽的地堡里，深情地打量着他那干巴瘦的脸、破毡帽头、旧大袄，露着脚指的鞋，说：“你多象拒马河的放牛娃啊。”随即把她纤手缝制的袜子，精心制绣的书包，防寒的新棉袄，以及他渴望的书刊等等，捧到他面前。她

正在说服他把已穿了三年，补丁摺补丁，袖口飞着棉絮的旧棉袄脱下来，换上新棉袄；陈辉却把新棉袄往通讯员怀里一塞，通讯员死活不收，两个人正在你推我让之际，鬼子进了村，女通讯员事立即换了装，往自己脸上抹些锅黑，蹲在灶边去烧火做饭；陈辉钻进地堡。战友嘻笑着对陈辉说：“这姑娘对你不错！”陈辉沉默片刻说：“爱情是神圣的高尚的，与时代同步。但在抗战胜利前，我不会投入热恋，更不会结婚。”

陈辉机智勇敢地战斗的同时，永不疲倦地写诗。在山岭上，树荫下，路边石头上，伸不直腰的地堡里，昏暗的油灯下，他还要写诗。他不是为诗而诗，不是为营造自己的象牙之塔而写诗。他把诗当作投向敌人的刀枪，用诗歌去推进革命事业。不仅如此，他曾说：诗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诗。他是用生命和鲜血写诗。在《为祖国而歌》里写道：

祖国啊，
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不会滴一滴眼泪。
我高笑
因为啊！
我……
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
你的守卫者，
他的生命
给你留下了一首
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这首诗，就是陈辉的誓言。他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用年轻的生命为我们祖国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1944年冬天，抗战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敌人作灭亡前的垂死挣扎，空前的疯狂与凶残。涿

州敌人集中两千多兵力，围歼活跃在平汉路东的小小武工队。五区区长陈琳等12人英勇牺牲，六区区长崔光等受伤。日寇驻涿州司令官中佐，误把陈琳当作陈辉，惊喜之余，约请伪县长王西宠等官员庆贺这“辉煌胜利”。忽闻陈辉又回到路东，他气急败坏，便命令日军特务荒古川去斩陈辉的人头。荒古川把这个任务连同二百块大洋和一大包烟土交给特务高庆，高庆找到因吃不了“八路的苦”而借故躲在家中的陈辉部下周永旺。此人经不起威胁和利诱，便充当了追踪陈辉的警犬。

1945年2月8日，当东方天空染上鱼肚白的时候，陈辉和通讯员王厚祥住的乡村堡垒户王清成家的小院，已被一百多名日伪军团团包围。陈辉深夜来到这里，住在西屋，因他病了，上吐下泄，没能转移。王清成的妈妈为他做了碗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端到他面前，碗里的香油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陈辉刚刚端起热气腾腾的饭碗，无耻的叛徒领着特务魏庆林等破门而入，枪口对着陈辉：“你跑不了啦！”沉着机智的陈辉趁着放饭碗的霎那间，顺手抓住身边的手枪“叭”的一声，打中魏庆林的手腕，两个特务慌忙退出院子。这时敌人已把小院包围得水泄不通，墙头上，房顶上，爬满了张牙舞爪的豺狼。陈辉和小王坚守在屋里抵抗。敌人进不了屋，便把手榴弹从窗户扔进来，陈辉和小王都受了伤。他们决心冲出去，陈辉扔出两颗手榴弹，在烟雾的掩护下，分别转移到北屋的两个耳房里，继续战斗。敌人扒开房顶，把点着火的秫秸捆扔进屋里，房子烧着了，陈辉的棉衣、头发眉毛也烧着了。他的手枪仅有的七粒子弹打光了，在他们最后从门里往外冲的时候，被堵在门外的特务环

腰抱住。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敌人和他都倒在血泊里。

陈辉曾说“一个战士，把子弹打完了，就把血灌进枪膛里。”“枪断了，用刺刀、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用手、牙齿……敌人不能活捉我，当他们捉住我的时候，也正是我把生命最后交给土地的时候。”正象陈辉说的，他和敌人拼搏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我作为新闻记者，再一次来到涿涿。今天，这里换了人间，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城镇农村一派生机，人欢马叫，安居乐业的人民，正踏着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向着新的目标奋进。

此情此景，使人想起陈辉的诗句：

“英雄抛碧血，
化为红杜鹃。
也许吧，
我的歌声明天停止，
我的生命被敌人撕碎，
然而，我的血肉啊，
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
开在你的路上。”

是的，姹紫嫣红的花朵，正在涿涿平原上怒放。我国人民将一代一代踏着鲜血染红的开满花朵的道路，永不停息地前进。



喻传鉴先生的感召力

● 李冰封

喻传鉴先生是南开学校中学部主任，张伯苓校长的得力助手，为办好南开学校，他毕生呕心沥血，鞠躬



画像系冯元桢教授为其岳父喻传鉴先生所作。

冯元桢教授是美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

尽瘁。抗日战争前一年，鉴于华北局势危急，喻先生受张校长委托，到重庆沙坪坝筹办南渝中学（后改称重庆南开中学），从择地、购地、建校、直到开学，前后只花半年时间。抗战时期，他更用最主要精力，办好这所中学，使之成为一所在大后方独具特色的名牌中学。出身于这所中学的各种人才，后来大都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现中科院院士中，就有16人毕业于这所中学。有许多班级，在已知的毕业生中，有80%左右，都是各类专家、学者。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喻传鉴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教育家。

二

喻传鉴先生一生的事迹，集中表现了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他不计名位、不求私利，贡献了自己全部智慧和力量，都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要办好南开中学，要为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既有公心又有能力的各类人才。他说过：“我一生就是办教育事业，教育救国。”这就是他的理想根基所在。

喻先生生于1888年，浙江嵊县人，是天津南开学校第一班毕业生；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1919年毕业后，应张伯苓校长之召，回南开中学任教，翌年，任教务主任；1930年得到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中等教育，1932年毕业，获教育学硕士；毕业后，曾应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之邀，赴英、法、德各国考察中等教育，回国后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兼大学哲学教育系副教授，讲授中等教育课程。此后，直到他逝世的1966年，他的个人乃至全家的命运，就和南开学校的命运紧密相联，不可分离。他有多次升迁的机会，可以当局长、厅长，但均坚辞不就，一心一

意要办好南开中学。他的中学同班同学，有的当了清华大学、中法大学校长，有的担任了联合国的要职，但他毫不动心，一心一意要含辛茹苦地当他的“孩子王”。他认为这就是他救中国的最切实的行动。

他的杰出的教育实践源于他的信念。他在《从南开到蜀光》一文中写道：

“盖国人最大之病根有二：一曰‘不公’，二曰‘无能’。惟其‘不公’，是以多私。人人自私，事事自利，竟谋一己之利益，不顾大众之幸福。惟其‘无能’，是以无力。害莫能除，利莫能兴，有现代国家之资格，而无现代国民之能力。寢至国弱民贫，招致外侮。……”

他认为，南开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教育方针，培养人才。所以，他在抗战时期作的《论南开教育》一文中，写道：

“南开校训为‘公’与‘能’（按：南开校训是八个字：“日新月异，允公允能。”）公、能二字，为全校精神之所寄，先生之所施教，本此二字，学生之所努力，也本此二字。有‘公’才能无私，有‘能’才克成事。”

为了实现‘公、能’的目标，他明确提出，南开教育的训练方针，应着重五点：

“①注重体育；②提倡科学；③鼓励团体组织；④注意人格陶冶；⑤培养建国实力。”

南开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这五个方面。过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选择，喻传鉴先生的这些教育主张，显得何等深刻，何等正确呵！

喻先生言行一致。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的全部教育实践，都体现了“公”“能”二字。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平常没有节假日，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南开中学的工作，大者如校训的贯彻，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教师的选择、面试和聘用，教师的生活安排和工作积极性的调动，教学效果的实际考察，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管理和安排，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小者乃至日常大量有关课堂、宿舍、食堂、作业批改、个别学生思想等具体状况和问题，凡是他认为应该过问的，都毫不放松地具体落实。他真正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诚恳踏实，任劳任怨。他刚正不阿，从不迎合奉承权贵。当时，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弟想进入南开的，一律要经过考试，不开后门。成绩不合格者，只能作试读生。他清廉自守。重庆南开中学建校时，他经手的数十万元巨款，分毫不差；平常，公私极端分明，连为公家使用的信封、信纸和邮票，也和个人使用的截然分开，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更重要的，他还坚决反对用办学来赚钱，认为有些私立学校这样做，“实属荒诞”。南开也是私立学校，它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于

公，绝不从中牟利。

喻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目标，并把理想和目标付诸有效实践的杰出教育家。

写到这里，很自然地联想到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教育救国”问题。解放以后，喻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曾遭非议；有些人直到现在，对此还不理解，因而有必要就此追本溯源，加以澄清。清朝末年，由于国弱民贫，外侮频仍，民智不开，社会愚暗，一些仁人志士希望通过教育手段，振兴中华，使全民族民智开通，奋发图强。当时，先进的思想家严复就是教育救国论的突出代表。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会晤严复，讨论革命问题，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现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见《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550页）

这种说法，当然有偏颇之处，因为当时正处于戊戌维新失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在这个背景下，他却把教育看得比革命、维新更加重要，实际上冲淡了革命和维新的意义。但这种思潮有正确的一面，不可苛责，因为它主张用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素质”乃是强国富民的治本之计。一旦革命成功，先进阶级和阶层取得政权以后，要使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使社会摆脱贫困落后，逐步走向民主化，走向文明、富裕和强盛，教育便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手段了。不提高国民素质，不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类合格的人才，那么，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必将走向畸形，最终也要受阻。所以，应该肯定“教育救国论”的合理部分，根据时代潮流，加以完善，而不可盲目排斥，粗暴打击，终至阻滞教育事业，影响社会发展。对喻传鉴先生的“教育救国”论，也应作如是观。喻先生早年即同情革命。共产党员、抗日将军吉鸿昌烈士壮烈就义前留有遗嘱，“托孤”于他。他甘冒风险，毅然抚养吉将军遗孤，并资助遗孤的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送入南开读书，把她培养成才。解放前，他在学校中还保护过进步教师和学生，使他们免受反动派残害。对喻先生提倡教育救国的言行，是不应该加以过多责难，而应该加以提倡和继承的。

二是在喻传鉴先生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传统和优良作风，应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遗产，加以继承。喻先生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是他爱祖国爱民族的高尚的胸怀表现；他生当浊世，不为利禄动心，却全心全意致力于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他身上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和深入实际、了解群众、不尚清淡、杜绝浮夸的勤恳扎实的工作作风，都

应该是今天教育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学习的榜样。

当前，中国教育工作存在着不容轻视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地逐步加以解决，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像喻传鉴先生这样真正重视教育，不计个人名位利禄、甘为教育事业贡献全部心力的人太少了。如今，真正献身教育事业，以求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素质，使中国真正臻于富强者，当然还不乏其人，但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之中许多人还不能充分施展才能；而某一些只想把学校岗位作为“跃龙门”的跳板，作为进入“衙门”或“庙堂”的敲门砖者，却大有人在，他们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不惜哗众取宠、制造假象，以博取个人尊荣富贵，因之使有识之士见之莫不扼腕叹息。我想，这应该是若干地方教育事业正气断丧、充满油滑浮夸气息的根源所在。如果不努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使教育事业真正繁荣，可能都只会流于空谈。因此，在这时，我们之所以特别怀念、尊敬和钦佩像喻先生这样杰出的教育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

三

喻传鉴先生的办学实践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实有必要认真加以开掘、总结，使当今的中等学校，能参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择其可行者，学习、应用。根据我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加以研究和发扬：

（一）学校应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特色寓于八字校训之中：“日新月异，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说的是这个学校的教育内容要适应时代潮流，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允公允能，说的是这个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一培养能为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着想的、具有公心的人，而且这些人应该具备为社会服务的广博知识和实际能力。多少年来，他们这样做，且做出了成效，保存这个特色，保存这个校训，而且使其传之久远，又有什么不好呢？

（二）严格择师。

一所中学办得好不好，教师的教学水平、学识水平、工作作风、道德修养，是个关键因素。喻先生在选择教师时，是亲自考察了解、严格把关的。如果校长在办学中不能做到这一条，一切教育措施都将无法落实。但现在要做到这一条很不容易。首先要求校长真正懂行，且以身作则，不以权谋私，一切举措出自公心；二是要给校长以用人之权，不可层层关、卡、压。不从体制上解决这两个首要问题，严格择师无从谈起。

（三）关于体育。

喻先生在《论南开教育》的训练方针中，首先提到的是“注重体育”。这源于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思想，他曾写道：

“苓提倡运动之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见《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一卷·张伯苓篇》，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版，57页。）

喻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深感学生没有健全的体魄，“公”“能”二字的培养目标，就无法落实。去年，我见到一些重庆南开校友，他们在回忆往事时，都感谢当年学校注重体育，从而给他们以后从事事业创造了身体条件。那时，早上早操，下午三时半起，教室通通关门，所有学生都要到运动场上进行体育锻炼。锻炼有着目标和计划，坚持下去，在全体学生中，就形成了习惯。现在我们的中学，注重体育者当也不在少数，但据我所知，不少学校存在以下倾向：一是只培养体育尖子，力求打破某项运动纪录，使学校在这方面获得名声；而不注意全体学生的身体锻炼。二是体育教学的放任自流，学习重庆南开“注重体育”这一经验，无疑十分有益。



1948年，张伯苓校长（右）与喻传鉴先生
摄于重庆南开中学

(四) 关于德育。

我理解,重庆南开那时的德育,除总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的公心,勇于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贡献个人力量外,还侧重于:1,注重人格的陶冶,主张学生要勤勉,虚心,诚恳,刚直,将来进入社会,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2,注意培养社会公德意识;3,把德育的原则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学生注意仪容,注意礼貌,并在行动上做到诚恳端庄,勤劳务实;4,教师要为人师表,在德育方面作出表率。如今,重庆南开教学楼还竖立着一些班级校友赠送的大穿衣镜,镜旁刻着当年学校规定的40个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那镜箴,也是一种具体的德育教材(当然,也是美育教材)。以上经验,无疑都可供现在许多中学作参考。现在,有些学校,德育主要内容就是要学生背诵政治课教材,以备应付考试;在某些活动中,甚至客观上还鼓励学生讲大话,讲空话乃至讲假话;不注意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不注意社会公德教育;不注意维护为人尊严和人格价值的陶冶。且社会上的各种道德滑坡现象,正严重侵袭着学校。这些现象,似应引起全体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深思。

(五) 关于智育。

此问题涉及面过于宽广,本文不可能详述,这里只谈一点:重庆南开当时的智育,意在给学生扎实传授各科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培养适合每个学生个性的各自知识爱好,培养学生的各种实际能力,目的是育人而不是为了应试。而现在许多中学(乃至小学)对学生的智育,都围绕着“应试教育”,结果钻牛角尖,根据一些编得很差的所谓辅导资料,作分量很重的繁琐的各种练习,学生根本没有时间阅读各自喜爱的良好的课外读物,结果就培养了一批目光狭窄、思维浅陋、掌握知识支离破碎、虚荣心很重的“高分低能”的所谓“人才”,这样的学生,将来到社会上往往不能起大作用。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也难,因为它牵涉到中学和大学招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从现在起,如果不逐步地彻底解决,教育质量的根本提高,就没有希望。

(六) 关于美育。

重庆南开的美育是和德育、智育、体育等紧密结合,并扣紧日常生活,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趣味,高尚的生活情操。喻先生对校园的布局、设计、美化,都很有独到之处,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此外,要求教室和宿舍的整洁,学生宿舍要“考美”,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被子也要叠成整齐的方块,这要求

本身也是一种美育。

(七) 关于“鼓励团体组织”,也就是鼓励学生进行各种社团活动。

喻先生是把这一点,作为贯彻“公”“能”校训五点训练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我理解,这样做,可以:1,在实际锻炼中,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2,从小教育学生养成学术上的“兼蓄并包”的习惯,允许并鼓励学生自由思想。因为学生的思维能力只能在自由思想中得以提高和锻炼。在复杂的思维问题上,对学生可以也应该加以引导,但规定只能这样想而不能那样想,往往会使学生造成一种简单化、僵硬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往往不能从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维中,汲取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容易造成思维问题上的“逆反心理”。3,通过一些社团活动,如办墙报,组织各种艺术、体育活动等,除鼓励学生的各种正当爱好外,也培养一种“宽容”精神,还可以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

所有这些,我以为都可供我们现在参照学习。

(责任编辑 袁 章)



更正

- 本刊第11期,由于调版时有误,特作如下更正:
- 一、第3页目录中从左至右第4条,应为“覆灭在水浒英雄故地的一支侵华日军”。
 - 二、第79页左栏第9、10两行,应归入第1行“……提着皮”后。
 - 三、第86页上中栏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应归入左栏文头。
 - 四、第9页照片说明应为“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本刊编辑部

“高山神药”的女专家

彭洪福

●程迺欣



她今年七十七岁，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她曾以研究急性高山病的显著成绩，作为军事医科院的两名科技代表之一，参加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被誉为“高山病药物研究的权威”；她在院内曾多次受奖，并获国务院颁发的“研究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及特殊津贴；她的事迹被列入《当代名人大典》。

1988年她退居二线，1991年完全卸任；但她，还在干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她每天的日程，仍然按部就班，环环紧扣：5时起床，稍事锻炼后就收拾屋子，直到那宽敞的卧室兼书房和雅致的客厅里，从地板到窗帘，到每件家具和摆设，都一尘不染，恰似新的一般。然后，进厨房烧壶水灌满暖瓶，再做点简单的早餐吃，约7时左右，她就到办公楼了——那里，有她伏案几十年的办公桌，积累几十年的资料，迷恋几十年舍不得离开的实验室，她要在这里继续自己未了的研究，继续总结自己的成果……。她还要及时掌握国内外的最新科研信息，为此常骑自行车去图书馆翻阅资料，再把可以借出的搬一些回家来。晚上，她不大看电视节目，而喜欢翻翻报纸，然后就埋头在那些科研资料中，直到深夜。她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医药科学事业的发展，仍然积极参加有关的学术活动，不论是本专业的，或非本专业的，是被指定作专题报告，或只要求表表态，作即兴发言，她都还像对待正式工作任务那样认真，一丝不苟。

对她来说，工作才是生活，工作就是幸福。她不能设想没有工作的日子。

她，彭洪福，1943年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大）化学系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了。先在母校任教，

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研究所读硕士学位，兼任讲师。解放后，该院为军医大学，她成了那里的教师。后来，于1958年被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1960年，她正式穿上了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校级军官，这在当时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女性中，是少有的。

1964年，军事医科院遵照上级指令，组建了高原卫生研究室。具体任务是，保证高原上部队的身体健康和作战能力，以减少非战斗减员。彭洪福被调入该室，是同时被调入的八个科技人员中唯一具有高级职称的人。经过在高原现场——新疆喀拉昆仑山上——对于有关高原卫生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国际上已有的相关资料的搜集、分类，他们归纳出了14方面的问题，并一致认为这些是防治急性高山病首先要解决的课题。而解决的途径是，从药物防治与适应性锻炼两方面同时进行研究。彭洪福被指定为前一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

在新的任务面前，她一想到自己亲眼所见驻守高原的战士们忍受的那般痛苦，就眠食不安。急性高山反应的症状是头痛、恶心、气喘、心慌、浑身难受，严重的会出现肺水肿、脑水肿，以至死亡。其基本原因在于缺氧。

怎样解决缺氧问题？她查阅了大量国外资料，把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从改善营养入手进行研究、试验，并将证明确实有效的营养物质——拿到高原进行人体验证，逐步收到了一些效果——虽然距防治高山病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正在他们情绪高涨，工作顺利开展之时，“文革”风暴雨起。所有的科研工作都被迫停顿，实验室的人全走

空了。她，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靠边”了，倒也还有资格参加“革命”。但她还不认为这样的革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根本不想卷入其中。她仍在一心想着，那些急速进入高原而受急性高山反应折磨的战士，正等待着解救，一定要尽快使他们获得在恶劣自然条件下健康生存的权利。她不甘心让刚开始的研究就这样夭折！她决心独自干下去。

在她单枪匹马苦苦探索的过程中，偶然听到一个卫生员用中草药止血成功的事迹。她心中豁然开朗，立即把目光转向了源远流长的祖国传统医学。她相信，同那位卫生员相比，自己的文化水平要高得多了，凭着自己多年从事生化教学和科研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只要努力，也一定能用中草药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难题。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从头学起。

她怀着满腔热情，跑图书馆，搜集资料，又跑中医院，向名医请教……。由于在中医药典籍里没有发现直接记载高山病的篇章，她到各大医院邀集一些著名中医，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她从生物学观点向他们介绍高山病的特点，请他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应抓住体内环境不统一的关键，从气血方面入手研究。他们讲出了不少符合生物学观点的哲理，也使她颇受启发。她进一步请医生们各自开出一个或几个防治高山病的药方，由她来进行动物实验。经过对几十个药方一一实验对比，她发现以党参和黄芪为主的方剂，疗效最为显著。为了进一步进行研究，她又专门听了八个月的中医课，并边学边干，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又自拟了二十四个复方，进行再实验。最后，筛选出包括党参和黄芪在内的几味最有效的草药，制成了复方党参片。动物实验表明，这种药在抗缺氧方面，效果相当明显，彭洪福高兴极了！

也许由于她的成功，也许由于她的执著，她的身边重新聚集了一个又一个伙伴。1971年，复方党参片跨出了实验室。她的伙伴们把这种药带上高原，送到边防部队指战员手中，然后随他们登上卡车，跟踪观察疗效。大卡车颠簸在海拔5000公尺的山路上，战士们不仅没有一人有重度高山反应——肺水肿、脑水肿、昏迷以至死亡，就连轻度反应——头痛、恶心、呕吐等，也比平时减少了85%！

彭洪福又从提高人体缺氧耐力、能量代谢与调节、生理功能、免疫、凝血等各方面进行验证，所得数据都说明此药的功效。它被指战员称为“高山神药”，并于1978年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它使我国在以药物治疗急性高山反应的研究方面，走到了世界最前列。近年来，在中日登山运动员协作登山时，日方登山

队指名要的就是这种药。——到目前为止，国外还没有这样的有效预防药物。

可是，有谁知道，为了这药，彭洪福曾付了多少心血。没有助手时，她一个人要干过去至少十个人干的活儿：上街买药材，在煤气炉上煎药；到动物处领来小白鼠，自己喂养，自己灌药；还要自己操作小型动物减压舱，观察小白鼠在其中的反应；还要对多种中药一一进行抗缺氧耐力的筛选，并且要整理资料，分析数据……

不知有多少天，她从早晨一直干到深夜；不知有多少餐饭，她忘了吃！就这么孤孤单单地，她坚持干了将近三年，终于出了这项成果。而在此期间，她曾患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前后住了十次医院，体重减至37公斤，血色素降至正常值的一半……

当她重新有了助手，她就和他们同心协力，在复方党参片的基础上，又很快研制出四种配方、七个型号的防治高山病的中成药：黄芪茯苓复方1、2、3号，异叶青兰、四合花粉和参芪花粉等，临床验证有效率均为85%~95%。这几代药物，都属于“致适应剂”，除对高山低氧环境下的不适应症有较好作用外，对于临床的缺氧，如心、脑的缺血性缺氧、衰老缺氧、运动缺氧等，也都有明显疗效。从接受抗高山反应的研究任务以来，彭洪福所在的科研组现场定点一直设在新疆喀拉昆仑高原。这里，海拔高达5000公尺，有指战员常年居住；这里，高原气候最为典型，高山病的发生和表现也最为突出，防治的难度比包括西藏在内的任何其它地区都大。彭洪福认为，这里的问题如果解决了，全国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高山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由于彭洪福常年贫血，院所领导曾以纪律强制，不准她上高原。但她坚决要去——科研工作者哪能脱离现场！

从开始调查研究的1964年，到1994年，她先后十八次去新疆。每次都要呆两个月左右，有时还延长到四个月。

为了便于观察药物疗效，每次登山，都要赶在部队换防之时。她带领的科研小分队，要随队上山，用他们的药随时保证战士们的健康、安全，还要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与大家完全同行，她就在那海拔2000多公尺的团部，用电讯指挥小分队在4500~5000公尺高处六七个哨所的行动。

在团部，她也把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她给文化水平和学习要求都不相同的指战员们，开了各种不同的课，如普及高原卫生常识，培训卫生员；讲授医药科学基础，系统提高有实践经验的医师的理论水平；介绍



彭洪福和新疆军区的同志在一起（1988）

免疫学、分子生物学、抗衰老等方面的医学新进展……有的是座谈，有的则是连续上课的形式。每天上、下午讲两场她还觉不够，还希望在晚上加班，接着讲。只因学员们普遍叫累，她这加班的建议才未被采纳。其实，她自己何尝不累？可是，她总觉得别人比自己更辛苦、更劳累，因而要求自己尽心竭力多作贡献，否则就于心不安。

军营里，没有女宿舍，也没有招待所，团首长把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让她住，她只好接受；但在连队吃饭，拿罐头来给她额外地“加餐”、“补贴”，她则不接受了；她说：“我到这里，不是来享受，而是来工作的，不该有什么特殊。”

她无视艰苦，拼命工作，而且平易近人，从不以“上面来的专家”自居，处处服从当地的安排。这使部队各级领导也对她更加尊重，遇到有关问题需要解决，他们总说：“就按彭教授说的办吧！”1993年，当军事医科院的领导到新疆军区去，感谢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支持时，那里的首长诚挚地说：“应该受到感谢的是你们，是你们为我们解决了高原病这个大难题。”他们还特别提到了彭洪福。

彭洪福当然承认他们这些科研工作者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这份感戴之情而高兴，并为之骄傲。但她的内心深处，时时系念着的是那些淳朴可爱的、驻守高原的年轻战士。什么也不能割断她与战士们的联系。她喜欢他们，也尊敬他们。她每次去高原，都要用自己的小本子，一一记下他们托办的事，如买书、买药，去医院为

亲人问病之类。而每当记者登门采访时，她都要说：“别写我，还是写写那些战士吧！”

在她的心目中，那些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常年驻守高原、保卫边防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无名的英雄；至于她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所应该做的而已——工作就是本份嘛。

彭洪福对自己从来就很严格。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几十年里，她几乎每天都是早晨5点钟左右就来到实验室，先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同事们一上班，马上就能投入工作。经过她培养、训练的学生或助手，无论调到哪里工作，都受到欢迎，她曾多次被评为“三严（严格、严肃、严谨）”标兵。

如此严格惯了，她似乎已不会放松了。她也不觉得自己的年龄在不留情地增长。即使在1992年摔伤之后，脊背因错位而变形，而疼痛，人已难于像从前那样挺拔直立，她仍不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她说：“一个人，只要心理年龄不老，就永远不老！”

看到她，满头乌发，目光炯炯，谁也不会以为她已年近八旬。她的执着和事来心，使她抗拒了衰老；她自己研制的药物，也保护了她那健旺的生命力！

人既然不老，当然还要工作。这就是彭洪福。

过去，她一直是在接受任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工作，“抗”急性高山反应，心里装的是急速进入高原而受高山反应折磨的人民子弟兵；现在，她的思路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要进一步去“抗”更难解决的慢性高原病，“抗”心、脑血管系统病，“抗”人体的各种运动障碍，“抗”衰老……她心里装进了更多、更多的人群。

她还有很多构想。她还要做很多实验。她还要积累资料和数据。过去的研究是通向未来的基础，因此，她仍然充满信心。但是，毕竟是卸了任的退休人员，除了得到“特批”，可以自由使用实验室外，她再干什么都不是计划之内的，都需要自己缴付费用了。

对于这一点，她倒想得开，也做得到。她独身一人，生活向来俭朴。由于父母早亡，她年纪轻轻就挑起了抚养弟弟妹妹读书的重担，从未想过工资收入只供自己消费。她还由此养成了资助他人的习惯，见到别人有困难，总是很自然地解囊相助。现在，为了科研，她更不怕花钱了。

她想的是：“生命是最宝贵的。为什么不用有生之年对人类多做贡献呢？一个人到了临终时，希望再多活一分钟都是不可能的。那时再想干什么什么，或后悔没干什么什么，就都太晚啦！”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浅谈清代的“吏治”

● 贺海

官僚政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通过层层叠叠的各级官僚机构、不同层次的官员,利用各种手段,来实现其对黎民百姓的统治和管理,即当时的所谓“吏治”。

他们在长期的统治实践中,也深切体会到吏治的好坏,与社稷的安危密切相关,尤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官逼民反”,使某些封建统治者更有所警觉。因此,某些有作为的皇帝总是企图从整顿吏治着手,要求各级官吏“矢忠矢公,清廉勤政,各尽职守”,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当时的封建王朝也曾颁布过种种严刑峻法,规章制度,以求扬善惩恶,奖廉惩贪。清初的几位比较开明的皇帝顺治、康熙、乾隆,对吏治的整顿确下过比较大的功夫,然而,往往难以如愿。这是由封建制度本身决定的。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定鼎中原以后,鉴于明王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吏治的腐败,因此,建国初期顺治帝对整顿吏治就颇为用心。《清世祖实录》中记载了他引以为戒的话:“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羽,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用行政,颠倒混淆,以致寇起民离。”他认为应“深可为戒”。康熙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在他继位以后,就发现当时的大小官吏,“只知高官厚禄,养尊处优,而债于公事,苟且偷安。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他也曾总结了前朝的历史经验:“夫谗谄媚嫉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谄,迄无虚日,以臻酿祸既久,上延国家。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因此,他针对当时的积弊,严令“各该督抚提镇,通行所属官员,

严加申饬,令其痛改积习,力图振刷,恪勤职守。”他认为,“百姓安危均在吏治”。(以上所引均见《清圣祖实录》)

清初的几位“力图振刷”的皇帝,鉴于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官吏考核、升迁、奖惩、黜陟的条例,以期作为规范。

清代当时对京官的考绩称“京察”,对外官考绩称“大计”。对京官的考察的内容为:守(品德)、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等四项,称其为“四格”。根据考绩情况,分为称职、勤职、供职等。对外官考察内容,亦按“四格”进行。被考核的官员要依等一一写明“考语”,“分别去留”。其中“称职”“卓越”者,可加官晋升。无论京官或外官,又有“六法”的考察。即: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等。对“不谨”或“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或“才力不及”者,降级调用。“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为了考核和督率官吏,政府当时还制定了纷繁苛细的则例。如“钱粮(田赋)考成则例”;对官员必须按期赴任的“违限处分例”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执政初期曾一度停止对官吏的“京察”、“大计”的考察,改用“考满”。即“官员贪酷昭著,及不能称职者,在外督抚不时参劾,在内各衙门堂官及科道纠察。其京察、大计应行停止。内外官员俱著三年考满。考满之时,在外责成该督抚,在内责成各衙门堂官。矢公矢慎,开注事迹考语,移送部院,严加考察,分别去留,以昭劝惩。”也就是说,对于不能廉洁奉公的贪官酷吏责成部院大臣和督抚随时纠参,不要等三年才算总账。三年“考满”则以考核官员的才能和功绩为主。但到了康熙四年,又停止“考

满”，再次恢复“京察”、“大计”。

虽处封建时代的腐败社会，但对吏治的整顿，清初的几位皇帝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在《清实录》中有大量记载。如顺治年间，对贪污一万两白银的漕运总督吴惟华，对婪赃数万两白银的江南按察使卢慎言、山东巡抚耿焯等重大案件的处理，都相当严厉。当时并规定“赃至十两者，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应责者，不准折赎”。当时立法不可谓不严。但是，其结果，连康熙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封建官僚政治多年形成的痼疾、种种弊端，朝廷虽然锐意整顿吏治，但也难以杜绝。

乾隆时期，为了维持清朝的“鼎盛”局面，弘历也曾用很大精力来惩治贪污，他的主要措施是：一方面精心选拔人才，一方面认真考核官吏，以达到各级官员具备较高的素质。乾隆自称“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大臣的任命，都由自己裁决。他召见朝臣时，往往随手记下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日后用人的依据。

弘历对自己身边的文臣要求也相当严格。他发现翰林当中学问渊博、词采可观者固然不少，但不学无术、浅陋荒疏者也大有人在，因此，他认为非“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于是，他亲自命题，亲自阅卷，按其优劣分别升降。这种考试曾举行过多次。

乾隆年间，发生过不少贪污巨款案件，惩办了一批不法官员，其中不少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显赫高官。如当时的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内贪污赈灾款项，情节恶劣。这个大案牵连的官员有六十多人，被处死刑的二十二人。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

于易简等贪黷营私，向下属索白银八万两，从致使山东全省各州县发生严重亏空，乾隆赐金国泰自尽。尽管如此，到了乾隆末叶，官吏的贪贫情况也未能杜绝。深得弘历倚重和信任的宠臣和坤，恃权恣横，巧取豪夺，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

和坤当时居住的府第，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生时即在苏州建造陵墓，立享殿，可与皇陵相比，称作“和陵”。嘉庆即位后，被赐死，查抄其家产的清单，土地八千余顷，全部家私不下八亿两白银。这个数目相当于和坤当权二十年中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更加腐朽不堪。占据要位的率皆无能之辈。据有关文献记载，“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官吏们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尽情挥霍。某河道总督设宴一次，竟然三天三夜没有散席，骄奢淫佚，已经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后人评论当时的封建王朝“诛极愈重而贪风愈甚”，“明为惩贪，实则纵贪”。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他们多年的统治实践中，比较有作为的皇帝虽然深切感到吏治的好坏，良酷，清浊与否，同他们政权的巩固、天下的安危休戚相关，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加以整治。但是，各种腐败现象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彻底医治的，只能是形成愈演愈烈的痼疾，以至最后覆亡。

沉舟侧畔千帆过，封建社会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已成为过去。不过，吏治的清浊与否作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今看来仍值得深思。

中国档案报

邮发代号 1—221

《中国档案报》是国家档案局主办的机关报，是国内唯一的档案专业报。

本报每周一、四出版两期，对开四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本报集档案、文化、历史于一

身，它将帮助读者了解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了解有关国内外档案界的大事以及有关我国中央级和省级档案馆的档案珍藏；了解有关国内外档案学新知识、档案管理新技术以及开

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了解广大档案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所展现的精神风采。

本报全年 104 期，单价 0.50 元，半年订价 26 元，全年订价 52 元，邮发代号：1—221。

如错过订报时间也可将钱款直接汇至《中国档案报》社，联系人：李更法，电话（010）6163377—370；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西四分理处转宣内；帐号：417—249002—83；地址：北京西城区西斜街 35 号，邮编：100032。

李自成何以兵败山海关

刘少校

公元1644年，乃大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第三个年头，张献忠大西政权第二个年头，清朝顺治元年。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一副龙钟老态，病入膏肓；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远在巴蜀腹地，对明朝江山尚无眉睫之虞；闯王李自成亲率数十万大军分兵多路，渡黄河，入山西，向京城进发；与京畿重地近在咫尺的关外满人，更是雄心勃发，砺兵秣马，准备兵发关内，去夺取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了。清朝手握实权的人物是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政情军情日急一日，数十万大军决战京师在即。

3月15日，闯王大军进兵神速，兵不血刃拿下易守难攻的居庸关，京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顷刻化为乌有。19日，北京城破。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入主京城。改朝换代，江山姓李看似已成定局。李自成俱收明朝京畿义臣武将，明令大军秋毫无犯，京城政权易手格外平静。

然而，戍边于山海关的明朝重将吴三桂，却迟迟没有表态是否愿意归降李自成。吴三桂是员猛将，手中握有精兵4万余人。这不能不是李自的一块心病。李自成亲自修书致吴三桂，许以高官，赠以厚金，并命吴三桂之父吴襄也致信其子，一同劝吴三桂尽快投降。鉴于山海关外还有一支骁勇异常的清八旗军的存在，吴三桂何去何从实难选择。只好不露声色，静观局势变化，还李自成一个沉默。

作为明末抗清名将，吴三桂投李投清均属失节，李也是狼、清也是狼，倒向任何一方都是引狼入室的勾当。然而，吴三桂已别无选择；因为他不可能一个人重撑大明江山。同时，他也深知他的最终选择对李、对清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

吴三桂选择了李自成。他的这一选择大致基于如下的考虑：李自成已占据京城，声势浩大，明朝众多文官武将已归降之；吴三桂一家数十口困在京城，落入农民军手中；吴三桂多年抗清，且勇猛善战，清畏之如畏虎，若降清，自己的身家性命确是个未知数，鸟尽而弓藏，兔死而狗烹的结局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于是，吴三桂决定进京觐见李自成，并令使臣携降书先走一步，他随后启程。

此时，李自成攻占京城不过十数天，但就在这十多天里，大将刘宗敏铸了不可收拾的大错。刘宗敏乃闯王麾下第一员大将，追随闯王多年，且屡立战功。进京之后在狂喜之中，将一位颇具名声的女子占为己有，这位女子就是吴三桂新纳为妾不久的名妓陈圆圆。陈圆圆的被强占，导致了甲申年军情的重大突变。

4月5日，吴三桂在进京的途中走到今河北滦县时，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家人被押，老父身受酷刑，爱妾陈圆圆已被刘宗敏强占。吴三桂顿感奇耻大辱压身，竖目于马背之上，大骂李自成，怒言：“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降而复叛，调马重返山海关，并杀李自成的使臣祭旗，明誓要与闯王血战到底。这样，吴三桂决心降清了。而已准备起兵南下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却一无所知。

对吴三桂的出尔反尔，闯王李自成决定再起10万大军御驾亲征。4月13日，李自成携大将刘宗敏，并押明皇太子朱慈，及吴父吴襄于军中作人质，出京城朝阳门，向山海关进发。农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欲不战而迫吴三桂投降，或在吴三桂拒降时，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战而全歼吴三桂的4万人马。

农民军兵多将广，能征惯战，拿下山海关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李自成出兵山海关也有策略上不周当之处。农民军连日征战，行程数千里，攻下京城后仅停留了24天即再次起兵，10万讨吴之军已是疲惫之兵。由京城而山海关，行程又是数百里，一些将领恋着京城的花天酒地，战斗尚未打响，李自成已是隐患在身。李自成兵发山海关的另一个结果，是直接坚定并加速了吴三桂倒向清朝八旗军。这样，李与吴之间的对抗，发展转变成李与清朝之间的对抗。山海关之战已初露端倪。

几乎是在李自成出兵的同时，吴三桂派出的使臣向北而去，飞马联络八旗军的统帅多尔衮，请求出兵相助。吴三桂的信使无疑为多尔衮带来了天大的喜讯。多尔衮原本欲取道密云入关，绕开山海关，避开吴三桂，在京城附近与李自成决战。现在，吴三桂乞降，李自成又离开京城，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立即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来到了他的面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机会。多尔衮一方面随即下令大军改变行军路线，直指山海关。以最快的速度回信吴三桂，说：“闻流寇攻陷京师，明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故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慰。若率众来归，必居以故土，爵为藩王，国难可报，身家可保。”摄政王多尔衮真是精明得到家了。短短的一封信，既陈明利害，又让吴三桂免去后顾之忧。吴三桂接到此信后，即回信明确表态愿意降清。多尔衮与随军同行的大学士洪承畴，谋划调整了军事部署，并派人急返盛京（今沈阳）禀明幼主及孝庄文太后，而后率军杀奔山海关。

李自成出兵虽急，进兵却缓。

京城距山海关只有700里之途，农民军竟用去了8天时间，于4月21日方抵达山海关城下，战而必胜的战机就这样丢失于走走停停的路途之中了。李自成因为不知清、吴此时已结成联军，一直没有放弃招安吴三桂的幻想。而多尔衮却利用这几天，昼夜兼程，火速赶往山海关。而对此，李自成竟浑然不知。倘若李自成能够提前3至4天到达山海关，那么他完全可以在八旗军到达之前消灭吴三桂，拿下山海关。从后来李自成4月22日与清、吴联军交战而失败，26日即败回到京城，路途上仅用了4天来看，他进兵的时间是完全可以缩短至4到5天的。

但是，战机已失，已无可挽回了！

1644年4月21日，李自成挥大军到达山海关。山海关大战打响了。

在351年后的今天，鸟瞰山海关之战，其战场势态是分两步进行的。先是李自成与吴三桂苦战一天，农民军攻城不下；后是李自成于翌日在毫无心理准备下再战清、吴联军，以致措手不及。这是一场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残忍之战。李自成捕蝉不成，反被黄雀给了致命的一啄。李自成打了一场糊涂仗。

农民军列阵于山海关之前，与吴三桂相峙。李自成先将吴襄推于阵前，意在让吴氏父子相见于两军交战之前，以父子之情试吴三桂能否倒戈。此举被吴三桂断然拒绝。与此同时，李自成采取了另一项事关重大的军事部署。他派降将唐通（原居庸关守将）率两万人马绕过山海关，直取其后的另一关卡一片石，意在切断吴三桂的退路，防止他退向关外投奔清朝，以确保聚歼吴三桂全军。布置这一战略，李自

成依然没有想到满清八旗军。显然，这一军事部署的目的是远远不够的。

诚然，李自成是为山海关为吴三桂而来，便尽量地将战斗局限于李吴之间，谨防节外生枝。但是，来自清朝的节外生枝的可能性，他也应该心中有数。因为在两个月前，李自成于兵发京城的路上，曾收到过多尔衮的一封信。多尔衮在信中表示了欲与农民军联手共灭大明，同享大明江山的愿望。当时李自成灭明在即，江山差不多已握在了手里，所以对多尔衮的建议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李自成的这一态度无可非议。但是，多尔衮在信中所流露出的图谋中原的欲望，李自成不该忘于脑后。明摆着的一个事实是，在李自成灭掉明朝之后，就轮到李自成与满清争夺天下了。再有，一支数十万人马的八旗军就存在于山海关的后面，军事家李自成应当设防，这样唐通的任务就得扩大。他须身兼二任：一是防止吴三桂北逃；二是阻止多尔衮南下，应以第二项为重。因此，李自成至少应该做到两点：一是加强唐通的力量，二是让唐通应携带他致多尔衮的亲笔信，以备不时之需。这封信在形式上可作为李自成对多尔衮前信的回复。信中对多尔衮可采取优礼有加、虚实并用、兵不厌诈的计谋，号称统兵数十万，拿下山海关即退，并诚邀多尔衮共商国是。这样，极有可能迟滞多尔衮的参战速度。但是，李自成没有这样做。

再者，李自成派降将唐通守一片石用人不当。唐通乃明朝遗将，疑心有余，勇气与智谋不足。让其去独挡一面，足以说明李自成部署有误。

21日全天，李自成数度攻城，双方死伤众多。吴三桂挥兵死战，竟然有惊无险。农民军一时无法拿

下山海关。是夜，无激烈的战事。

但就在此夜中，多尔袞率八旗军到达了山海关背后的另一关卡一片石，并将唐通的两万人马大部歼灭。山海关已然在望。多尔袞按兵不动，静观战事变化，并派出了探马及联络吴三桂的使臣。多尔袞并未与吴三桂见过面，彼此之间仅仅往来过几封信，战场战事瞬息万变，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多尔袞是不会贸然前进的。此夜，灭顶之灾静静地降临在李自成的头上，农民军已在劫难逃。

22日早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了更加猛烈的攻城。山海关城池随时可能失守，吴三桂已很难再支撑下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派人马赶到多尔袞的大营，催促多尔袞火速进兵。多尔袞镇定异常，坚持按兵不动，不见到吴三桂绝不下令八旗军参战。吴三桂无奈，只好用大炮轰开一条血路，率500名亲兵来见多尔袞。吴三桂的到来令多尔袞欣喜若狂，一切疑虑随之烟消云散。但一种表示归降的仪式还是必须要举行的，那就是“剃发设誓”。满洲人认为，只有举行了这一仪式才是真心算数的。于是，汉人吴三桂剃去头发，正式投降了清朝。多尔袞随即下令吴三桂速速杀回城中，他引八旗军随后跟至。吴三桂走后，多尔袞令大军隐蔽向山海关城下运动。同时，多尔袞叮嘱手下的将领说，李自成身经百战，悍勇无匹，攻克京城只在挥手之间，我们千万不可轻敌。终归多尔袞没有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正面交过手，所以，他令吴三桂倾全部守城官兵杀出，先与农民军厮杀。这样的部署多尔袞可以达到三个目的：观察农民军的阵势，了解农民军的战斗力；通过与吴三桂的拼杀，消耗农民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减轻八旗军的负担；八旗军隐在暗处，养精蓄

锐，一旦参战具有突然性和更强的打击性。甲申年的多尔袞真是牢牢地把握住了每一次机遇。

吴三桂也深知此役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即不是替主子崇祯帝复仇；也不是一雪爱妾陈圆圆被强占之恨；而是只有赢得这一仗，他才能有生存的立锥之地。吴三桂拍马当先，率众杀入敌阵。人人血战，冲锋数十合，呼声震天。及午，战方酣。吴三桂的4万人马，在农民军的重围中浴血冲杀，毫无怯意。因为多尔袞的八旗军就隐在他们的身后。一时间，两支大军绞杀在一起，山海关战场尸陈遍野，血流成河。

也就是在这紧要的关头，“忽风发尘起，怒若奔雷。”漫天滚动尘沙，覆盖住了李、吴正在拼死的人马。正在观敌瞭阵的多尔袞果断地抓住了这一时机。他命武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袞之兄）率正白旗万余骑兵及豫郡王多铎（多尔袞之弟）率镶白旗万余骑兵一同杀入阵中。正、镶两白旗两万多骑兵的杀入，其来势如海啸排空，万马滚滚不可阻。等到风息尘落，农民军抖掉黄沙睁开眼，见到的竟是骑在马背之上、人人脑后拖着一条大辮子的清

兵，不禁惊呼道：满洲兵至矣！真是兵从天降。

仁马于高处的李自成，见清兵杀入阵中，竟驱马脱离战场。帅旗移位，随李自成而去。农民军雪上加霜，已无心恋战。大将刘宗敏身负箭伤，奋力杀出重围且战且退。多尔袞令吴三桂率两万人马追杀李自成。李自成败到河北永平，再次遣使劝吴三桂投降。吴三桂拒绝。李自成杀其父吴襄，而后退返京城。

农民军在京城怒杀吴三桂全家数十口。李自成急忙忙在故宫武英殿举行了登基仪式：“被冠冕，列仗受朝，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然后，农民军放火烧了京城内城九门城楼，并挟持陈圆圆离京西撤。李自成的农民军仅在京城扎驻了41天。

九门城楼之火尚未熄灭，摄政王多尔袞带兵已至。明朝文武百官只好再降清朝八旗军。山海关之战拉开了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并统治中原长达269年的序幕。

（责任编辑：萧徐）

捐弃前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陆复中

何故炎黄共仰崇？只缘两岸本同宗。
 阅墙事过泯恩怨，并蒂花开乃弟兄。
 毋效成诗行七步，须思辟径促三通。
 神州一统金瓯固，青史当书不朽功。

忆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

● 牛克伦

1940年秋天，日寇在“百团大战”受到重创之后，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报复扫荡。

为鼓舞军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的扫荡，克服敌人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给我根据地造成的严重灾难，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决定，根据地所有文工团一律分赴各地，向军民慰问演出，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成果，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必然失败的命运。那时我在抗大总校文工团任团长，我们的任务是赴山西武乡、辽县（后改左权县）、襄垣、黎城、沙河等地。当我们从河北邢西到山西辽县向野政报到时，罗瑞卿主任接待，有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决定暂交文工团代管。要他和文工团员一道深入群众，使之对我根据地军民有个直接的了解。但一定要向群众讲明他的情况，讲清我党、我国的政策，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我欣然接受任务。

这位日本士兵名石川淡月，又名石川恒一，中等身材，年纪约二十五六岁，虽然仍着日本军服（无军衔），但举止文雅，颇像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他反对侵华战争，是被强征入伍的，来到中国之后，亲历、目睹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威武不屈、团结抗敌的巨大力量。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弃暗投明。他的部队驻在山西潞城县城内，在十月的一个夜晚，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城外，几经辗转，找到了八路军，声明他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愿与八路军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野战政治部热情地接收了他，表扬了他的正义行动。

石川抵文工团后，全团召开欢迎大会。我向大家介绍石川的情况，传达了罗瑞卿主任对我们的要求，同志们热烈鼓掌欢迎，纷纷与他握手表达同志之情，石川很感动。

石川被安排在文工团团部，每日和我们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一道行动。尽管彼此语言不通，但大家在一起比划着说说笑笑，关系十分融洽，同老朋友一般。我

们演出时，他还主动要求登台表演，他表演的劈刀，唱日本歌曲，得到大家的热烈掌声。根据地的群众，开始见我们带着一位日本士兵，报以怀疑和警惕的眼光。经过工作之后，对他也都很友好，因此，石川在文工团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使他不愉快的事情。

当然，由于长期形成的不同习惯，石川在生活上也遇到过许多麻烦。比如吃饭吧，我们的伙食标准很低，又常吃他从未吃过的小米。但石川从不说苦，硬是挺过来。这也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石川和我们共同生活二十几天之后，野政调他去延安参加日本反战大同盟，大家依依不舍。为了永久记住我们相处的这段日子，我请他在我一个仅有的笔记本上题词留念。他略一考虑，在扉页的左边画了一座峻峭的山峰，山下站着一个充满乐观和信心的登山者，山的右方写了：“克服一致困难”五个字。我想其用意是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比做攀登峻峭的山峰，困难是很大的，要达到目的，必须中日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右边是他的题词，意思是：我们中日被压迫者获得幸福的关键，在于牢固地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因为我不懂日文，听不懂他的热情解说，但字和画的主要意思，还是理解的。我敬佩他的真知灼见，感谢他道出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事情已经过去55年，石川的身影还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为我题字的小笔记本，虽经战时无数次的轻装、转移，仍然被我珍贵地保藏着。遗憾的是当年我每天行军演出，向群众宣传慰问，工作十分紧张。尽管我和石川也曾朝夕相处，但因为语言不通，思想交流较少。和他分别后，就失去了联系，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作者牛克伦，原任国防大学外训系政委，正军级离休干部）

沪上明珠

——上海老城隍庙今昔

●叶世涛 瞿慕钧

上海老城隍庙 蜚声海内外

方圆 15 公顷的老城隍庙，地处上海老城厢，是上海的城中之城，又被认为是上海的“根”和“源”。

自古以来，城隍庙各地都有，但上海城隍庙不同。它汇殿宇、商市和园林于一城，浑然一体，积聚了城厢内历史、宗教、经贸、文化与人文景观的精华，成为上海最大的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之一。

对老城隍庙，上海人有一种乡情式的依恋，闲来无事，常到城隍庙逛逛，上茶楼喝壶茶，品尝色香味形俱佳的小点心，顺便带些中意的小商品回家，称之为“白相”城隍庙。外地人到上海也必来城隍庙，有“不到老城隍庙不算到过上海”的说法。来自五大洲的朋友包括一些外国政府首脑，都要把游览老城隍庙列入游程。一般说来，每天来老城隍庙观光的游客有数万人，节假日更是人流如潮。

一庙三城隍

上海建城晚，建城隍庙也晚。其他地方的城隍庙里通常是一庙一城隍，而上海却是一庙三城隍。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城隍庙一度成为难民收容所。为满足虔诚的香客进香要求，1940年由一批企业家、文艺界人士发起，在当时尚未沦陷的法租界连云路建新城隍庙，附设小型市场。战后老城隍庙恢复，新城隍庙不复存在。“文革”期间，老城隍庙又遭破坏。改革

开放后，重修大殿，屋面上塑立《三国演义》中“三战吕布”、“战长沙”等戏文泥塑，连大门两侧“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的劝人为善的楹联，也悉按原样修复。1994年上海市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决定老城隍庙仍归道教协会管理。赵朴初书写的“城隍庙”匾额悬挂在庙门上方。1995年农历猪年到来之际，阔别近三十年的城隍神秦裕伯和懿德夫人先期返庙。春节期间，有十一万人来庙进香、瞻礼，盛况空前。

园秀市雅

明嘉靖年间上海筑造城墙后，有效抵御倭寇骚扰，社会安定，商贸发达，城内富豪官绅造园之风甚盛，豫园便是其中之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曾任四川布政司的上海人潘允端，在城隍庙西北菜地上聚石蓄池，构亭艺竹，建造花园以愉悦老亲，取各豫园。此园万历五年落成，历时二十余载。豫园初建时占地七十多亩，布局紧凑，以曲折幽深见长，为江南名园之一。现今的大假山、“玉玲珑”、荷花池等仍是建园时的原物。大假山是潘允端邀请当时造园名家张南阳所建。假山高四丈，重峦叠嶂，气势磅礴，山路盘旋曲折，藏而不露，登高远眺，浦江风帆尽收眼底，使人尘障为之一空。这座假山全用浙江武康黄石垒成，实为江南罕见。“玉玲珑”是品位最高的镇园之宝，相传为隋唐旧物。宋徽宗时，北方异族入侵，徽宗不顾国家人民安危，一味追求享受，向全国搜求奇石异石，“玉玲珑”被编入“花石纲”作为进贡之物，后因途中民夫流散，才得以保存下来，几经转

手到明代为潘氏所得，运到豫园。“玉玲珑”是一整块高大的太湖石，遍体孔洞，犹如雕刻而成，兼备皱、瘦、透、漏诸长，丽质天生，造型玲珑剔透，故称“玉玲珑”。从石顶倒一盆水，孔孔流出；以石底点一柱香，孔孔腾烟，不愧为石中甲品。主人在石旁建造一座玉华堂，专为赏玩此石，可见“玉玲珑”之珍贵。

潘允端建此园耗费巨资，又加平时挥霍无度，家业日渐衰落。至明末清初，园景荒芜。清乾隆年间，上海士绅集资从潘氏后裔手中购得豫园，改名西园，由城隍庙道士管理，作为城隍庙的庙园，园中大半精舍作为地方商人聚会、祭祀和议事交易的场所。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上海钱业士绅又在城隍庙东隅建东园，至乾隆年间，西园、东园被二十多个商业公所所用。西园萃秀堂就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豆米业公所所址。萃秀堂后墙至今仍保留砌有《饼豆业建神尺堂碑》等两块石碑，记载当时商业贸易盛况。东园为钱业公所所在地。在一块记载当年承祭的钱庄名单石碑上，记载着乾隆四十一年承祭钱庄仅25户，到嘉庆二年即二十多年之后，承祭钱庄就发展到124户，可见当年金融业之盛。现今的湖心亭，原来也是豫园的一部分。这个亭原是乾隆四十九年，由四位经营青蓝布的商人所建，成为青蓝布业公所。鸦片战争后，洋布涌入市场，土布销路每况愈下。光绪年间公所将湖心亭转让，开了茶楼。

清咸丰、同治年间，城隍庙香火鼎盛，节会性庙市加快向固定市场演变，商贾沿荒废园径开店设铺，形成商业牌坊十余条，设肆鬻物者百余家。光绪年间，上海知县发文禁止在庙内隙地设店，以防毁坏园草，然为时已晚。

豫园历史上又是文人雅士聚会之处。明清以来，王百谷、董其昌、任伯年、吴昌硕等书画名家常在园内吟诗作画，并设立豫园书画善会等团体。园内每年都要办梅花会、兰花会、菊花会等雅集。由社会名流评点花魁。由于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经常出入豫园以文会友，加上当地规定园内外只准开设文化店铺，一批经营筵席、古玩、珠宝玉器、古旧书籍、刻字绘画的商店林立，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文化市场。同园内荷花池、九曲桥、湖心亭等景点交相辉映。使城隍庙的庙市显现出一股高雅秀静的文化气氛，更使广大游人流连忘返。

清咸丰三年（1853年），刘丽川、陈阿林领导小刀会起义，建立大明政权。豫园点春堂是小刀会指挥中心之一。点春堂原是福建汀洲等三府花糖洋货商人建造的行会公所，因小刀会起义军的部分主力大多是福建籍水手，陈阿林就是福建人，因此他就将他负责的城北指挥部设在点春堂内，在这里指挥武装斗争17个月。

1949年全国解放后，点春堂辟为小刀会起义史料陈列室，展出当年小刀会战士使用的刀剑武器、铸造的“日月钱”和颁发的文稿等。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1961年参观豫园时题诗曰：“小刀会址忆陈刘，一片红巾起海隅。日月金钱昭日月，风流人物领风流。玲珑玉垒千钧重，曲折楼台万姓游。坐使湖山增彩色，豫园有史足千秋。”谢觉哉也曾在点春堂题诗一首：“争说英雄刘丽川，红旗崛起气无前，点春堂里观刀剑，犹自寒光灿灿天。”

晚清时，豫园曾多次被作为清军和殖民军队的军营，园林景色如洗，损毁严重，再加抗日战争中的破坏，到上海解放时亭台残破，假山倾塌，池水干涸。由同业公会使用的景区也颓败不堪，豫园之名已不复存在。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上海市政府1956年成立专门班子，聘请熟悉上海历史的建筑专家担任顾问，开展了全面修复工程，并重建各种景观三十多处。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豫园才得以重新展现“奇秀甲于东南”的风姿。1961年豫园正式对外开放，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城隍庙地区也再次呈现“庙、园、市”于一城的可贵格局。解放时侨居海外的老上海回来



五十年代老城隍庙大殿和庙前的明洪武碑亭

游览时极为惊讶：老城隍庙竟还保留着如此美好的明代园林。

特色市场和商品“大王”

具有庙市风光、园林情调的老城隍庙市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建筑上的民族风格，商品经营上的诸多特色的独特风格。透过这些特色，可以追溯到昔日庙市和豫园繁华兴隆的轨迹。

由于城隍庙历史上是供奉城隍及各种神祇的地方，来城隍庙进香的香客多，因此经营香烛、锡箔、经书等宗教物品和雕塑神像的神龛的店铺达40余家。经营梳洗用品、化妆品、装饰品、礼品等商店也木少。尤其是赛珍饰品业成了庙市的一大特色，各种进口的人造珍宝价格便宜又几可乱真，深受一般市民和农村妇女喜爱。豫园内还汇聚上海不少同业公会，如为商界人士公务的茶楼、酒楼、点心店多达百余家。最早的茶楼是湖心亭，至清末有春风得意楼、群玉楼、四美轩、乐圃园等多家。商人们边喝茶，边洽谈贸易，茶馆成了交易场所。庙市众多的珠宝玉器、古玩店中规模最大的是鑫古斋，经营宝石、翡翠、珍珠、钻石、象牙以及清代官员使用过的朝珠、玉串、翎管等古董，在国内以至海外游客中都颇有盛名。画铺、书坊、笔墨店繁集也是庙市另一特色。有些店家还以展览形式，销售名家书画、笺扇、楹联、折扇。镌刻名章铃记，销售金石玉章、笔筒、水盂等文房四宝的商店也不少。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代，上海打麻雀牌风盛行，庙内雀牌店应运而生，多达三十多家，竞争激烈，不只做门市生意，还争相外销美国、东南亚、日本等地。四十年代风行以塑料为原料的透明器皿，这一带又成为上海生产、批发塑料纽扣、木梳、发夹的“大本营”。

建国前，老城隍庙市场的店铺有五百多家。在长期的竞争环境中，他们在经营和服务上形成独有的特色：

一是小而全，以“小”为主。店小商品小，但门类花色多。无论是纽扣、袜子、花边、线带、发夹，还是玩具、刀剪、瓶塞、手杖等，几乎在城隍庙市场都可以买得到。

二是经营灵活，服务周到。不少店铺的生意既有门市零售，也做大宗批发，甚至还做出口外销的生意。在经营手段上也灵活多样，如以卖带修、以卖带收（购）、以旧换新、包退包换、拆整卖零、送货上门、刀剪开刃、瓶塞改小、筷子配对、画配镜框、雀牌配只之类大商店



豫园商城丽水路牌楼

一般办不到的服务项目，这里小店都可以办到，因此深受顾客欢迎。

三是自产自销，亦工亦商。老城隍庙店铺之所以拥有特色产品，就因为前店后场，各店都拥有能工巧匠，现做现卖，要啥做啥。如传统小吃，小笼馒头、猪油汤糰、鸡鸭血汤、酒酿圆子、面筋百叶等都是现烧现卖，吸引游人驻足。

四是吃穿用玩结合。虽称不上包罗三百六十行，但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二十世纪初，上海开设综合性的游乐场“大世界”，老城隍庙随即开设“小世界”。庙内茶馆几乎家家都附设有评书场，有的还有测力机等游艺设施。至于卖拳的、唱“小热昏”的（滑稽演唱）、唱本滩戏（沪剧），看“西洋镜”的更吸引无数游客。庙旁百翎路一带还集中开设出售金鱼、飞禽、蟋蟀以及龟、蛇、蝎子、壁虎等动物的店铺，俨若小型动物园。

建国后，社会风气发生变化，迷信活动减少，从事香烛锡箔、医卜星相的店摊陆续改行。赌博现象也被禁止，而日用小商品则大有发展。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商业主管部门在城隍庙市场设立小商品批发部，专门从事小商品采购批发业务。“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又拨出黄金、钢铁、木

材和主副食品等紧张物资,尽可能保持城隍庙小商品、小点心的供应,后来又建立豫园商场,开设了五十多家专业商店。老城隍庙市场经营特色开始有所恢复。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流通机制逐步放开,商场领导在“小”字上做文章,在“特”字上下功夫,把小商品、小点心作为重点经营系列之一,并根据小商品市场供求变化快的特点,努力捕捉市场信息,不断更新换代。庙市经营小商品、小点心的店铺,有的坚持传统,以质量优异取胜;有的推陈出新,以品种新奇驰名;有的博采众长,结合自身特点,开拓创新,形成新的特色,涌现了类似“钮扣大王”、“花边大王”、“瓶塞大王”、“刀剪大王”、“五香豆大王”等一批“商品总汇”,在市场独树一帜。

如光绪年间由金陵湖熟人戴玉屏开设的铁画轩紫砂陶瓷店,百余年来,店主几易其人,而经营宜兴紫砂陶器、景德镇瓷器、龙泉青瓷的特色一直保持至今;特别是紫砂茶具,色泽古朴,盛茶聚香含椒,用久器身紫润清雅,为人青睐。有些茶具与造型、雕刻相得益彰,且不少出自名家之手,是城隍庙百年老店中的佼佼者。

与杭州张小泉、北京王麻子齐名的王大隆刀剪店也是一家百年老店。店主王志伟精通刀剪技术,每把刀剪均经精打细磨后上柜销售。尤其是以他名字定名的“伟剪”,刃锋锐利,吃硬耐剪,一次可剪布料二十层而名噪沪上。

“王大隆刀剪店”还以品种齐全著称。从古代的绣花剪到现代的电功剪,从缝纫用小剪、家用剪到服装剪、羊毛剪、剪金银用的银剪,扞脚刀、瓜子钳、眉毛夹、鼻毛剪、食品雕刻刀等不下数百种。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商店参展的这些特色刀剪,被争购一空。

老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是家喻户晓的风味消闲食品,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尝过茴香豆,连说五个“香”字而得名。

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叫郭瀛洲的商贩,对这种大众化的小食品进行了改良,起名老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在色装上印上“兴隆郭记”商标,上市后声誉鹊起。

目前,老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由专业工厂生产,日销量五千多公斤,除内销外还出口港澳、日本、东南亚等地。在历年食品评比中,五香豆获“金牛奖”等十多种荣誉称号。

梨膏糖也是老城隍庙与五香豆齐名的土特产。据传梨膏糖出现在唐朝。宰相魏征之母患咳嗽,怕吃苦药。魏征深通医理,将生梨、冰糖与止咳药料同煮,制成糖块,治愈了老母的痼疾,以后流传到民间,就有了

梨膏糖。城隍庙梨膏糖有独特的生产经营方式,技师当众熬糖,投入每味药料时,边做边唱:“一色冰屑吊梨膏,二用药味重香料,山(三)楂麦芽能消食,使(四)君子能防童子痨。”有时还夹杂一些说笑打诨,唱笑之间,看客争相购买。上海称“小热昏卖梨膏糖”,据说这与上海滑稽戏的起源也有关系。

在老城隍庙众多的饭店、酒楼中,名气最大的是“老饭店”。“老饭店”原是光绪元年开设的一家小饭铺。由于店主烹饪技术精湛,擅长用烧、炒、煨、炸、溜、蒸、糟等各种手艺。顾客中“回头客”很多,老城隍庙的各种小点心,也非常之多,而且做工精细,花样绝伦。一些做成飞禽走兽、花卉瓜果模样的小点心,顾客不忍卒尝,当成工艺品带回家去把玩欣赏。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上海访问时,就在老城隍庙市场品尝了由“绿波廊”食品店制作的三焦眉毛酥、枣泥酥等特色小点心,赞不绝口。继英国女王之后,加拿大总督、瑞典首相等也先后来过老城隍庙观光。



老城隍庙的九曲桥、湖心亭

再铸辉煌

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八十年代后期,老城隍庙商业区发展进入快车道。百年老城焕发蓬勃生机。

1987年12月,豫园商场改制为上海商业系统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国家支持和自我积累分期开展豫园景点修复工程,除重建环龙桥、玉玲珑照壁,修缮有“江南园林第一台”美誉的古戏台之外,还增添一批秀美幽谧、古趣盎然的新景点。

1991年3月,上海市政府又批准豫园商业旅游区一期改建扩建工程为市府重点建设工程项目。计划保持豫园老街、老庙、老字号特色的基础上,新建和整修一批新景点。

“十年金梦今朝圆,豫园商城换新颜。”1994年9月,建国45周年前夕,第一期工程竣工。拔地而起的天裕、华宝、和丰等六幢大型仿古楼宇同时开张营业,连同先前完工的豫园商厦、湖滨美食楼等十多个商业建筑在内,商城经营面积从原来的1.8万平方米扩大到7.5万平方米。

在改建扩建后的豫园商城,错落有致的幢幢商业楼格调一致,又各具特色。有的粉墙黛瓦,秀美隽雅;有的飞檐翘角,工笔浓彩,组成上海最大的仿明清古建筑群,而且继承中有所创新。

广大顾客购物之余,可以纵情浏览林林总总的古建筑群景色。享受现代化的商业服务设施,可说是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实用的完美结合。

老城隍庙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富矿”。在塑造自身形象过程中,改建后的商城更是到处洋溢着雅俗共赏的文化氛围。许多大商店和老字号店堂都邀请名家题写楼名匾额更增加了古店光辉。其中就有当代历史学家周谷成题写的“华宝楼”,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题写的“凝晖阁”,著名书画家朱屺瞻、钱君匋、黄若舟、侯殿华分别题写的“中老年用品总汇”、“悦宾楼”、“天裕楼”、“景容楼”等等,书法各有千秋,蔚为大观,令顾客赏心悦目,受到了高层次的文化熏陶。

一期工程完成后,豫园商业旅游区成为海内外客商争相投资的热土。市、区政府在1994年底又着手组织第二期工程建设。

二期工程的要求是,充分发挥老城隍庙地区独特优势,向四周扩散,预计到公元2000年前后将扩大三倍,达到49公顷。豫园商业旅游区将兴建世界贸易中

心、世界名品城、小商品批发中心、上海民俗村、明星娱乐城、美食城以及旅游宾馆等建筑和停车库、电话局等配套服务设施,进一步发挥老城隍庙游、购、食、住、娱乐、博览的多种功能。老城隍庙东侧计划建造的“上海民俗村”,占地2公顷。村内充分挖掘这一带历史资源,包括建于明崇祯年间、具有中国庙宇风格的上海最老的天主教堂和一大批上海旧式石库门房屋等,采用建筑、陈设、器物、塑像、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集中展示上海民间风尚习俗精华和重要历史事件的一些主要场景,形成浓郁海派特色的旅游新景点,更好满足华侨、华裔思乡念祖和外国旅游者了解昔日上海人生活的向往。

“上海日新月异,精华还在这里”。豫园旅游商城总经理程秉海满怀信心地表示,商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上海唯一、全国无双的的旅游购物中心,使“沪上明珠”放射更加夺目光彩,以最新的感觉、最好的享受奉献给四海嘉宾。

(责任编辑 方 俊)



豫园商城湖心亭夜景

关于姚克平反经过

拜读贵刊1995年8期(总41期)《〈清宫秘史〉作者姚克不平凡的一生》，心情非常激动。

我名叫姚眉，是姚克六弟的大女儿，也就是文中所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为姚克平反的那位苏州亲友。我原在苏州市医药管理局任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但仍担任九三学社苏州市委委员及市人民代表。

我是在1979年春节时酝酿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给我四伯伯姚克作出正确评价的。当我与父亲(姚克六弟姚志曾)及姑母(姚克大妹姚志民，已于1993年过世)商议时，他们都认为难以得到平反，不赞同我写那封信。但是我考虑再三，终于在1979年4月瞒着他们给《红旗》杂志社写了信，因为是《红旗》杂志1967年首先刊登了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信发出两个月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竟给江苏省委信访办及苏州中共市委来函，要我把因姚克问题受到株连的亲友的情况写成材料，并要我提供了了解姚克三十年代至解放前情况的人员名单及地址。后来我才知道是胡耀邦同志对我写的这封信有一个批示。大意是：这不仅是作出正确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党统战政策。即使人在国外，也要给予平反。根据这一批示，中央组织部宣传干部局成立了调查小组，根据我所提供的人员进行了函调，其中就有夏衍、舒适、黄佐临及白杨等等……以后，《解放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等陆续有为姚克正名的文章发表，

姚克所编的《清宫怨》话剧剧本也得以再版。这一阶段发表的文章，就包括王俊义等同志所写的《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事实是：我写信要求为姚克平反在先，中央作调查和有正名文章陆续发表在后。这与贵刊文章所述我见了正名文章才写信去要求平反恰恰相反。这个时间上的先后问题，王俊义教授是非常清楚的，1979年底王俊义教授来苏州与我父女见面时还谈到，在他写文章时，中央组织部曾提供了我所写的材料，从而才知道我们父女的姓名及住址。

1980年3月中央组织部对姚克作出平反决定后，我立即给姚克去信，但久久未收到回信，后来托我国驻美大使馆在美寻找，一位热心的参赞在旧金山找到了姚克的大女儿姚兰，并要来了通信地址，可是我和父亲按此地址分别去信却不得回音。从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我们父女总是在春节及中秋节写信或寄贺卡给姚兰妹请她转交姚克，但始终收不到一封回信，也不见信退回来。1991年9月我父亲仍不死心，再一次发去明信片。这次出乎意料地竟收到了姚克的来信，并知他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六弟的信。由于我父亲在明信片中讲到曾给他写过几十封信未见回音的情况，姚克非常生气，要子女去邮局查找，竟也找到了一封信。后来姚克来信讲，他准备去美国邮局投诉，为何把如此重要的信件遗失了。由于信的遗失使他晚了十一年才知道自己得到恢复名誉的光荣。十年间书信不通之因，至今仍是个谜。但是我们已不想去解开这个谜了，因为四伯伯姚克已在逝世前知道了祖国政府和人民对他的公平评价，这对我们来讲，已无遗憾，四伯伯也可以安息了。

苏州竹辉路 姚眉

编者的坦诚定能换来读者的真心

——读者来信摘录

言之切情之真，令人感动

陕西省安康市广播电视局李远金：《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的《告读者》，说的都是实情实话，读来亲切。近年以来纸张涨价，办报刊的同志犯愁，读者何尝不作难呢！不订报刊不行，订费多了又承受不起。贵刊编者为了调价一事，向读者敞开心扉，介绍了国际国内纸张涨价情况，道出了5月以来亏损经营的实情，表达了调降后的打算……言之切，情之真，令人感动。

笔者就是在感动之余再办订阅手续的。

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严

湖北省天门市天门日报李树庭：我是贵刊的老订户，一名忠诚的读者，我自费订阅贵刊已三年，1996年又已续订，并在我周围为贵刊发展了三个新订户。《炎黄春秋》是我最喜爱的刊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我要批评你们：图片印刷质量太差，勘校不力错别字还是太多。

我为他代付订费

广东省顺德市勒流镇伍焯煊：

我是珠江三角洲农村的一个年已64岁的老人，是贵刊的老读者。看了贵刊1995年10期《相濡以沫共度难关》一文深有所感。纸张价格猛涨，报刊界叫苦连天，我们读书报的人也应充分体谅。文中提到“一个偏僻县的读者，因为连半年的订费都无力一次总付，只得分月给编辑部寄钱买杂志”。我深感同情。因为贵刊不是一般性刊物，经考虑，我愿意抽出自己小量的生活费，为他订购1996年全年的杂志，现将48元汇上，请代为传达，不要他说感谢的话，只是一点小意思。要感谢编辑为我们办了这样一份好杂志。

《炎黄春秋》1995年(1—12期)总目录

□ 特稿 □

尊重史实是本刊办刊原则	编辑部	1·4
力挽狂澜：周恩来在一九六六	南山	1·5
小平同志家乡父老情	母小平	1·12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11·4

□ 专稿 □

平型关大战决策过程写真	马仲廉	3·4
逐鹿中原——邓小平政委在豫南	罗高松	3·12
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周谷城	4·4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程思远	4·5
六十年后李昌首次详谈“一二·九”与民先队	徐庆全	12·4
要科学对待民国这段历史	周谷城	10·4

□ 通讯 □

抗日老战士抚今追昔话统一	李耐因	8·4
--------------	-----	-----

□ 春秋笔 □

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	孙琴安	1·14
祸起萧墙 冤惊海内——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黄瑶	1·21
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何思源	晓鸥	1·31
日本公使重光葵被刺杀的背后	金陵客	2·11
董必武指挥我们占领《商务日报》	杨培新	2·14
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	李维民	3·17
捍卫真理 矢志不渝——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	黄瑶	3·21
“为人民服务”光照千秋——追忆毛主席得知张思德牺牲后	曾加顺	3·28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金牛	4·6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奎松	4·28
日寇杀光北瞳村纪实	解力夫	4·62
长沙大火及其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	辛平	5·48
天下第一“血”——芷江修建抗战胜利受降城纪实	杨顺东 姚奇	5·53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	陆茂清	5·57
以戏攻心	官浩民	5·59
历史巨变：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	徐庆全	6·4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马仲廉	6·16

李宗仁率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解力夫	7·54
中国远征军师长戴安澜魂系缅甸落日——我参加了盟国对日本的受降仪式	屈德寿	7·59
从“京九”到京九：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徐庆全、才铁军、刘江涛	7·66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郝玉峰	8·11
一九四〇年宋子文何以赴美求援	连若雪	8·20
屠城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十年记	殷学成	8·27
中华文化宝库的惨痛浩劫——记被日本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韩真	8·30
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王俊彦	8·34
叶剑英与马万祺谊深情笃	范硕	8·36
宋庆龄与三个美国友人的交往	唐宝林	9·22
高树勋率部起义亲历记	吴景略	9·26
北平沦陷前后的一段难忘经历	于光远	9·29
李汝秦三进虞城的传奇故事	杨步胜	9·37
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	张广华	9·46
用中国人的脊梁保卫大武汉	陈道阔	10·6
周恩来与国民党杀手张冲	仲向平	10·12
共和国史册上的大匪患	屈德寿	10·50
覆灭在水浒英雄故地的一支侵华日军	吴济夫	10·63
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	欧初	11·56
张克侠将军抗战日记选抄	张权	11·49
“《新生》事件”与杜重远遇害	阎小波	11·52
港岛聚英——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在香港的抗日活动	马仲廉	11·
“六十一人案”平反前后	戴煌	12·17
长征路上的“孙胡子”	赵勇田 全玉林	12·23

□ 求实篇 □

以民谣为鉴	尤淇	1·44
《甲申三百年祭》疑义	陈英茨	1·46
说真话难 还是应该说真话	杜导正	2·38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章耀兵	3·31
敢讲真话的戏曲评论家景孤血	朱复	3·34
刘仁静的是非功过怎么说没有定论	洪焰	3·38
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李锐	4·66

瞿秋白狱中遗言：日后自有定论	温济泽	5·4
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王强华	5·11
“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南东风	6·23
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	李克林	6·28
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	刘子健	6·33
张江明	奎松	7·4
建国前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	陈英茨	9·4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葬送的悲壮故事	王俊义	9·10
为争取湖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郭影秋	林里	9·16
“文革”后期被扭曲了的报人办报	田方	10·69
习仲勋和刘志丹的荣荣辱辱	田方	10·69
为包产到户拼搏无悔的周日礼	江鲲鹏	10·25
“求实部长”杨显东	吴德才	12·50

□英杰谱□

李大钊身边的一对革命情侣	罗学蓬	1·51
沈钧儒和他的女婿范长江	舒云	2·8
南昌起义前夜的朱德	熊建华	2·71
地下斗争二十年——向警予的助手陈恒乔与胡允恭的传奇生涯	王炳毅	3·40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亲王	周哲	4·20
“文革”中邓小平与叶剑英的生死交	石文	4·10
杨言东	王忠瑜	4·79
义勇军攻打沈阳城	高玉亭	5·14
忍辱负重战死沙场的左权将军	刘永路	5·22
张学思与张学良的手足情	梁月兰	5·43
杨虎城在欧美宣传抗日	袁振武	5·43
袁振武	苗润青	5·34
报国敢云天职尽——赵登禹将军事略	苗润青	5·34
“卢沟桥事变”时的守桥排长李文成	柯崢	5·37
柯崢	君山	5·37
白山黑水慰忠魂——记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	荣维木	5·31
赤色首都瑞金的第一任书记	汤静涛	7·8
叱咤风云的黄浦女兵	舒云	7·13
功高德劭的百岁老人孙越崎	孙本尧	7·18
鸡蛋坨也有五壮士	文治虎	8·41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江波	8·42
舍子忘死护众生——地道战中两位伟大母亲	宦洁民	8·43
张晋遇险与勒石铭恩	黎莹	8·45
黎莹	贾存周	8·45
红军总供给部长在乌兰巴托讨饭记	宴孝鹏	10·56

筹办“抗大”毛泽东选将罗瑞卿	总参《罗瑞卿》编写组	11·15
邹韬奋与周恩来忧时救国成知己	穆欣	11·24
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唐群英	经盛鸿	11·30

□人海浪□

国民党重庆参政会内幕	陆立之	2·84
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人生际遇	田方	4·50
朱德的大哥朱代历之死	陈兆平	4·82
丁肇中的科学之路	桂峰	5·75
巾幗大使施燕华	宗道一	5·80
帅府家事——记罗帅夫人林月琴和子女们	李俊亭	6·62
女音乐指挥家郑小瑛	程迺欣	6·67
从日本战俘到为中国服务的专家	白描	6·70
从美国间谍到友好使者——智歼美国飞机	王鉴	7·69
关于唐奈·费克图的判刑和释放	赵惠	7·69
他俩成了友好使者	林方	7·69
《清宫秘史》作者姚克不平凡的一生	高粱	8·50
从君立宪派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话说杨度	杨第甫	8·57
洪深：一身侠胆的中国“易卜生”	李振家	8·61
长眠于斯里兰卡的女外交官陈依弥	宗道一	9·80
包惠僧和陈独秀	张继华	10·31
“文革”中“苦中作乐”的“干校”生活	骆子程	11·65
喻传鉴先生的感召力	李冰封	12·54
“高山神药”的女专家彭洪福	程迺欣	12·58

□殒星篇□

月黑星殒——文化先驱王思玷人生三部曲	山民	1·54
郭沫若和田汉的友谊与归宿告诉国人些什么	冯锡刚	2·24
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	陆水明	2·42
“杀了邝邝还有邝邝！”——北伐军歌作者与蒋介石的师生纠葛	罗林远	3·45
何万生烈士和他的革命老妈妈	安捷	3·49
罗瑞卿与赵一曼	刘德鑫	4·17
名将粟裕大战淮海	诸辛	7·21
西府战役失利时的彭德怀	李敏杰	7·25
板荡识忠贞——记顿星云将军	朱光亚	7·28
我心中的方志敏——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六十周年	杨肇林	7·28
	温济泽	8·6

□总目录□

团成砥柱止中流——朱德在临汾
抗战前线
太行《新华日报》社长何云殉国记
张太雷一封残破家书的由来
孙中山伦敦蒙难始末
毛泽东为小青年“照写”的手书
“妈妈同志”——任锐

张文和 9·52
戈基 9·54
钱听涛 11·41
陈廷一 12·35
师宁 12·40
柯明 12·45

□赤子心□

国际主义战士谢唯进的悲壮历程
共产党人的怀祖之情——记党和
国家领导人瞻仰炎帝陵
第一个率团访问内地的台湾学者
范光陵
爱国侨领吴桂显家乡倾资办学记
陈迪秋
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女华裔成之
凡
为华人增光的曼哈顿建筑师李名
仪
艺舟
常书鸿一生心血倾注敦煌

王梦岩 2·58
王锡堂 3·56
江鲲池 3·59
张兴汉 4·60
孙引南 6·55
陈浜 8·65
方约 11·33

□同心结□

李政道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谋士——文龙
传奇
张太富
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
炎黄子孙盼统一 明月何曾照两
乡——书法家吴玉如题赠张大千
条幅
我与蒋纬国先生的同窗交
一九三九：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

施宝华 2·4
甘远志 2·54
纪流 4·43
王混华 5·68
吕儒琦 6·49
鲁諄 6·52

□时代风□

“郑和”号舰下西洋
天地有正气——一群“推磨鬼”爆
光记
一支新奇的“特种兵”
扬起一面中国帆
他们在深圳杀出了一条血路
四十三届世乒赛中国队如何搏
深圳特区建设中的梁湘
韩先楚将军的故乡情
将帅们的保健大夫牟善初
春 雨
神农架上的现代“野人”

刘永路 1·70
张正隆 2·50
陈淀国 2·74
刘永路 3·75
张正隆 4·74
张继华 4·57
张天来 7·36
邓运双 7·44
洪矛 7·46
朱富有等 7·50

□神州光□

横扫六合军威壮——秦兵马俑二
号坑发掘揭秘
《本草纲目》在日本
古钟妙曲传五洲

王兆麟 1·75
韩进林 2·86
徐士杰 3·79

□九州景□

举世罕见的天津大算盘
孙中山、毛泽东海宁观潮
上海城隍庙的今昔

祁金华 2·85
陈伯良 项伟 8·69
叶世涛 瞿慕钧 12·78

□文荟园□

诗思·诗情·诗魂——我喜爱邓
拓的诗
张旭明、张大千与《五虎仕女图》
海南颂（外一章）
访擅写帝王的作家二月河
韩湾
爱国情怀总是诗——记文史研究
学者许华
贾兰坡和长阳人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于右任和西安碑林
思故人兮沉心曲——学者吴晓铃
谈往录
郑晋
气骨非凡的大书法家吴玉如
《大刀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
历史上的谢安何以为毛泽东称赞
写给抗日名将的换联
热心引进西方文化的清末巡抚徐
继畲
任复兴
辜鸿铭：清末明初一怪才
李宝奇
柳亚子与毛泽东的诗交
冯锡刚
龙马精神海鹤姿——评董寿平先
生的书画艺术
刘恪山
战士诗人陈辉短暂的一生
何辛

丁岚 1·64
朱家连 1·67
陈雄 3·52
冯兴阁 3·70
周云龙 3·72
覃世清 4·27
许正雄 4·46
华夫 4·59
王恂 5·72
王混华 6·58
窦孝鹏 7·84
邹兆辰 7·86
吴海发 8·75
任复兴 9·74
李宝奇 9·78
冯锡刚 10·77
刘恪山 12·62
何辛 12·69

□艺苑志□

天津卫“打”红杨小楼
乌兰牧骑走红神州
我国音乐美学的开路人何乾三
奉系军阀并未禁演《凤还巢》
厉慧良五次为毛泽东演戏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访
独步昆坛的侯少奎
王恂
吴桥杂技之乡的奇人奇遇
郭锋

刘连群 1·59
郝玉峰 3·62
程迺欣 3·66
葛献挺 5·70
刘连群 8·72
郑晋 11·75
郭锋 11·78

□古今谈□

阿 Q 中国文坛的哥德巴赫猜想	林 勃	1·21
不仅仅是血证——再现“南京大屠杀”记	云 阳	4·40
马屁术高手徐达	竟陵子	4·42
曹操性格琐议	何轶光	5·86
日本有些人为什么总想为侵略战争翻案	肖又新	6·74
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	商 传	6·81
台湾,血脉之源在大陆	田 珏	7·31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梁 文	9·59
轰动天京的“杖责天王”事件	魏文华	9·65
感慨的余音——读孙犁同志的一则随笔以后	李冰封	9·69
对《新中国建立时的国号之争》之补充	张 蕊	9·64
浅谈清代的“吏治”	贺 海	12·72
李自成何以兵败山海关	刘少校	12·74

□古镜台□

“正直刚方”话王翱	陆茂清	1·78
黄帝纪元推算	倪 民	1·81
改革名臣翁同龢晚年难度	俞小红	2·78
郑板桥当官记	竟陵子	2·83
羲眷吐蕃的金城公主	格 来	3·82
安刘氏天下者,谁也?——西汉著名辩才和谋士陆贾	李邦云	3·85
揭开诸葛亮神的面纱	徐庆全	4·71
康熙和平统一台湾	陆茂清	5·84
历史的铁证——台湾制“康熙通宝”	张志焯	5·52
一代明主唐太宗的另一面	徐庆全	7·74
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刘耿生	8·77
明初削藩的悲喜剧	王世华	8·83
盛世天子李隆基与“救时之相”姚崇	艾 子	9·83
视贪为治国之要的康熙皇帝		11·82
曾 铮	曾宪旻	

□轶闻录□

记国家危亡之际的吴佩孚	张树昌	1·42
宋希尚智堵黄河大缺口	周乃光	1·40
瓦尔德事件——中美关系首次对抗	奎 松	2·33
李立三和斯特朗	李思慎	2·82
老作家冰心的海军缘	唐 宏	3·53
中日孔林之争	孔维克	4·86

藏匿在赛珍珠名著中的间谍秘密	马牧英	5·61
慧眼识拔梁启超的礼部尚书李端棻	万登学	6·85
发动庐山兵谏的邓演达	罗昌洪	8·48
民国初期临城劫车案的台前幕后	赵 炯	11·60
忆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	牛克伦	12·77

□遗闻录□

新中国建立时的国号之争	余广人	7·81
毛泽东堂弟毛泽润是怎样被杀害的	周 楹	7·82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参加长征的有多少	张 震	7·80
傅斯年与毛泽东	傅哲清	10·67
《文汇报》的苦斗岁月	杨培新	10·47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延安	金 牛	10·74

□法制苑□

冤案十载民告官 天人相助得平反——河北省三河县白庄村农民上访纪实	曾业松	5·63
----------------------------------	-----	------

□他山石□

一位理性的哲人	王基高	4·84
---------	-----	------

□耻辱柱□

美、蒋包庇冈村宁次的丑剧	王俊彦	11·68
--------------	-----	-------

□争鸣录□

唐浩明撰写《曾国藩》为曾国藩正名	潘 荻	9·71
------------------	-----	------

□信息窗□

为世妇会献上炎黄赤子一片心	吴 塘	9·86
《炎黄春秋》过四岁生日	赵友慈	10·86

□编读窗□

关于纪实文章必须真实的讨论	本刊编辑部	1·83
读者作者对本刊厚望殷切	本刊编辑部	1·84
本刊特邀编委和部分作者在座		
谈会上的发言	本刊编辑部	3·86
读者的希冀	本刊编辑部	4·88
读者来信三则	刘忠义等	7·87
要用准确语言表述历史事件	王人广	8·86
相濡以沫 共度难关——为一九九六年本刊调价敬告读者	本刊编辑部	10·85
许昆银剽窃他人文章被揭露	本刊编辑部	11·85
读者来信两封		11·86
1995年 全年总目录	本刊编辑部	12·84

美好夜晚的 伴侣



● 付 哲

人的一生大约有 1/3 的时间是在睡眠中渡过的。睡眠是人的重要活动之一。高质量的睡眠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然而，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来自生活中各方面的压力时时困扰着人们，常常出现失眠、多梦、头晕、乏力等症状。长期不能有良好的睡眠，会积久成疾，进一步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多方面的紊乱。

古人早已认识到睡眠的重要性，将失眠、多梦等列入了诊治范畴，针对治疗有中药、针灸、按摩、气功等多种方法，而其中尤为突出的当属外治法中的药枕疗法。

枕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将药物纳人枕芯，以作保健治疗，直到一物两用，中国古来有之。

宋代《圣济总录》中有“神枕方”记载：“枕后一百日，益筋骨强壮、身面光泽……；二百日，血气充实，

百疾皆愈……；三年后，齿发益壮，容色还童矣。”指出药枕的保健养生，延年益寿作用。由此可见，通过药枕调整睡眠，以达到保健治疗作用，不失为一种很好养生的方法。

505 神功药是在前人的养生保健的基础上，根据传统“内病外治”理论，精选数十味地道天然中草药，结合现代科学方法加工而成的。

505 神功药枕散发芳香气味，通过头部穴位的吸收，起到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清肝明目，醒脑开窍，益智安神，芳香避秽，乌发固齿，通脉活血，改善脑功能等作用，可用于治疗头晕头痛，健忘失眠，胸闷心悸，咳嗽气喘，咽喉肿痛，伤风感冒以及高血压病、脑血管病、颈椎病等多种疾病。

505 神功药枕会伴您渡过美好的夜晚，成为您称心的伴侣。

爱的港湾

父亲坚实的臂膀，母亲温柔的怀抱，恋人强健的体魄，孩童欢快的笑声，哪一样不是我们所渴求的？但，年华似水，漂白了父亲的双鬓，他再不能举我过肩；一生操劳，倦了母亲的腰身，她不能挥动慈爱的手，送我远行；大漠寒风，阴雨绵绵，恶劣的自然环境威胁着我们所爱的人，还有，无法预知的天灾人祸……何处是我们的港湾？谁能抚慰我们疲惫的双肩？

有一种爱向我们走来，有一种关怀实实在在，那就是——505 神功护肩。由世界发明家奖获得者、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来辉武教授三十年医疗实践精心研制的 505 神功护肩。具有祛风散寒、舒经通络、强壮筋骨、活血止痛的作用。它的治疗特点在于，药物精心配合，经反复验证，确有良效；作用时间长久，药效可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作用于肩部要穴，激发体内阳气，通阳散寒，活血止痛，配戴方便，易戴易取，既适用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中风病人，也适用于工作烦心的上班族，家务琐事缠身的家庭主妇。严格的管理，高质量的生产，著名专家的鉴定认可，严谨的实验、临床观察，千百患者的使用，铸就了 505 神功护肩优秀的品牌，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

在配戴 505 神功护肩的同时，若能做一些肢体的功能锻炼，如摸高、伸展、梳头运动以及被动牵拉、按摩等，一定会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505 神功护肩——爱的港湾。

(张隆欣)

炎黄春秋



孙中山伦敦蒙难始末

龙马精神海鹤姿

——评董寿平先生的书画艺术

喻传鉴先生的感召力

浅谈清代的“吏治”

李自成何以兵败山海关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2813 邮发代号：82-150
定价：3.20元